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

The Nativiz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for Centuries

沈艳蕾　张　艳　贺业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

The Nativiz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for Centuries

沈艳蕾　张　艳　贺业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 / 沈艳蕾，张艳，贺业明 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02-44154-0

Ⅰ. ①英… Ⅱ. ①沈… ②张… ③贺… Ⅲ. ①英语—语言学史—中国 Ⅳ. ①H3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8561 号

责任编辑：王桑娉 胡花蕾
封面设计：赵晋锋
版式设计：方加青
责任校对：牛艳敏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30mm 印 张：13.5 字 数：205 千字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产品编号：

作者简介

沈艳蕾，1978年出生，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英语翻译硕士研究生导师。近年参与编写《当代英语应用文写作》；在《教育探索》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目前主要从事中国英语研究和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

张艳，1984年出生，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近年参与编写《第二语言习得：学习者与社会文化》；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目前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

贺业明，1978年出生，牡丹江师范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科长，广西师范大学英语口译在读硕士。近年在《作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目前主要从事英语口译、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工作。

前　　言

很早就想写一本关于英语在中国传播历程的书，却总是碌碌红尘，无暇落笔，今如愿提笔写来，胸中感慨自是欣慰。

我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用现在的时髦词汇表达就是“70后”。经历90年代“独木桥”式高考，在英语专业学习4年，后留校任教，讲授英语。可以说，自90年代至今，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和英语亲密接触，从未分开。记得在大学学习英语时，英国伦敦音是我们那个年代推崇备至的英文发音，每天的业余时间都守在录音机旁模仿，而现如今对学生的要求是“清晰流畅”；当时记忆深刻的一个单词是中国的特色传统美食“饺子”，英文是Dumpling，而现如今却更倾向于Jiaozi，全部以中国拼音译出，保持中国发音；当时我们奉为笑谈的“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不知陪伴我们这一代英语学生度过多少个欢乐的时光，现如今竟成了老外们追捧的语言。这种种变化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英语在中国的变化，它变得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不再距离我们那么遥远。

从16世纪的“澳门葡语”到18世纪脱胎换骨而成的“广州英语”，再到19世纪风行上海十里洋场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历时300多年。它们对当时中国的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19世纪美国在华外交官何天爵在其著作《真正的中国佬》中提到：“外国人与当地中国佬之间所进行的巨额贸易有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离了它，您还真是玩不转。”“澳门葡语”“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尽管语音牵强，基本没有语法可循，一直受到排斥和否定，但它们依然在中国的土地上顽强地向前发展，完成了历史使命。作为

“70后”的我经历了“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阶段。 在“中国式英语”阶段，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人数激增，英语发音日趋标准，语句也大部分遵循英语语法。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倍增，中国人民不再满足于英语中那些蹩脚的汉语特色词汇，希望用英语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这时的“中国英语”应运而生，满足了人们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愿望，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着。这悠悠数百年的时光，英语陪着我们一路走来，是该写一本书以作纪念了。

英语全球化的速度在加快，这从讲英语的人数上可以反映出来。著名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奥托·叶斯柏森)曾预计讲英语的人数到1500年为400万，1600年为600万，1700年为850万，1800年为2000万到4000万，1900年为11 600万到12 300万。而从1900年到 20世纪末的100年间，讲英语的人数快速增长了近10倍，大约有7亿到10亿。英语如此大范围快速地传播引起了世界语言学者的逐步关注。世界英语概念的提出及理论框架的构建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对其具体形式和功能的研究却晚至1978年。随后，1987年和1992年又相继出现了两个世界英语机构，即世界英语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World Englishes)和国际世界英语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orld Englishes)。《英语世界》(*World English*)、《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和《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杂志也相继出版。至此，“世界英语”一词正式诞生。

根据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语言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由英语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一变化，被语言学家称为英语本土化(Nativization)。1980年，英国语言学家Peter Strevens(彼得·斯特雷文斯)最先提出了他的关于世界英语的树形图，即认为英语来源于不列颠岛，然后蔓延于全球。斯特雷文斯的说法虽然正确，但却未能描绘出英语在全球发展的状况。1985年，美国语言学教授Kachru(卡其鲁)提出了他的所谓“三大同轴圈”的模型，把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划分为内圈、外圈和延伸圈。按照这种“三大同轴圈”的划分，在内圈中的国家有英国和美国，在外圈中的国家有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延伸圈国家的人口最多，有中国、日本和韩国等。根据这种模型，英语每到一处，必

然经历某些语言上的变化，从而以一种新的变体形式扎根在这个地方。今天的英语已不只是西方文化的载体，它同时也是其他民族文化的载体。

在英语全球化趋势下，英语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也必然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经历本土化演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英的接触从第一个英国人John Weddell(约翰·威德尔)1639年来中国算起，已接近4个世纪，英国传教士Robert Morrison(罗伯特·马礼逊)1807年来中国传授英语，至今也有2个多世纪。英语在中国也分别经历了16世纪的澳门葡语、18世纪的广州英语、19世纪中叶的上海洋泾浜英语、20世纪的中国式英语和世纪之交的中国英语5个发展阶段。

根据英语在中国发展的5个阶段，本书分为9个章节。

第1章为英语的传播。英语从西日耳曼语支的小方言，发展成为遍布世界的全球通用语言，经历了不断的扩张和蔓延。

第2章是英语全球化概述。英语的全球扩张和传播引起世界语言学家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理论出发论证世界对共同语言的需要以及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原因和特点。

第3章是英语本土化概述。英语的全球化引起了英语的本土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世界英语理论和认同协商理论都为英语的本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4章和第5章介绍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和21世纪的中国英语。英语在中国也必定会经历语言的本土化。从1557年葡萄牙人潜入澳门建小货栈，以租借为名，用贿赂手段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并宣布正式开埠，长期霸占澳门开始，到中国人民主动地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并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中国英语，英语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对推动当时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6～8章分别介绍中国文化失语症、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式英语的态度和中国的英语教育变迁。中国文化失语症为中国英语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背景，一些曾经的中国式英语也在文化的包容性和国人用英语表达祖国文化的热切期望下华丽转身。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英语教育，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不同的教育机构且

英语教育权重在不断增加。

第9章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百年历程的启示意义。英语在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本土化历程，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英语教育乃至汉文化的核心载体——汉语的未来都具有启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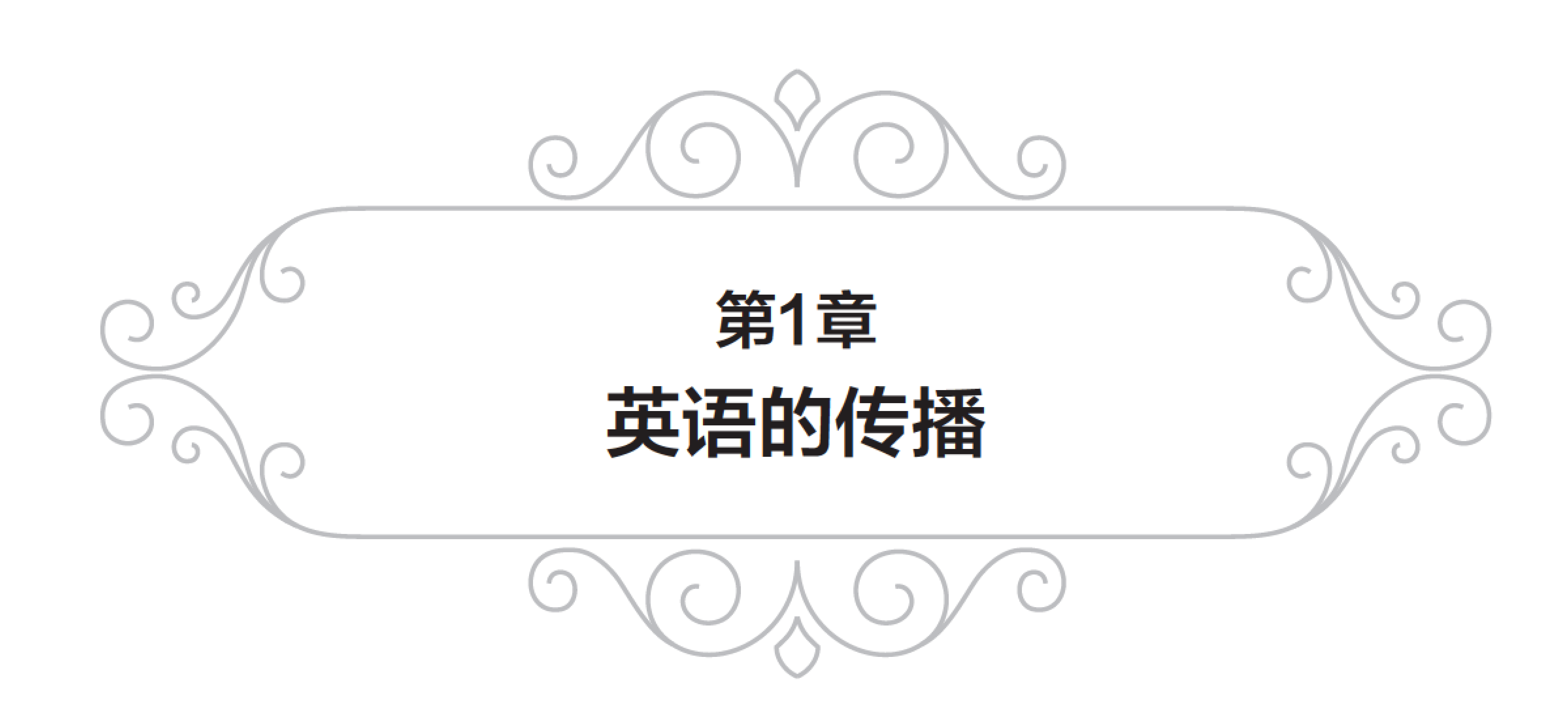
本书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主要研究成果。作者均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师。沈艳蕾负责撰写前言、后记、第4章、第5章和第8章，共计10万余字，并负责全书统稿；张艳负责撰写第1章、第2章和第3章，共计5万余字；贺业明负责撰写第6章、第7章和第9章，共计5万余字。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诸位学者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使本书日臻完善。

沈艳蕾

2016年3月

目　　录



第1章
英语的传播

公元5世纪刚从欧洲大陆中部迁移到不列颠岛的盎格鲁部落、撒克逊部落和朱特部落不会想到，当时他们使用的一种属于西日耳曼语支的小方言，日后竟然成为全球通用语，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难以望其项背的。

英语属于世界上最大的语系印欧语系日尔曼语族的西日尔曼语支，最初是一种“外来语言”，形成于公元6世纪。在诺曼人(Normans)1066年征服并统治英国的近400年里，法语成为官方语言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宫廷重要文件多用拉丁文和法文书写，英语则失去官方语言地位，并且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不用于学校教育。这一时期的英语是一种只在老百姓中流通的“通俗语”。直到13世纪初英国语言的阶级性仍然存在，上层人和宫廷依然使用法语，法律术语多半是法语，教育界、宗教界和官方文书等依然使用拉丁语。但在这一时期，法语和拉丁语对英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英语中增添了许多法语和拉丁语的词汇。即使到公元16世纪，英语仍然只是一小部分人使用的语言，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仅有500万至700万，且仅局限于不列颠诸岛。1489年之后，英国所有的议会记录和法令都只用英语书写了。1547年，英语取代拉丁语，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教会用语。英语逐渐完成了从“下等人”语言到英国通用语的进化。在英国的各个职能部门，包括宫廷、议会、法院、学校、宗教和文学界，英语都处在主导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迅速发展，英国国力逐渐增强。1550年，英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的39%，商业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5%，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国和贸易国。“世界工厂”的称号由此而生，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到了187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量更是超过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总和，成为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英国开始大肆对外扩张，并很快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帝国。整个19世纪可以说是一个英国的世纪，大英帝国的繁荣与富足已经使

其达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其殖民地竟比本土大130多倍，得到“日不落帝国”的称号。殖民入侵当然离不开文化的输出，而文化输出最强有力的工具是语言。英语作为英帝国的信息纽带，跟随着英帝国的扩张而在亚非美澳四大洲风行400年。可以说，全球性的大英帝国使英语得到了全球性的传播。到19世纪末期，英国已经为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建立了先决条件，或创建了一门“日不落语言”。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英国的前殖民地纷纷脱离英国而独立。但是，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的瓦解并未使其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减弱。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在许多原殖民地国家，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已经确立。其主要原因是英国经过大量的资本积累后成了世界强国，许多原殖民地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在经济、贸易、科技等方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英国。

同时，美国等英语国家的诞生和崛起给英语的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实力大不如前。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和世界技术盟主。美国、英国倾力向世界推行英语，英语的势力急剧扩张，使得英语超过法语成为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的第一大语言。尤其是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发展和优势，使英语如虎添翼，几乎独霸了网络用语。作为英美国家的精神堡垒——英语，它获得国际语言地位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英语最终问鼎世界，成为当今国际通用语。

人类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便捷的交通和通讯把地球变成了“村庄”，英语就是“地球村”居民的“身份证”，是世界各国人民融入全球化浪潮，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证件”。在当今世界，无论对于一个个体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有效地掌握和使用英语，就等于将自己与世界隔离起来，最终会被文明和进步所抛弃。

英语是当今世界国际交流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据英国著名学者David Crystal(大卫·克里斯托)(2001)统计，全世界现有57个国家以英语为第一语言，

人口4.5亿；67个国家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人口3.5亿；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巴西等，以英语为外语并且达到相当程度的人口达12～15亿；目前世界上超过1/3的人掌握了英语。他预测，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传播，10年以后，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数将超过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50年后，还会增加50%。目前的数字表明，以英语为外语的人数超过了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人数的总和。英语名副其实地成为一门被世界所用的国际语言(International Language)。

英语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中最重要的语言。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每一任秘书长，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用英语进行各种演说，而且往往也是他的工作语言。许多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及地区机构都指定英语为唯一工作语言。1995—1996年全世界12 500个国际机构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机构语言的占1/3，其中前500家机构中，85%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在变幻莫测的国际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家，文化背景千差万别，政治观点南辕北辙，各不相同，但坐下来讨论国家和国际问题时，英语都是他们的首选语言。英语已经泛化为一种代表多元文化的共同语言。一个人的母语不管是什么，想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就得讲英语。2015年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会议现场大背景幕布就是英文“Asian African Summit”。

英语是先进科学技术最主要的载体。由于美国及其他一些英语国家的科技和教育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有一半的科技文献都是用英语编写的。其他国家专业领域的科技人员如果想了解并借鉴美英等国的先进科技，就必须学习并精确地掌握英语。而他们如果想使自己的发明、创造得到世人的认可，首先也必须把自己相关的论文译成英语，以便供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审核。一项对1981年科学期刊的调查表明：85%的生物学论文、73%的医学论文、69%的数学和化学论文都是用英语撰写的。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英语的日益普及，这一比例已大幅增加。在计算机领域，用英语撰写的论文比例达到100%。以一向对语言问题比较敏感的语言学期刊为例，至1995年，《语言学

文摘》(*Linguistics Abstract*)中所列出的1500篇论文中，90%是以英语撰写的。可以说，英语代表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

英语还是世界媒体的主要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英语决定什么是新闻，谁应该知道这些新闻。世界上1/3的报纸是英语国家出版和发行的，且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几家报纸都是英文版本。1994年全球大约45%的广播节目是由英语国家制作和播出的，其中美国的电视节目可谓“独领风骚”。从《米老鼠和唐老鸭》到《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从《花木兰》到《狮子王》，从迪士尼世界到迪士尼王国，美国的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它们不但带来了美国的艺术文化，还带来了美国的语言——英语。互联网是美国人的发明，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同英语“捆绑”在一起，签订协议、设计程序、开发软件都以英语进行。如今，互联网上90%的信息用英语存储和传播。英语是开启互联网上知识宝库的敲门砖。电脑和互联网在世界的普及更加巩固了英语在国际社会中通用语的地位。

在国际商务、旅游、体育、娱乐等领域，英语同样占据着主要阵地。世界范围内的商务交割主要以英语进行，如一位日本商人和一位沙特阿拉伯商人在新加坡的酒店里进行商务谈判时，他们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意大利人想在芬兰推广自己的产品但又不懂芬兰语，那么他可以尽管放心地使用英语。国际旅游业更是如此，据国际旅游组织估算，世界上旅游收入和开支最大的国家是美国，美国人在世界各地旅游参观，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所到之处他们被奉为上宾，一应旅游设施和人员，包括导游、酒店服务人员、酒店菜单和景点标识都是英语。热爱喧闹、性格外向的美国人把英语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英语还是最主要的教育媒介。正因为英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发达的生产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英语确定为自己的官方语言或外语，更多国家对英语教学倾注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国际上许多高校的教学都用英语进行，中国也正向这个方向迈进。在这个意义上，英语又是“地球村村民”的“通行证”。因为会讲英语，人们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因为会讲英语，人们可以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时至今日，英语从一个面积仅占世界面积1/200左右的国家走出，走到了世界1/3的领土之上，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在任何一个大洲上我们都可以找到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在世界24个时区中的任何一个时区上，都可以找到说英语的人。



第2章

英语全球化概述

全球化进程是一种超越国界与国家主权、在全世界范围内沟通和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根本动力与基础的。因此，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是现代资本主义推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下各个国家经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以至形成了全球经济整体。

经济的迅速全球化导致文化和语言的全球化。因此，全球化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的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产生的。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具备了文化的内涵。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推动了语言的全球化，人类日益需要一种共通的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和文化更好、更快地发展。

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已有400年的历史。16世纪末，英语的使用者大约只有500万人口，使用地域仅限于英伦三岛。随着英国向海外移民和扩张，以及美国的迅速崛起和对世界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使用英语的人口已达12～15亿，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之中，正日益渗透世界各个角落，现在估计近20亿。英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交流沟通(包括互联网交流)的通用语言。英语作为全球化时代使用最广泛的国际通用语身份已吸引了很多学界的研究与关注。Toolan(图兰)(1997)提出的Global English概念，Ahulu(阿赫鲁)(1997)提出的General English概念，Widowson(威德森)(1997)和Modiano(莫迪亚诺)(2001)所提出的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Jenkins(詹金斯)(2000)和Seidlhofer(赛德霍弗)(2001)表述的Lingua Franca概念，以及Wallance(2002)创造的Literate English概念，都在强调着英语全球化的发展变化。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各个领域的全球

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模式。全球化也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提供了充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英语的全球化是这种全球化趋势中的一个主要结果，即英语逐步演变成一种国际语言，为越来越多的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学习和使用。”(李文中，2006)。Blach(布洛克)认为，英语越来越成为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界面。英语的全球化实际上代表了英语在世界上的趋同趋势，是一种单语言的扩张和延伸力量。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人们对英语全球化的态度形成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态势：一是以克里斯特尔、麦克克拉姆、克兰和麦克尼尔为代表的赞美派，认为英语以其自身的民主性和重要人物的使用在全球传播；二是对此提出批评的，有帕尼库克和菲利普森，其主要观点认为，英语的全球化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或者是美帝国主义的延伸，其后果是造成新的文化和政治上的不平等。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严厉的批评被更现实的折中考虑所取代。以Panmekoek(帕尼库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英语的全球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论之。另外，国际英语研究者认为，英语的全球化主要受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推进，一种是向心的趋同力，另一种是离心的变异力量。前者的极端后果可能是英语在全世界形成核心性规范，语言与文化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并最终消除；而后者的极端结果可能是英语在各种文化中的本土化，并日益显示出地方特征，从而演变为特色各异的语言变体，以致变成相互独立的语言。但是，这两种力量如此强大，使得英语在任何一条道路上都不可能走得太远。然而，全球化进程已经使英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要结果就是国际英语和各种新变体的形成，英语本族人的文化与语言权威受到挑战和颠覆，英语与其本族文化的纽带变得越来越薄弱，英语语言中旧的单一性标准和规范受到质疑，并逐渐被多元标准和多中心论所取代。

2001年第1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卷首语中提到了由英国英语专家David Graddol(格拉多)撰写的一本书，名为《英语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glish*)。该卷首语中指出，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英语将继续强大，其通用功能不会被其他语言轻易地取代，但是它的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世界语言格局将出

现重组；英语不再属于英美诸国的专利而是属于世界；它的发展和未来取决于把它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使用和学习的人们等。“英语不再只属于英国或美国，而是一种国际语言，人们使用英语的同时并不否认他们自身本土语言的价值”(Halliday，Maclntosh＆Streven，1964，转引自范勇，2015)。而美国社会语言学家Kachru(1992)(转引自范勇，2015)指出：“英语一旦在某一地区被采用，不论其目的是科学、技术、文学，还是人的名望、地位或现代化，它都会经受一个再生过程，部分是语言再生，部分是文化再生。”英语与不同的文化相结合，最终成为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载体。英语的迅速全球化必然产生各种带有不同地域和文化特征的英语变体，即引起英语的广泛本土化。英语在与世界上其他语言和文化的长期接触中，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异，产生了许多英国本土以外的变体，英语的名称也由单数的“English”变为复数的“World Englishes”。

2.1 英语全球化的理论依据

全球化几乎成了当今世界主旋律，而全球化又把英语发展推向新高潮，似乎英语成了各国通向国际化的尚方宝剑。社会学对全球化的认识基本可以归为4大理论体系：世界文化理论(World Culture Theory)、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后殖民主义理论(Postcolonialist Theory)和文化主义理论(Culturalist Theory)。这些理论体系对全球化的理解不尽相同，这也直接导致英语全球化的概念不尽相同。

2.1.1 世界文化理论

世界文化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某种全球共同认可的好的世界文化或实践模型。所谓全球化即各实践主体(通常指国家或个体)努力探索、追寻这种世界文化，并以此为参照改造自己的过程。目前，全球追捧的世界文化似乎是以英美国家为首的西方现代文明。因此，英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成了大家竞相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标准英语观即反映了这一全球化理论。为了国际交流时能互相理解，大家使用的英语应尽量一致，即为标准英语。标准英语以英美等西方国家语言为蓝本，又不同于英美英语，是从中提炼出的一套标准语言体系。它不带任何文化或地域色彩，供各国人民学习参考，以满足其国际交流沟通的需要。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标准英语的理念一直支撑着许多国家的英语教学。大量老师和学生甚至语

言学家坚信，英语学习就是学习统一的标准英语，努力克服或避免与标准不符的英语使用。不过问题是，是否存在独立于各个国家的绝对世界文化呢？具体到英语，即是否存在独立于一定政治经济文化实体的标准英语体系呢？而且这个体系还必须相对稳定，可以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不发生变化？同时还客观公正，对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是公正公平、不偏不倚的？显然不可能，因为语言和文化从来都是互相渗透的，没有独立于各国文化之上的绝对语言。

2.1.2 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不同国家根据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占据这个体系的核心到边缘等不同位置。基本上，处在世界体系核心的是那些早期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优势的国家，尤其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全球化无非是这些核心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对其他处在边缘或半边缘的国家施加影响，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意图直接或间接地强加给其他国家，并从中获益。用Spring(斯普林)的话说，全球化就是“以牺牲穷国为代价而使富国的掠夺行为合法化的过程，现行的市场经济、人力资源资本化、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都是这种行为的具体体现”。更有甚者直白指出，全球化就是那些富有国家对不富有国家的征服，北半球对南半球的征服，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征服，它进一步巩固了世界体系所固有的结构性不平等。

英语全球化的另一种观点，即英语本族语观就带有世界体系论的痕迹。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曾经的殖民国家直接的政治经济军事干预减弱，英语成了他们得以继续在全球维系这种不平等世界体系的主要手段。通过推广英语，其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理念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资本主义对世界的霸权统治也间接得以实现。因此，英美等国想方设法在全球推广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如成立英国文化委员会，出版发行英语学习教材，构建英美英语优越论等。通过这些努力制造一种英语本族语最正确、最地道、最标准的表象，其实际意图是英语国家利用英语这一武器实现全球经济文化统治。而其他处于弱势的边

缘国家想要国际交流，不得不加入这些以说英语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被迫学习他们的语言。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英国化或美国化。Phillipson(菲利普森)多次撰文揭露这种语言霸权主义。他指出，即使在全球化日益纷繁复杂的今天，这一事实仍不可否认，比如在学术交流领域，英语牢牢占据国际学术交流的主宰地位，似乎只有用英语，学术见解才可以被更多的人了解、认可。这种垄断让很多英语非本族语学者在传播学术知识时处于弱势，被迫接受英语为学术交流通用语，以致弱化自己国家本土语言在学术传播中的价值，甚至导致很多本土语言文化的消亡，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不公。同任何一种生物一样，每种语言一旦产生就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语言霸权主义恰恰是要剥夺其他语言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

2.1.3　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一样认可全球化即霸权国家向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不平等世界体系观，只是它更强调由殖民历史所带来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后殖民主义者认为，尽管殖民帝国崩溃瓦解了，但通过各种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贸易协议等新形式，殖民主义仍在继续。尽管后殖民主义承认目前资本主义掌控世界格局的现状，但它拒绝以此为出发点来理解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分割。相反，它极力主张通过边缘国家的努力开拓出有利于边缘国家自身发展的新秩序或生存空间，改写这种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全球化历史。比如后殖民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输出来实现对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的控制，是文化帝国主义。因此，后殖民主义者致力于揭露国际交流中存在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导致的跨国支配现象。

世界英语观是比较典型的后殖民主义思想的体现。近年来，世界英语的提法频现于各种媒体，其与英语本族语观针锋相对。世界英语观强调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因日常工作生活交流中的频繁使用，英语逐渐与当地语言文化融合，形成比较鲜明的本土特征。因此，现今的英语已不再仅仅是少数

几个英语本族语变体，而应涵盖所有世界各地产生的种种英语变体，即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首先，各国英语使用者并不生活在英国和美国，英语不可能学得像英美人那么地道。其次，语言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的人学习使用英语最根本的目的，是表达自己的社会文化体验，满足自己的交流需要。

在世界英语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著名印度裔美籍语言学家Kachru(1992)的“三大同轴圈”理论(The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他按照历史、使用功能和语言特征把英语分为“内圈”(Inner Circle)、“外圈”(Outer Circle)和“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其中的“内圈”是指英语作为母语使用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外圈”是指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使用的国家和地区，如孟加拉、加纳、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言、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中国香港地区等，大部分是原英国的殖民地。“扩展圈”的范围最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包括了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扩展圈”国家中，英语作为一门外语要靠长期的学校教育获得，主要在对外交流时使用。对应于“三大同轴圈”，存在三种英语本土化的类型：“内圈英语”(Inner Circle Englishes)、“外圈英语”(Outer Circle Englishes)和“扩展圈英语”(Expanding Circle Englishes)。“内圈英语”包括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和新西兰英语等，这些国家的英语是“标准提供型”的英语变体。“内圈英语”规范了各种英语的“共核”。“外圈英语”包括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巴基斯坦英语、菲律宾英语和香港英语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是“标准发展型”的英语变体，它们绝大多数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扩展圈英语”，扩展圈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英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是“标准依附型”的英语变体，其规范主要来自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

另外，Kachr在划分出这三大同轴圈后，还把各种英语变体按照使用目的和功能的不同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制度化变体；另一类是使用型变体。制度化变体指英语在这些国家具有法定地位，是这一国家的通用语言，例如在新加坡、巴

基斯坦和印度的英语；使用型变体指的是主要用于国际交流的英语变体，它不具备规定性。Kachru还指出，抽象的英语是不存在的，英语只能以各种变体的形式存在，它们类型虽然不同，但在语言学上的地位却是平等的。Kachru的“三大同轴圈”理论体现了英语的传播方式、习得模式以及英语多元中心主义的发展，因而在国际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2.1.4 文化主义理论

文化主义理论则是相对于世界文化理论而提出的，承认宏观对微观世界的影响，但否认世界文化论中宏观决定一切的单一世界观。相反，文化主义理论承认微观世界多种文化、知识，看待和认知世界方式的存在，强调这些形式都应得到相应认可。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并不是使世界文化趋同，而是各微观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地吸收世界各地文化知识，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使得以前本土化的东西得以走向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文化主义理论下的英语通用语观与世界英语观出发点类似，倡导英语学习的民主运动，主张充分尊重各实践主体的利益，反对语言霸权主义。但与世界英语观不同的是，英语通用语观认为，各英语变体用于本国内部交流无可厚非，但国际交流使用的英语过于本土化会造成沟通障碍。因此，国际交流英语不等于本土英语集合，企图通过学习本土英语达到国际交流的目的是得不偿失的。比如，新加坡英语在新加坡国内使用没有问题，但在与国际人士交流时，交流对象如果对新加坡英语和文化没什么了解就会听不懂。因此，英语通用语观指出，不管英语在各地如何发展，很多国家英语教育更重要的是为了国际交流。所以，应该探讨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是如何使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的，即英语国际通用语(English as Lingua Franca)现象，而非本土英语。

2.2 英语全球化定义

近年来，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国际英语(International English)和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频繁出现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和网络。这3个概念除在使用背景与侧重点上有所区别外，都是表达英语全球化的同义词。

这3个概念中影响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世界英语一词。世界英语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所指的是标准英语、非标准英语、英语母语，英语方言、洋泾浜英语、克里奥尔语等所有的英语和英语变体。McArthur(麦克阿瑟)认为，世界英语有两层含义：它既是“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简称，也是英语变体，如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美国英语、爱尔兰英语、尼日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等的总称。它涵盖了英语的各个方面：方言、洋泾浜、混合语、变体、标准语、话语、写作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英语这一概念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开始研究它的学者及学术刊物也越来越多。其中由印度裔美国著名学者Kachru和Smith(史密斯)共同主编的《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刊物最为出名。此刊名中的“英语”一词用复数，即指各种英语变体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使用的不同英语。到了20世纪90年代及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对世界英语研究的兴趣和关注度更是与日俱增，世界英语逐渐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很多学者从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角度等研究世界英语。目前，关于世界英语，学者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英语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使用目的、使用者对英语的态度、英语在该地区的作用、英语在各地的本土特色、世界英语的存在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英语的未来等(潘仙章，2004)。

国际英语概念出现在1930年，比世界英语略晚，刚开始并不多见，直到80年代才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如1982年，Trudgil(特鲁吉尔)和Hannah(汉娜)合著的颇具影响的专著《国际英语：标准英语变体指南》(*International English*： *A Guide to Varieties of Standard English*)使用了这一概念。该概念马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对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教学(TEIL)与英语作为外语教学(TEFL)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ESL)形成比较研究。TEIL是语言教学和应用语言学里的一个概念，旨在教授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使用英语。这些人可以是新西兰人和英国人进行交流；也可以是约旦人和印度人进行交流，或是中国人和韩国人在一起交流；还可以是美国人和德国人，或是埃及人和加拿大人在一起交流。Smith(转引自McArthur，2004)指出，TEIL和TEFL或TESL是不一样的，因为TEIL需要英语为母语的人们也应该在国际语境下与英语为非母语的人们作出共同的努力，以期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TEIL强调的是英语属于所有使用英语的人们，说话方式以及话语模式的不同存在于所有的语言和语言社区，这些方式和模式会硬性地用于同一语言交流的双方。换言之，我们在交际过程中需要相互配合和调整，以达到交际目的。综上所述，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被多国家、多民族使用。例如，在中国香港这样一个人口密度居全球第三的国际大都市，逾55万持外国护照的人口需要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全球英语则出现得更晚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一词使用得越来越频繁，如全球化、全球村、全球变暖、全球经济等。全球英语指英语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尤其与社会和经济的全球化相连。McArthur(2004)对全球英语一词是这样解释的：全球英语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英语已成为统领世界其他语言的领头羊；技术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并影响着全世界的教育、就业和文化；同时也为全球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牢固地位助了一臂之力。

2.3 英语全球化的成因

2.3.1 英语自身的包容性和渗透性

英语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词汇量丰富，表达能力强，极易掌握；二是英语是借词最多的一种语言，对其他语言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渗透性，能够及时吸收其他语言的优势，在创新中不断简化，比其他语言更易学易用，因而能够被广泛接受。借词亦称外来词，是借用外国或外族词汇来表达信息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现象。英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其他各种语言中(包括欧洲国家语言和非欧洲国家语言)借用和吸收了大量的词汇，用以弥补它在表达特定事物名称或文化概念时词汇量不足的情况，同时也通过借词这一手段向本族人民引入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事实上，英语中许多外语借词，从历史上考证，其数量可能占英语词汇总量的56%~70%，所吸收的语源多达数十种(李小飞，2004)。其中汉语借词进入英语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相比较英语1500多年的变迁，这已是一段不短的历程。据统计，仅牛津词典中所收英语词汇中以汉语为来源的借词就有1189个，居英语中借词的第11位(许爱军，2009)。这是英语能够成为世界性语言，并在科技、贸易及国际交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2.3.2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全球化是一种发展的现象和过程，即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而语言的传播实质上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反映。事实上，英语是非常年轻的语言，只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英语正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日益全球化。David Graddol就指出：虽然其通用功能不会被其他语言轻易地取代，但英语的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世界语言格局将出现重组；英语不再属于英美诸国的专利而是属于世界；它的发展和未来取决于把它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使用和学习的人们；等等。这一论述实际上指出了英语未来的发展方向，即英语正在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全球化，英语会继续对全球非英语国家的通用语言进行“入侵”；另外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英语的日益本土化，也就是说，各种英语将在发展中得到壮大，并且成为相对独立的语言变体，如中国英语、新加坡英语、马来英语、日本英语等，除了公认的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之外，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国家将宣布自己的英语“独立”(杜瑞清，姜亚军，2001)。

2.3.3 互联网的普及

互联网是一个神奇的大网，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为人类的交流服务的。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聊天、玩游戏、查阅资料等，甚至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和购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互联网中，互联网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英语是国际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掌握英语是在网上获取信息和进行沟通交流的必备技能。互联网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英语在全球的发展。

2.4 英语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2.4.1 语音层面

上世纪末开始，英语语音区域的同心圆中扩展圈(Kachru，1985)的范围急剧扩大，世界英语概念快速发展，非本族语使用者人数大大超过本族语者(Crystal，1997)。出于各种原因，也包括纯正口音难以习得以及非本族语人群对其身份意识的增强，学界提出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口号，摒弃传统的本族语标准(Jenkins，2000/2007)，取而代之以交际的有效性。这不仅是观念的转变，实证研究也证明，口音并不严重影响交际中的清晰度和可理解度。同时，Quirk(夸克)(1982)的核心英语概念也与此不谋而合。Quirk的核心英语有3大特点：可学性、可交际性和伸缩性。核心英语不受英美文化束缚，并不认为国际交流中英美人的英语就高人一等，混合语、洋泾浜英语同样受欢迎。以上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英语作为全球性的交流语言，会变得越来越简化易懂，越来越摆脱英美英语的束缚。易懂、易学和易用将会是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3大显著特点。从音位层面看，全球英语要求英语使用者发音力求清晰，避免同化和省音，能够区分、识别音素之间的异同，并能正确发音，而对于语音差异不作严格要求，因为发音的目的是能解码，正确理解其意。如英语使用者应能准确区分[p]与[b]、[k]与[g]、[t]与[d]的不同，但不必要求他们一定能区分和正确发出spat中的[p]和pat中的[p]，只要他们能在交流过程中正确理解对方意思即可。Yano(亚诺)(2001)认为，对于

新造词和外来词，复数后缀在浊辅音后读[z]、在清辅音后读[s]、在咝音[s]和[z]后读[iz]，同时对于不规则读音形式，如Houses的读音[hauziz]，按照新规则，应改读为[hausiz]。外来词末尾为[t]的读音应遵循英语读音规则而发[t]，如Beret，Ballet，Debut，Restaurant等。再如元音特点，即不存在长、短元音差别，例如德国人可能会把chess中元音[e]读成更类似cat中的元音[æ]。

2.4.2 词法层面

从词法层面来看，避免使用口语词，词素和选词都应该使用统一的规范形式来替代不规则形式，可数名词无论规则与否，其复数一律用(e)s，如Alumnus，Formula，Stimulus，Mouse，Man，Woman的复数一律为Alumnuses，Formulas，Stimuluses，Mouses，Mans，Womans，而不是复杂难记的Alumni，Formulae，Stimuli，Mice，Men，Women(Yano，2001)。其实，有些词已在这样使用，如日本索尼生产的“随身听”为Mickey Mouses，而非Mickey Mice。另外，动词过去式和过去分词的不规则形式一直困扰着英语学习者，为此，Yano(2001)提出一律和其他规则动词一样词尾加(e)d，如Steal-Stole-Stolen可以直接改为Steal-Stealed-Stealed，Come-Came-Come可变为come-comed-comed等。比如人们会根据交流人群和场合的变化，灵活性地选择诸如动词第三人称单数词尾是否加词尾s这类的语言特征标记。当没有英语本族语者在场时，为建构共同的英语非本族语身份，人们往往省略(但有英语本族语者在场时，则倾向于加上s)。在上课等正式场合，多在第三人称单数动词词尾加上s；在非正式场合则不加(Cogo & Dewey，2012)。英语中的同义词也一直困扰着英语学习者，至于词汇选择，Yano认为，在同一语义场内，选择最基础的词汇作为先学的对象。如在表达“瘦”的词汇中，有Thin，Slender，Slim，Lean，Skinny等，Thin可作为先学的对象。

2.4.3 句法层面

在句法层面，句子结构得以简化，易学易懂。如英语的附加疑问句较复杂难学，附加疑问句的助动词需根据前面主句的助动词而定，在世界英语中，可以一律用“Is that so?”或“ Isn't that right?”。从语用层面来看，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使用者在使用时，应避免使用打上所谓“标准英语”国家的文化、宗教、价值观、信仰等烙印的表达，以使我们的英语尽量保持既中性又民族的特点。



第3章

英语本土化概述

英语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就是英语的本土化。英语的本土化就是英语的再生，是英语与其他语言和文化长期接触而发生变异的产物。英语在世界上的传播已经表明，它每到一处，必然经历某些语言上的变化，从而以一种新的变体扎根在这个地方。著名语言学家Peter Trudgill和Jean Hannah(2000)在他们所著的《英语：国际通用语》(*International English*)一书中分析对比了内圈国家(Inner Countries)和部分外圈国家(Outer Countries)所使用的英语，就发现了十几种英语变体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几个方面的不同。如果考虑到数量众多的扩展圈国家(Expanding Countries)所使用的英语，必将存在更多的英语变体。

Kachru认为，英语一旦在某一地区被采用，不论其目的是科学、技术、文学还是获得名望地位或是现代化，它就会经受一个再生过程，部分是语言上的再生，部分是文化上的再生。这种再生就是语言本土化的过程。英语在与世界上其他语言和文化的长期接触中，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异，产生了许多英国本土以外的变体，英语的名称也由单数的“English”变为复数的“World Englishes”。各种带有地域特征的英语变体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并在异国异地的对内对外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1 英语本土化的理论依据

3.1.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失去了它所拥有的文化，因为语言是人们了解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媒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的结晶，是其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承载着传递民族文化内涵的职能。语言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特征，它不仅包含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邓炎昌，1998)。语言和文化是兼容并包、不可分割的。语言是人类交流、思维的工具，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和语言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传播的过程。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语言获得一种文化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社会中的各色文化都由语言来体现和表达，而语言的发展也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如果说语言是形式，那么文化则是内容。内容需要形式来展现，而形式则需要内容来填充，二者相辅相成。Ward. H. Goodenough(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描述为："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与民族传统相生相伴，没有文化，语言就不可能生存、发

展和完善；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没有语言，文化也就没有了存在和延续的基础，所以本民族的语言对民族性的保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要想从真正意义上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语言背后特定的文化背景，因为离开文化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同时，由于文化被看作语言的内容，不同的文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形式，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或文化因素又会影响语言的表现形式。因此，当语言与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其表现形式必然会因为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变化，以此来显现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

语言接触论认为，一种语言在进入另一种语言文化时会产生碰撞，必然要受到另一语言的结构及思维的影响，也必然要去反映这一地方的文化特色，只有这样，这一语言才能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从而形成一种语言变体。语言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从特定的语言模式中可以直接探求隐藏在其中的文化模式，乃至特定时空的世界观，透过民族语言层面，窥见的乃是这个民族绚丽的文化形式。世界上几个主要讲英语的国家都自成一派，归属于不同的英语变体，如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等，其中印度英语更是以“让人耳朵受累”而闻名。因此，英语在面临全球化(Globalization)趋势的同时，也意味着本土化的倾向(Nativization)，带来了各种新的英语变体。

3.1.2 世界英语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英语的发展逐渐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关注。1978年4月和6月分别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大学和夏威夷召开了以“非本族语语境下的英语”和“英语作为国际国内交流手段”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前者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Kachru组织，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美国语言学会联合举办。会上25位学者讨论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英语使用情况，如加纳、印度、肯尼亚、菲律宾、斯里兰卡、西印度群岛、扎伊尔以及英国和美国。由Kachru主编的论文集《另一种语言：跨文化的英语》(1982)便是这次会议的结晶。后者由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re)组织，会议论文集《跨文化交际的英语》1981年出版，主

编是Larry E. Smith(Kachru，1992)。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非英语国家使用英语时的本土化特征以及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移入、文化身份的意识等问题。可以说，这两次会议标志着英语多元化研究的开端。同年，成立了世界英语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orld Englishes，IAWE)。该协会的宗旨是为那些在教学和科研中涉及世界各类英语的人们建立起国际联系。这就是“世界英语”这一概念的由来。除了 IAWE以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以研究世界各类英语为主题的杂志，如《世界英语》(*English World-Wide*，阿姆斯特丹和费城)、《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在英、美由Blackwell出版)、《亚洲英语》(*Asian Englishes*，东京)等。

近年来，世界英语逐渐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世界英语研究学者认为：“英语已经不仅仅是以英语为外语国家的人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交流时使用的英语，更多的时候是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新加坡人、泰国人、印尼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拉美人之间进行交谈时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英语已经成为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背景的共同语，这就使得日本英语、中国英语等非英语国家的英语成为一门独立英语日益成为可能，而且英语社会应该承认并且正视这种英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绝对盲目地加以否定。”(王银泉，2002)。

世界英语的发展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关注，很多学者从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等角度研究世界英语。目前，关于世界英语，学者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英语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使用目的、使用者对英语的态度、英语在该地区的作用、英语在各地的本土特色、世纪英语的存在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英语的未来等(潘仙章，2004)。

在众多世界英语研究者中，印裔英语类型学家、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Kachru的影响最为深远，他的三大同轴圈理论把英语在世界的传播分为内圈(如英、美)、外圈(如印度、马来西亚等)和延伸圈(如中、日、韩等)。在内圈国家

中，虽然人口最少，但英语是自然习得的母语，应用于各个领域；外圈国家主要是英语国家的前殖民地，人口相比之下要多，主要通过学习习得，但现在已经成为英语变体并固定下来；延伸圈人口最多，英语获得方式也是通过学校教育，但是功能有限。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英语在社会各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延伸圈的国家中，英语受到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不仅成为西方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的载体。由于英语在外圈国家受到本土文化的介入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时间之长，其语言形式发生了稳定的本土化变化。这种高认同度使得英语变体身份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形成了制度化变体。制度化变体是指英语在这些国家具有法定地位，是这一国家的通用语言，例如新加坡、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英语。而使用型变体则主要指作为外语的变体。由于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语用变体。随着对世界英语的研究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使用型变体很有可能变为制度化变体。Taavitsainen(塔维采宁)和Paivi Pahta(佩伊维·帕赫塔)认为，随着使用英语人数的增加，二语者将向内圈的母语者转变，而扩展圈内的外语者将向外圈里的二语者转变。

内圈包括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这些英语是其他英语变体的规范提供者，其中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在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眼中比其他3个更为规范和标准。外圈包括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南非英语和其他30多个国家的英语变体。这些英语被认为是规范发展型，其变体已带有较强的本地语言和文化特征。这些国家把英语作为辅助语言使用。扩展圈包括德国英语、中国英语、日本英语、韩国英语等。这些变体大多数分布在亚洲和欧洲，被看作规范依附型，其英语的标准主要来源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这些国家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和使用。

Kachru认为世界英语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使用英语的模式或变体，其理论宗旨是分析英语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与变化，试图揭示各种变体的典型特征。不容否认，英语从走出英国的那天起，在经历全球化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发生了本土化变化。

3.1.3 认同协商理论

Stella Ting-Toomey(斯特拉·汀·图梅)，华盛顿大学博士，现任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人类交际研究学教授，在跨文化交际领域中享有权威的地位。她在《跨文化间的交流》(*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中详细地介绍了认同协商理论并提出了自己在成功实现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独到见解。认同协商理论借鉴了社会认同理论、符号互动论和辩证关系等学说，是集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为一体的综合的理论创新视角。该理论以跨文化交际中起重要作用的8个认同领域为理论基础，涵盖4个基本领域(稳定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性别和个人认同；4个情境领域(随情境变化而变化的)——角色认同、关系认同、面子认同和符号互动认同。

认同协商理论的关键就是对认同的安全性和脆弱性的考虑。它解释了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如何深远地影响着人的认知、情感和互动的。认同协商理论强调，认同或自我观念的反思被视为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解释机制。而认同则是指个体们在一种文化下的某个特定的交互情境中所构建、经历和交流得到的自我形象。而个体们试图表达、定义、修改、挑战以及(或者)支持他们自己与他人预期的形象。从狭义的角度看，认同协商就是一个相互的交流活动。交流者试图激发自身所追求的身份认同，同时也会对对方的身份表示支持或发出挑战。协商视角强调的是文化价值同自我观念之间的联系。在各民族人民用英语与他人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对于身份追求的协商过程。这是各民族人民文化价值观念与自我观念的一种联系产物。认同协商的主要目标就是在跨文化交流中运用有效的方式获得正确的自身及对方身份的认识。该理论认为，不管来自何种文化的人在任何一种交流情境中，都追求积极的以群体或个人为基点的身份认同，以期实现文化间的理解、尊重和相互的支持。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群体的文化身份特点，公众皆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是“存在之居所”“人类最后的家园”。语言问题的根本是身份认同问题。既然英语霸权的趋势无法阻挡，那各族人民就必

须在固守自己的母语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学习英语，以兼容并蓄的心态来对待英语以及西方文化，加强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世界英语中各国英语的变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从民族的广泛心理和认同的角度看，学习英语、使用英语不应该改变他们的文化认同，讲英语的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讲英语的澳大利亚人也仍然是澳大利亚人。有相当多的英语娴熟者明明知道英式或美式语音语调，但仍然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英语，正是身份认同的内在原因在起作用。讲具有本国语言特色的英语在某种程度上说有利于说话人的认同安全感的产生。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这样说："作为华人，你英语说得再好，你还是华人。要是你没有华文文化和华语，那是很可悲的。当年我们倘若没有改变制度，推行双语政策，那我们的英校生只学英文，就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3.2 英语本土化的成因

3.2.1 语言接触

英语跨越国界传播到各个国家时，必然会与当地的语言接触，继而衍生出本土化英语。在任何一次语言接触的过程中，最终语言如何变化，取决于交际各方的语言输入，即相关各方母语的语言结构和形式，这是语言发展的基础。通过语言接触成长起来的一种语言所具有的特点是交际各方的母语相互竞争的结果。当英语与其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碰撞的语言相互竞争后又繁衍出一种新英语时，这种英语必定是既有内圈英语的特点，又有与英语接触的某一国语言的特点。新英语是两种语言接触的“混血儿”。

3.2.2 语言调和

交际各方为表示合作诚意，竭力使彼此的语言形式相互接近，以便尽可能地成功沟通和获得对方的赞同。这样，就有一个语言趋同的过程。英语与其到达国的语言发生碰撞时，操内圈英语即所谓“标准英语”的交际方将会有意降低语言表达的标准，改变原先的语言习惯，去适应当地人；同时，当地人与说“标准英语”的外来者选择用英语沟通时，也会主动提升他的英语表达，尽量使自己的英语接近“标准英语”，没有本族语的痕迹。这个双方相互调和以期适应对方达

到各自交际目的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标准英语”的原貌，吸纳受当地母语影响的一些非标准但又接近英语的语言内容，从而诞生一种新英语。与标准英语接触的当地语越类似英语，这种调和越少，新英语与“标准英语”的差别也就越小；反之，当地语若与“标准英语”差异较大，如英语和汉语(一个属于印欧语系，一个属于汉藏语系)，这种调和就要多些，由调和造就的新英语也就更具特异性。

3.2.3　语言的使用

这是外圈国家英语本土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英语在外圈国家曾经是殖民统治的工具。英语殖民者通过培养当地的英语人才巩固其统治。英语在外圈国家的本土化依靠的不是母语人口的壮大，而是不断壮大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使用者。在这里，英语成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印度英语就是外圈英语的典型代表。早在15世纪，英语就随着英国商人进入印度。17世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立足，并逐步开始殖民统治。1835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宣布在印度推广英语，以培养一部分精通英语的印度精英协助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管理。期间，英语在印度的普及和运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精通英语的印度人比不懂英语的印度人更容易得到在英国人领导的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英语经过印度人的改造，最终成为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语言变体——印度英语(Hinglish)。

3.3　英语本土化的表现

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必然会使英语同当地的语言、文化、习俗等相结合，从而导致它的变异，形成带有本地特征，并在各个层面(语音、词汇、语法、话语、语域、风格、文学流派)与母语英语有不同程度差异的英语变体。这些变体很早就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注意，对其在各个层面的调查和研究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对变体的各个层面来说，在语言学方面，对语音、词汇的研究较多，各种变体在这些方面的差别最明显、最活跃，在拼法上也可能不同于母语英语；对语法有一定的系统研究，各种变体在语法上的变化相对稳定，但也有规律性的变异。对语篇这个重要的层面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展开研究(孙骊，1989)。

各种英语变体在词汇层面的变异最具有本土化特色，这种本土化气息在内圈、外圈和延伸圈国家的英语中都十分普遍。20世纪地方英语词典的诞生就是对这些英语的本土化进行研究的成果。20世纪三四十年代，*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1938—1942)出版。该词典突出反映了美国英语词汇不同于其他英语地方变体的特定用法，揭示了美国英语词汇和美国历史文化的紧密联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反映其他英语地方变体的词典应运而生，成为各地方英语变体的领航者。如，*The Australian National Dictionary*(1988)，*The Canadian Oxford Dictionary*(1997)，*The Dictionary of New Zealand English*(1988)。此外，还有反映本土英语的网络词典，如*Dictionary of Indian English*(http://www.vsubhash.com/desienglish.asp)。所有这些词典或词库从

词汇层面揭示了英语本土化的现象。下面以澳大利亚英语、菲律宾英语和中国英语的词汇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其分别代表内圈英语、外圈英语和延伸圈英语。

语言学家把澳大利亚英语的词汇分为澳大利亚人创造的新词，如Bushfire(丛林火灾)，Bush Lawyer(就自己不了解的事给人提建议的人)，Bushranger(乡下人)，Bush Tucker(家常便饭)，Kangaroo Dog(帮助捕猎袋鼠的狗)，Beefwood(因为树种的颜色红而被叫作牛肉树)，Blackboy(这种树远远地看像系着草裙背着长矛的土著少年)等。正如美国英语借用美洲印地安语，新西兰英语借用毛利语一样，澳大利亚英语借用土著词汇，现在已经成为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一部分，如Akker(指辛苦工作)，Gibber(石头)，Kangaroo(袋鼠)，Berigora(褐色的鹰)，Boobook(相思鹦鹉)，Koala(考拉或树袋熊)，Boomerang(飞镖)，Dingo(野狗)，Jerryang(小鹦鹉)，Tandan(鲇鱼)，Koradji(祭司)，Mogo(斧)等。还有外来词，主要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集中在饮食语汇上，主要源于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几种欧洲语言，如Schnitzel(炸牛排)，Croissant(面包或面包卷)，Broccoli(西兰花)，Macaroni(意大利通心粉)等。澳大利亚英语离开英国本土，来到社会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澳洲之后，新词涌现是一种必然。

菲律宾英语特有的词汇很多，多数是移民语言和原居民语言(他加禄语)的拼凑，有些来源于原住民语言。来自菲律宾原住民语言的词汇，如饮食类词汇Boodle Fight(手抓饭)；服装类词汇Malong(菲律宾国服——马隆)；交通类词汇Jeepney(吉普式公交车)；日常用语Go ahead(马上离开)，the Other Day(前天)等。来自移民语言和他加禄语的特有词汇，如来自西班牙语的Sir/Ma’am(先生或夫人，对男人和妇女的尊称)；来自本族他加禄语的词汇Salvage(草率处决)，Tablea(巧克力片)；Guinit Helmet(遮阳头盔)等。还有菲律宾英语的特有词汇，如Apartelle(低价旅馆)，Golegiala(女中学生)等。菲律宾英语同样也是语言接触和文化碰撞的必然产物。

中国英语的特有词汇也同样丰富多彩，遍布中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治领域中的One China Policy(一个中国政策)，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look(科学发展观)，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Harmonious Society(和谐社会)

等；经济领域中的Yuan(元)，Jiao(角)，Fen(分)，RMB(人民币)，Joint Ventures(合资企业)，State Manufacturers(国有生产者)，Western Development(西部大开发)等；文体领域中的Fair Play(公平比赛)，Mahjong(麻将)，Beijing Opera(京剧)，Kungfu(功夫)，Taiji(太极)，Hutong(胡同)，Chinese Knot(中国结)等；思想领域中的Confucianism(儒家思想)，Taoism(道教)，Two Civilizations(两个文明)，Reform through Labor(劳动改造)等；民生领域中的Longan(龙眼)，Lichi(荔枝)，Hot-pot(火锅)，Tofu(豆腐)，Qipao(旗袍)，Jiaozi(饺子)，Wonton(馄饨)，Birdnest(燕窝)，Bear's Paw(熊掌)，Beggar's Chicken(叫化鸡)，Maotai(茅台酒)，Hukou(户口)等。同样，中国英语词汇也反映着社会的变迁并渗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

3.4 英语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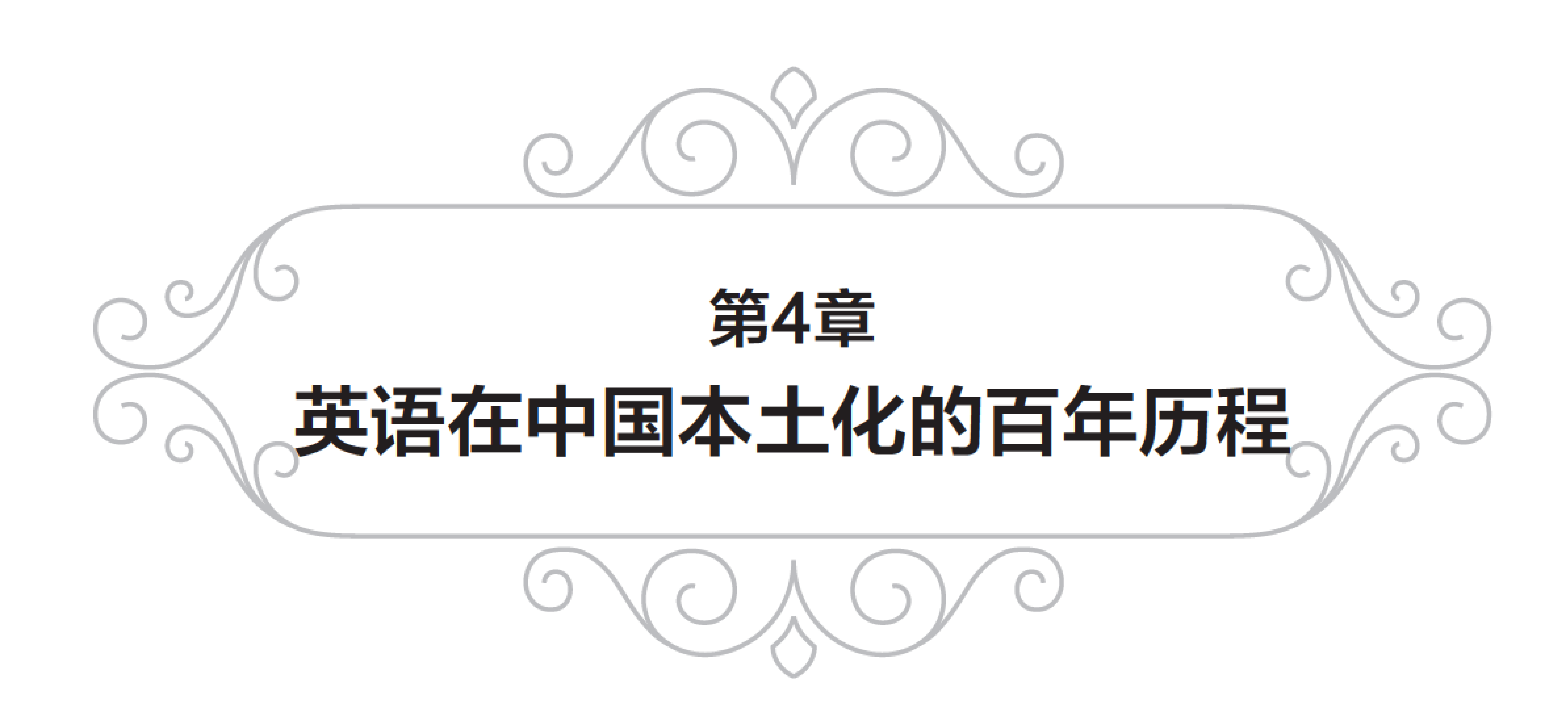
首先，英语本土化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用来表述现实、传递信息、传承文化的。而不同的社会又拥有不同的现实和文化。英语每到一个地方，它原有的结构在表达现实的时候便显得力不从心，需要使用本土语言中的一些要素和思维习惯。对于大多数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的学习者来说，他们学习英语的目的并不像英语母语者那样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而是仅限于一定的功能，如工作、娱乐、科研或者出国留学等，这就意味着他们对英语的掌握和使用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英语本土化有着不短的历史，而且趋势依然。《牛津英语大辞典补编》的主编Robert Burchfield(罗伯特•伯奇菲尔德)说过，当在8世纪人们首次记录英语时，它已经有分裂的倾向。在未来的世纪里，英语将继续分裂和再分裂，直至具有百面千相。英伦三岛和其他母语国家的英语口语已经够五花八门了，将来仍免不了进一步改变形态和风格。

任何语言工程和语言立法都不能阻止将来的变化。以美国英语为例，当第一批定居者踏上美洲大陆的时候，他们的英语就开始了从英国英语中分化的进程。到18世纪中叶，当Webster(韦伯斯特)开始编撰美国英语的第一部词典的时候，美国英语中就已经有数百个词汇不为英国人所知，拼写也开始不同于英国英语，语音的分化更是显而易见。到今天，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不同之处数以千计。正如Dylan Thomas(狄兰•托马斯)所说的那样：“两种文化被同一语言的屏障所阻隔”(Crystal 2001)。日本学者Nobuyuki Homa(诺布尤基•霍马)(2001)打过一个形

象的比喻：中国烹调如果被加以调整以适应日本人的口味和饮食习惯的话，就不可能在日本流行。他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语言。“英语的全球化加剧了本土化，而本土化又是全球化的代价。英语成为国际语言正是因为它能被多种文化所丰富……一种共同语言其实是一种多样化的语言，它应该留有余地，接受差异。如果美国英语的标准被强加给所有的英语使用者的话，它永远不会成为国际通用语”(同上)。

其次，英语本土化推进全球化进程。随着英语本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英语在内圈国家和外圈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进一步推动了英语的全球化进程。据David Crystal(2001)统计，全世界有57个国家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人口约4.5亿；67个国家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人口约3.5亿；而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延伸圈国家，如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尼、巴西等，以英语为外语并且具有相当水平的人口达12亿之多。因此，世界上几乎1/3的人口掌握了英语，以英语为外语的人数超过了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人数。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际互联网的普遍使用，英语国际化的趋势更加势不可挡。



第4章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

从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我国澳门到今天，英语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传播了近5个世纪。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是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即英语受到源远流长的汉语语言和汉民族文化影响的过程。

贸易和传教活动对英语在早期中国民间的传播过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早期的中西贸易中，中西双方都不愿意学习对方的语言，于是产生了一种不中不西的语言——皮钦语。

皮钦语，也称“别琴英语”，又称混杂语言(Pidgin)，指由不同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从纯粹语言学的观点看，皮钦语只是语言发展的一个阶段，指在没有共同语言而又急于进行交流的人群中间产生的一种混合语言，属于不同语言人群的联系语言。它经16世纪中期澳门葡语发展为18世纪盛行的广州英语，至19世纪中下叶流行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前后历时3个多世纪。尽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时至今日皮钦语几乎已经消亡。但是，在中国早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在中外贸易往来和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上海洋泾浜英语盛行时期，社会上还出现了上海洋泾浜英语培训班，可以说是我国民间英语培训的雏形。

西方传教活动也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19世纪初期，西方国家为了推行基督教文化陆续来中国传播福音。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受伦敦教会的派遣来华传教。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对外闭关政策以及民众对基督教义的不了解，传教活动很难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外国传教士希望通过创办教会学校的形式打开传播福音的道路。1818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这所学校不仅是外国人在华设立的第一所教会学校，也是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开端。此后，小规模的教会学校逐渐在中国的港口城市得到了发展。教会

学校虽然教授标准英语，但是其涉及的内容比较狭隘，主要包括日常用语以及基督教的教义等。可以说，早期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是传播福音的工具，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

19世纪末期，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不规范用语在交际中带来的不便，上海洋泾浜英语逐渐消亡，“标准英语”开始登上中国外语的历史舞台，也开启了中国人对“标准英语”的崇拜。中国式英语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

两次鸦片战争的屈辱失败，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也在开明士大夫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清政府分别创办了一批学习“西文”(即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开始教授“标准英语”，其中以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最为典型。随后的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清政府更加认识到英语的重要地位。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经清政府批准并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壬寅学制正式把外语(英语、法语、日语)列入课程，在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标准英语”的地位。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200多年的清朝统治，结束了倡导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兴起了“全盘西化”的文化模式论，作为一种沟通中西文化的媒介，英语备受整个社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经历了短暂的英语低潮期，英语仍然稳居国内外语之首。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期这段时间，虽然中国式英语饱受非议，但它在交际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反映了中国人在学英语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并促成了中国英语的出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改革开放政策，“英语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虽然中国式英语与中国英语的区分界限一直比较模糊，因为这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渐变过程，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葛传椝先生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率先提出来的中国英语概念代表着中国英语的正式出现。

从中国英语的第一次正式提出到现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英语正在朝着健康的发展方向努力前行，逐渐摆脱中国式英语的羁绊，成为具有独特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语言层面的巨大力量。

4.1 16世纪中期的澳门葡语

4.1.1 澳门葡语的产生背景

16世纪欧洲新航线开通以来，西方的触觉开始向全球伸展，中西接触也明显增多。据历史记载，葡萄牙人是近代最早到东方进行殖民活动的西方人，他们也是第一批来华的西方人，因而葡萄牙语是最早与东方语言接触的西洋语。在交往中，人们既不用葡萄牙语，也不用汉语，而是逐渐创造了一种“汉语和葡萄牙语的混合体”(a Medley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澳门葡语”。中国最早的皮钦语就可以追溯到澳门葡语，它是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我国澳门之后作为一种贸易语言而产生的，其首要的功能是为了双边贸易，其次是为了传教(周毅，2005)。在英美开始成为中西贸易的主角之前，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中西关系中起到了别处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1511年，即明武宗正德六年，葡萄牙殖民者攻占了当时南洋贸易中心地满剌加(今马六甲)，继而侵犯中国东南海域。1514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抵达觊觎已久的广东海岸。1517年，安剌德率领四艘武装葡船及四艘马来船，闯入珠江，开炮示威。这是第一次见于中国史籍记载的前来广州港的葡萄牙船队。自此之后，葡萄牙舰船更加频繁地进出广州口岸。他们所到之处劫夺商旅，掠买良民，贩运禁品，筑室立寨，甚至武装袭击广东沿海地区。1523年，即明嘉靖二年，明朝军民在广东新会海面击溃葡船。葡人在广东被逐后，又北串浙江、福建沿海，与倭

寇勾结，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海域，强占一些岛屿，并盘踞达二十七八年之久，后被中国军民驱逐。1553年，即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改换策略，私下买通明朝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登陆澳门。1554年，葡萄牙人进入广东浪白澳。1557年，潜入澳门建小货栈，更以租借为名，用贿赂手段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并宣布正式开埠，长期霸占澳门。从此，开始了西方列强对澳门400多年的殖民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也揭开了澳门葡语历史的篇章。

4.1.2 澳门葡语的语言特征

葡萄牙人刚到澳门时发现无法与当地人沟通，语言不通造成了交流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当地人出于生计的需要也希望能跟葡萄牙人及其他洋人交流。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一种以沟通交往为目的的澳门葡语。但须说明的是，当时的西方人并没有给这种语言一个专门的称谓，所谓“澳门葡语”只是后人的说法。这种语言主要由中外商人、水手、中国通事与买办使用，后来也成为外国传教士和当地店主、苦力的重要交流工具，是一种由葡萄牙语、英语、印度语、马来语和中国粤语混合组成的杂交语言。“澳门葡语”不但完全区别于正宗的葡萄牙语，而且还在长期使用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词汇、习语和发音，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交流媒介。照卫三畏博士的说法是：“尤其在仆人和店主那里所讲的这种方言，是葡语和汉语的大杂烩；它的用法和发音与真正的葡萄牙语相讹误如此重大，以致刚从里斯本来的人几乎听不懂。”

明清时期，中国朝野盛行“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观念，且根深蒂固，士人耻于过问这种“下人”和“夷人”的“鸟语”，因此，对澳门葡语进行研究的国人寥寥无几。印光任、张汝霖著的《澳门纪略》的《澳译》部分收录了395条澳门葡语词条，分5类，即天文类83条、人物类161条、衣食类52条、器物类48条、通用类51条等(刘月莲，2003)。这些词条以汉字记录，主要以粤方言拼写，也有以闽方言拼写的。《澳译》中记有“皇帝”，汉字注音为“燕罢喇多卢”，葡文对应为“Imperador”；“澳门”，汉字注音为“马交”，葡

文对应为“Macau”；“五月”，汉字注音为“马约”，葡文对应为“Maio”；“十二月”，汉字注音为“亚我斯笃”，葡文对应为“Agosto”；“小西洋”，汉字注音为“我呀”，葡文对应为“Goa”；“兵头”(即“总督”)，汉字注音为“个患那多虑”，葡文对应为“Governador”；“和尚”(即“神父”)，汉字注音为“巴的梨”，葡文对应为“Padre”；“唐人”(即“中国人”)，汉字注音为“支那”，葡文对应为“Chines”；“恭喜”，汉字注音为“没度扫煨打地”，葡文对应为“Muito Saudade”；等等。另外，在《海录》一书的“大西洋”条里，“国王”，汉字注音为“哩”，葡文对应为“Rei”；“一等文官”(即“首相”)，汉字注音为“善施哩”，葡文对应为“Chanceller”；“海岸”，汉字注音为“哥什嗒”，葡文对应为“Costa”；“法官”，汉字注音为“油衣使”，葡文对应为“Juiz”；等等(刘月莲，2003)。

4.1.3 澳门葡语的影响和作用

澳门葡语是中国洋泾浜英语的雏形，与后来的广州英语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洋泾浜英语的特点而言，澳门葡语是广州洋泾浜英语的前身。关于这个立论，几乎不存在疑问和争议。然而，有关广州洋泾浜英语是怎样从葡语脱胎而来的，我们至今知道甚少。美国人亨特的著作提供了一些语源学方面的证据。如广州英语中的Mandarin(官员)来源于葡语Mandar(命令)一词；Compradore(买办)来源于葡语Compra(买)一词；Joss(菩萨)来源于葡语Deos(宙斯)；英语Great(伟大的、宏达的)，在广州英语中注音为“架栏地”，是葡语Grande(宏大的)的读音演化而来的；英语soup(汤)，在洋泾浜英语中读音为“苏披”(Soo-pe)；英语merchant(商人)，在洋泾浜英语中读音为“麻占”(Ma-chen)；英语Country-ship(国家船，即中西贸易船)，在洋泾浜英语中读音为“港脚船”。马廉颇亦称：“考虑到当时葡萄牙语是中西贸易中的通用语言，加之早期称英国或其主要部分英格兰的发音，都与上述称呼可以对音，故早期对英国的称呼，很可能译自葡语……”在我国古籍中，成书于1745—1751年的《澳门纪略》使用“英吉利”3字译英

国，而实际上，从1707年起，英国的正式国名已是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王国(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在《联盟法案》下统一，国名正式定为“大不列颠王国”)，故《澳门纪略》中“英吉利”一名显然译自葡语(马廉颇，2003)。毋庸置疑，“澳门葡语”是后来“广州英语”的母体。

随着18世纪英国殖民势力的日益强大以及广州贸易地位的提升，澳门葡语作为中外贸易主要媒介的地位渐渐削弱，但它对中国英语的雏形——广州英语(Canton English)或广州行话(Jargon Spoken at Canton)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澳门葡语在近300年的中葡贸易交流中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19世纪之后，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逐渐取代葡萄牙这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中国贸易的主要国家，广州、上海陆续成为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同时，作为一种优势媒介语的英语演化出的中英混合语应运而生，中葡混合语“澳门葡语”因此而失去其重要地位。澳门葡语是早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产物，也是第一批西方殖民主义者渗透中国的副产品。

4.2 18世纪的广州英语

4.2.1 广州英语的产生背景

早在15世纪末，英国就开始探寻通往中国的道路，希望能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时代，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殖民扩张思想广泛传播，印发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其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找到通往中国的新航线。

从1576年开始，英国的商队便不断探索通往东方的航路。1588年，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一举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后起的欧洲海上强国。1600年，英国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旨在向东方进行有计划、有规模的经济掠夺。英国在南洋群岛、日本等地开展贸易，于是与中国建立起频繁的间接贸易关系。1637年，约翰·威尔逊船长率领四艘英国船队首次到达中国广州，企图与中国建立直接的通商关系，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揭开了明清时期中英关系的序幕。1685年，康熙皇帝接受了沿海地带地方官员请求扩大对外贸易的主张，奏准了朝贡国以外的国家可与清政府进行贸易，英国也因此获得了对华贸易的许可。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当时英国对华贸易在各国中占首要地位。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英国船只“马克来斯菲尔德号”第二次进广州港，英国输华的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印度棉花和檀香等；中国输英的主

要商品是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等。同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获得到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之后英国到中国的船只日益增多。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对中国的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基础之上，于是在广州设置了一个固定员司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通常由12个管理商务的代理人组成一个单一的团体，一般由三四个职位较高的成员组成一个特派委员会，直接受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领导，这个特派委员会的首领，中国人称之为大班。《东印度公司编年史》中记载："1715年，在中国沿海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语言……"从1637年到1715年，广州的中国商民和被称为"红毛番"的英国人已打了大半个世纪的交道。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人渐渐记住了后者一再重复的、对生意来说至关重要的字眼，极力模仿"红毛番话"那古怪的发音，然后按自己的语言习惯拼凑成句子，用以完成日常接触沟通。这样一种近乎文化奇迹的语言是不可能突然出现的，在1715年之前一定已经经历了日积月累的准备。也许，英国商馆的人员到1715年才注意到这种语言，将它记录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之中。1757年清政府以英国人不遵守中国法令为由，规定广州港为清政府与西方国家进行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取缔了其他3个通商口岸。从此，清政府的对外贸易进入广州一港时代。此时，英国在中西贸易中的地位上升，已占据全部中西贸易额的80%以上。英语地位压倒葡语，于是产生了以广东土音注读英语的所谓"广州英语"(西洋人称为Canton English)，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英语"代替了"澳门葡语"。

在这之后的近百年间，广州英语无疑在中西贸易和其他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人与来自不同国家的西方人士沟通的语言媒介。

广州英语也称"Pidgin-English"，为汉语和外语混杂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广州英语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全盛时期。关于"广州英语"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8世纪40年代的一本英国人的航海记中。其中有两个例句："I moiki handsome face for he；I moiki grandi chin-chin for he"(均表示"我向他致意")(周振鹤，2002)。

4.2.2 广州英语的语言特征

广州英语是鸦片战争前100多年间中外交往的主要媒介语言，是一种民间汉语和英语接触的产物，并成为中英商人的通用语，主要用于外国人主子和中国仆人、中国店主以及外国商人、外国航海者与中国船员等之间的交流。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描写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初到广州时，许多来访问他的中国人大致都能讲英语的情形。确切地说，这些中国人讲的是广州英语，有时他并不能完全听懂。

1836—1837年一位经澳门来广州的西洋人出版了《番鬼在中国》，详细记载了他与中国人接触时听到各种人讲广州英语。1836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刊文，介绍在广东佛山刊印的两本有关洋泾浜英语的教科书：《红毛通用番语》与《澳门番话杂志丛抄》。从《红毛通用番话》中可以知道：这种语言主要作为一种口头交际语流行于广东地区，靠声音而不是文字，靠听讲而不是阅读进行交流，故拼写形式也不固定。这本小册子收集了广州英语词汇380条，分为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谚语通用门、食物杂物门4项，主要以贸易和日用词汇为主(吴义雄，2001)。

广州英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具有一定的特征：广州英语的发音与真正英语的发音区别较大，它的主要特点是将汉语或广州方言的某些因素带入英语。广州英语主要是一种口头交际语言，因此，发音就成为它的首要因素。它之所以被看成“粗俗难懂的土语”，首先就是因为它在发音方面与真正的英语有相当的距离。在没有专门学习场所、没有标准英语的教材、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的情况下，主要由下层人士使用的广州英语在发音方面存在偏差，是无法避免的。其偏差的特点在于人们将汉语或广州方言的某些因素带入这种“英语”——时人所称的“番话”。

亲自考察过广州英语的卫三畏指出，“由于汉语发音具有单音节特征，而英语单词中却包含许多元音，成年人几乎无法准确地说出3～4个音节的词，特别是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时候。结果是人们说这种词的时候，发音变得支离破碎，对

不熟悉这种情况的外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听懂的”。

汉语不存在复辅音(上古汉语除外)，所以有复辅音存在或以辅音结尾(包括e结尾的开音节)的英语词往往需加上一个元音，以形成中国人易于发音的音节。如Catch读作Catchee，Make读作Makee，Much读作Muchy。当时广州人用粤方言注英语读音，经常用相近的其他因素来代替标准英语中的发音。如“Man”(男人)注音“曼”，“Soup”(汤)注音“苏披”，“Today”(今日)注音“土地”。

词汇方面，广东英语的一些词汇来源于澳门英语，如上文提到的英语Great(伟大的、宏大的)，在广州英语中注音为“架栏地”，是由葡语Grande(宏大的)的读音演化而来的。卫三畏还认为，由于发明和使用广州英语的基本上都是广州地区的各类人，这又使它的发音带上了广州方言的特色。他认为广州方言缺少b、v、d、r、st等音素，这样在广州英语中就分别以p、t、l、sz等取代。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例如广州方言中b、d还是有的；v则是中国所有方言中共同缺少的，并非广州方言独有的现象，r也是大多数南方方言中所没有的，用sz(相当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s)发st(相当于汉语拼音中的sh)的音，也是许多缺乏卷舌音方言的共同特点；此外，英语中th这个音素，因汉语中没有，所以广州英语也发不出，如Thing在广州英语中便发成“听”。所以，卫三畏在此所揭示的毋宁说是汉语发音特点对广州英语发音的又一重要影响(吴义雄，2001)。

还有一些词汇是中国民间“语言学家”们创造出来的。广州英语的词汇量很小，易于记忆和使用，所以常常有多种意义的单词。如chop，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某种文件”，但同时又有着十分广泛的用途：chop可以表示一个店主的账单；上谕和官员的告示；期票、收据、印花或印信、起落货物、商标或者特许状等的称呼。广州英语的语法较真正的英语有大量的简化与删改。广州英语没有人称、数、格、时态和语态等语法变化，所有的单词基本上是只有一种形态，各句子成分基本上按照汉语或广州方言的词序来排列。简而言之，广州英语是一种按照汉语的特征和习惯来表达的英语。下面是一段广州英语的对话：

中：Chin-chin，how you do，long time my no hab see you.

外：I can secure hab long time，before time my no have come this shop.

中：Hi-ya，so，eh! What thing wantchee?

外：Oh，some litty chow-chow thing. You have got some ginger b sweetmeat?

中：Just now not got，I think Canton hab got velly few that sutemeet.

从这段中外人士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州英语在语法上的简化和汉化。动词如Do，Got，Come等没有时态变化，My是I的误用，Hab是Have一词的广州英语发音，词序几乎完全是汉语的排列模式。又如：You wantchee eat? (你要吃吗？)；My no can find the house key(我找不到房门的钥匙)；You see no see the play? (你看不看这出戏？)简言之，广州英语是一种按照汉语特征和习惯来表达的口语。

由上面的例子可见，广州英语作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双方在商业往来上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其宗旨是为方便口头交流，实用目的强，其特点是：采用中英对照及汉字注音的形式，语序以汉语语法为基础，语句以单词组合为特点，发音以粤语方言为主。广州英语虽然不太规范，使用的范围有限，然而它在近代中国认识、学习和掌握英语，在减少早期中外交流(尤其是中英、中美之间的交流)间的语言文化障碍以及促进五口通商的发展和繁荣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广州是当时主要国际贸易中心之一，然而当地方言或中国官话都没有为贸易各方所使用，反而由当地人创造出一种不中不西的语言，成为中西贸易与交往的媒介。造成这一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中国而言，闭关时期清政府严禁国人学习英语；士大夫阶层鄙视“番鬼”“番语”和西方文化而不屑于学习他们的语言；西方殖民者经常骚扰中国沿海港口，造成中国民众敌视西人，不愿学习西方的语言。就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政府禁止国人与西人之间自然的语言交流，若有国人教夷人汉语，以叛国罪论处，这使西人无法合法地掌握汉语，以作为正常的交际语言；当时中国缺少初级汉语语法书籍及词汇手册等学习汉语的材料，增加了西人学习汉语的难度；中文的方块字不便于记忆，语言学习耗时过大。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以西方文明优越感与殖民者姿态傲视中国(周毅，2005)。

他们认为西方人在思维、语言上较中国人优越，学习中文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利益。因此，他们中愿意学习汉语的人很少，精通汉语的外国人几乎没有。美国人William C.Hunter(亨特)(1882)在其《广州“番鬼”录》中描述：“在我1825年到达中国后的几年中，只有3个外国人是中国通，一个是马礼逊博士；一个是现在的John F.Davis(达庇时)先生(即刚卸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本部总督)；最后一个就是我这个美国人。”

4.2.3 广州英语的影响和作用

这种没有句法、逻辑不清、词汇有限、读音不准的广州英语，是鸦片战争前100多年间中外交往的主要语言媒介。它承载了一个多世纪影响深远的中西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层面的交流与冲突，沟通了两个缓缓相遇的世界。换言之，尽管广州英语存在着很多缺点，但是毕竟是曾经承载着中西政治、文化、经济交往作用的重要交际工具，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它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广州英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它以其独特的语言解读方式和顽强的生命力存在于中西间的邂逅、相识与成熟的交往过程之中，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语言研究价值。从《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随着上海崛起为新的贸易中心，洋行和外商向通商口岸上海转移，上海成为口岸重心，广州也逐渐地失去了其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心的主体地位，这导致了广州英语走到了其使命的尽头。另一种新的中英混杂语言——上海洋泾浜英语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4.3 19世纪中叶的上海洋泾浜英语

4.3.1 洋泾浜探源

上海洋泾浜英语在城市“上海”之后又加上“洋泾浜”3个字，这“洋泾浜”所谓何意？“泾”，本意专指泾水，渭水支流。有南、北二源。北源出宁夏六盘山东麓固原县，南源出甘肃省华亭县，至平凉县境合流后，又东南流入陕西省，至高陵县入渭河。泾、渭二水，一清一浊，虽合流汇聚，却清浊分明，比喻界限清楚，是非分明。此外，我国有许多以“泾”字命名的地名，如泾县(安徽省)，周泾村(上海市)和周泾桥(江苏省)等。“浜”，小河沟的意思。宋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上・城邑》：“观於城中众流贯州，吐吸震泽，小浜别派，旁夹路衢。”明代李翊《俗呼小录》：“绝潢断港谓之浜。”清代魏源《东南七郡水利略叙》：“三江导尾水之去，江所不能遽泄者，则亚而为浦……泾、浜、溇。”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大旱》：“港或浜什么的都干到只剩中心里一泓水。”“浜”字也多用于地名，如沙家浜，张华浜等。“洋泾浜”亦指地名，洋泾浜原本是上海黄浦江一条支流的河名，它东引黄浦江水经八仙桥西流，北通寺浜(今慈溪路、重庆北路一线)、宋家浜(今苏州河)，西通北长浜(今延安中路)，西南通周泾(今西藏南路)。全长1.6千米，浜身蜿蜒弯曲，东段河面宽不足40米，中段和西段宽60余米。它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浜，却四通八达。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被迫公布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商妥”的《上海土地

章程》，同意把洋泾浜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外滩)南一带作为英人居留地。这是上海有史以来划出的第一块英租界。1849年4月，上海道台麟桂又屈服于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的淫威，宣布将洋泾浜南、护城河(今人民路)北划为法租界。从此，本来默默无闻的洋泾浜成了颇受瞩目的上海英法两租界的界河；而“洋泾浜”(或“洋泾”)一词，则一度用作租界的代称。随着两岸住房陆续兴建，人口大量增加，商贾云集，洋泾浜水日趋污浊，且阻碍交通，有碍卫生。1914年英法租界当局开始填浜筑路，1915年底建成的道路取名爱多亚路，也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直至1943年两租界消亡，此路一直是上海城区仅次于外滩滨江大道的最宽的马路。

澳门葡语诞生在澳门，广州英语诞生在广州，上海洋泾浜英语诞生在上海洋泾浜这条界河两岸。

4.3.2 上海洋泾浜英语的产生背景

这种特殊英语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时间约为1840年至1919年。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1845年，英国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开辟了英租界。不久，美国、法国纷纷在上海设立租界。在洋行、旅店、外国使馆就职的中国人以及经常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黄包车夫及仆人对广州英语并不熟悉，在日常交往中，开始采用上海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方言与英语的混合语进行贸易及日常生活的交流。中国的“洋泾浜英语” 最早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贸易大环境中，是外国传教士、商人与中国的小店主与下层苦力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语言。创造并使用这种洋径浜英语的人都是文化程度极低的下层劳动者，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所以他们口中的这种洋泾浜英语与正规的英语相距甚远。虽然洋泾浜英语不属于正规的英语，但它也有丰富的词汇量、稳定的词法与句法，并在广州、上海等地一共流传了300年的时间。

上海洋径浜英语就是在这种双方迫切需要交流、中国下层人士对英语的努力

模仿和外国人对英语语法语音的宽容与配合之下逐渐诞生出的一种虽很不规范但又能为双方提供最低级的语言沟通的“混合语言”，它在语言学中被称为lingua franca。简单的贸易过程与参观浏览都可以在这种“混合语言”中勉强完成。在这个“混合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双方都把对语言的交流压缩到最低限度。如1841年9月的《中国丛报》第十卷第九期上有一篇英军写的文章说明了这种“混合语言”的使用情况：“很多印地语和英语的词汇被缩短得这么厉害，以至于连阿德隆(出版第一部德语字典)这样的语言学家都会莫名其妙。但是这些词却被使用它们的人们所很好地领悟。”

上海开埠本身就是鸦片战争失败后屈辱条约《南京条约》的产物，因此在双方的实际交流中外国人显然占据了强势的地位，上海人对外国人的态度较广东和内地人不同，大多数的广东人和内地人称西方人为“夷人”和“洋鬼子”，称西方人的居住地为“夷场”；而上海人则称西方人为“外国人”和“洋人”，称上海租界为 “沪北”和“十里洋场”。开埠以后，上海人从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随着上海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上海洋泾浜英语发展迅速，由此也促进了早期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风气开始转变，愿意学习英语的上海人越来越多，教会学校一般不开设英语课程，官立学校的英语教育刚刚开始，正规的学校英语教育满足不了社会对英语的要求，一些英国人和懂英语的中国人为了商业目的，创办了面向社会招生的英语培训学校和夜校。大多数培训学校和夜校学生学习的英语词汇局限于贸易货物，如常见的货物名称、日常寒暄语等；学生的英语也只限于口头表达，难以用书面语表达；教师通过一种以汉语模仿英语读音的方法也就是采用洋泾浜英语教学方法，达到俗称的目的。洋泾浜英语教学方法是一种结合中西语言，但又非中非西，通过那些与英语读音相似的汉语死记硬背来达到临时记住英语单词和简单句子的目的。英文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于上海，由此上海人对洋泾浜英语的高涨学习热情可见一斑。在上海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扇子词典，一种扇面上刻满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的扇子。这种扇子使人们可以在闲暇之余，也能一边扇扇子，一边学英语。扇子词典一度畅销起来，上海

会说英语的人也越来越多。

4.3.3 上海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征

从历史渊源上讲，鸦片战争以后，外语人才也为广州以外各口岸所需，所以能讲英文的广东人士成为江浙一带广为招徕的人才，他们讲的广州英语自然为后来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如果说广州英语源于葡语，那么上海洋泾浜英语则源于广州英语，所以上海洋泾浜英语与广州英语有很大的相似性。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下上海洋泾浜英语在发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特点。

先从发音方面来看，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发音仍受汉语的严重影响。英语音系中/r/音是大多数中国南方方言中共同缺少的，上海的洋泾浜英语中经常有将/r/发错的例子，如把Red读成/led/，把Very读成/veli/，把Right读成/lait/，等等。这一点与广州英语是相同的。上海方言缺少卷舌音，故在发辅音串sh的音时常用/s/来代替。另外，上海洋泾浜英语的音位仍然很少，相近的音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当时的《申报》上发表过一首“别琴竹枝词”，其中两句如下：“店船夷皂羊汤样，少破二字能该云。”意思是说英文的Shop，Ship，Soap，Sheep和Sample只要念一个“少破”的音就可以了。从这两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洋泾浜英语的音位替代现象。

其次从词汇上看，上海洋泾浜英语的词汇量仍然有限，但是相对于广州英语已经有很大进步。出现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中的词汇大约有700个左右，词汇的分类也更细，它打破了原来只有简单词汇和短语的格局，提供了较多的表达语式，如简单会话之类。上海洋泾浜英语的成分基本还是来自英语，夹杂着一些来自汉语或印度语的词汇。和其他洋泾浜语一样，这些词在简缩的策略下被改造。由于对词汇采取简缩遁辞和回避的策略，上海洋泾浜英语中常用词的使用范围比英语原词大得多。清末，有些粗通英文的中国人就开始编写和出版用中文注音的实用英语会话手册，由于作为河流的洋泾浜一直是英法租界的分界河，上海人也常用“洋泾浜”一词指代租界，因此，这种手册大多被叫作“洋泾浜英语手册”。

清末1873年杨少坪的《别琴竹枝词》是目前知道的关于上海洋泾浜英语的最早著录。在竹枝词的序言里，杨少坪指出学习英语与汉语有别，汉语是以字组词，而英语有词无字(所谓“字即语”者)，要使英语说得地道，先要单词发音正确，又要遵守语法。租界里的一些洋泾浜翻译，由于没有语音和语法知识，所说的只能是杜撰英语。这百首竹枝词就从用词与语法方面来分析其错误，以便人们学习正规的英语。与此同时，他也列举了上海洋泾浜英语的一些例子：如“温”(One)就是“一”；“多”(Two)就是“二”；“可牢基”(Clock)就是“自鸣钟”；“来司”(Rice)就是“饭”；“野路”(Yellow)就是“黄色”；“讨克”(Talk)就是“谈生意”。“谷猫迎”即Good Morning(旧沪语“迎”读作ning)；“好度由途”即How do you do；“肆鬼肆”即Squeeze(敲诈)；“密四特”即Mister。此外，更有许多人将上海洋泾浜英语编成了口诀和歌谣，以便让人尽快地记住英语单词，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来是康姆去是谷，是叫也司勿叫拿，靴叫蒲脱鞋叫靴，雪堂雪堂请侬坐”。其含义就是：(来)Come，(去)Go，(是)Yes，(不是)No，(靴子)Boot，(鞋)Shoe，(请坐)Sit Down。

在语法上，上海洋泾浜英语仍不失有对语法进行大量削减的特征。单词的自由形式代替了词尾语有变化的粘着形式，单词的形态变化被词位所替代。此外，性、数、格、人称一致的语法现象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中看不到，它的句法结构被最大限度地简化。汉语对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影响依然巨大，例如，汉语重量词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Piece一词的应用很广泛，已经达到了万能的地步，如用One Piece Girl代替One Girl，Two Piece Book代替Two Books；短语的搭配也常常套用汉语格式，如同Top-side表示Above，用Another Time表示Again。作为为数极少的系动词，其用法非常广泛，如用He belogney English-side now表示He is in English。

作为中外交流媒介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不仅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交往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民间交流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当时来华的英美人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就连其他国家来华的商人和游客也用它来交流。来自美国的冒险家Frederick Townsend Ward(华尔即弗里德里克·汤森·沃德)，多次在中国的战

场和官场沉浮，1862年他娶了上海金融家“泰记”杨坊之女为妻。华尔只能说几句结巴的汉语，杨坊和他的女儿都不谙英语，洋泾浜英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桥梁。一些文学作品也运用洋泾浜英语以实现写作的目的。在勃姆(Bohem)的《来自贵族的军队》(*Of the Nobel Army*)中，女主人公，一位中国妇女使用了一些洋泾浜英语，如：“You no go outside！”(You can't go outside！你不可以出去！)；“You go outside，you quick die.”(If you go outside，you will be killed at once. 如果你敢外出，你就会被打死。)(马伟林，2005)。

进入20世纪后，上海经过正规学校培训的精通英语的人才越来越多，加上大批留学生回国，洋泾浜英语在上海的主流社会淡出，但在普通百姓之中，甚至一直到今天，上海人方言中还留有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影响，不少洋泾浜英语又蜕变为上海的日常用语，如“老虎窗”(Roof Window)、“拿摩温”(Number One)、“枪势”(Chance)、“瘪三”(Beg Say)、“阿飞”(Fly)、“水门汀”(Cement)等。中国洋泾浜英语最初产生于西洋的物质和文化处在“强势”，而中国的物质与文化出于“弱势”之际。在上海租界这个中西文化最为频繁的开放地区，风行一时的洋泾浜英语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周毅，2005)。可以说租界不仅改变了上海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格局，同时也使中西语言与文化交流、传播成为可能。

任何形式的中外交往都必须以语言文字沟通为前提，在早期的中外贸易中产生的洋泾浜英语，是中西方两个历史上彼此间缺乏直接接触的集团，因为生活与贸易中交流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以纯交际为目的的，混杂了中西方语言的变种语言，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成为外来者与当地民众进行交流的主要语言。它由16世纪中期出现的澳门葡语，发展到18世纪盛行的广州英语到19世纪中下叶流行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历经了3个多世纪。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洋泾浜英语到今天几乎彻底消亡，而且作为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洋泾浜英语即便在当时也不太受大众的认同，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语言，很少被纳入正规中国教育体系。

4.3.4 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影响和作用

但是，在那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洋泾浜英语在早期中西贸易交流和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19世纪美国在华的外交官何天爵(1998)在其著作《真正的中国佬》提到：“外国人与当地中国佬之间所进行的巨额贸易有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离了它，您还真是玩不转。”在同文馆设立之前，中外交流在较大程度上依靠懂洋泾浜英语的通事。这些通事受的教育有限，对中西文化认识较为肤浅，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从事比较简单的翻译工作，不可能处理复杂的外交事务。历史上对这些通事的评价往往是贬多于褒，但是通事使早期的中外交流成为可能。民间的一些通事高手有谢清高、罗森等人，这些人的确对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上海洋泾浜英语时期，随着通商口岸以及租界工商业的发展，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对洋泾浜英语的需求，一度开始兴办洋泾浜英语培训班。这些培训班重视英语的实用功能，重视视听说能力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商贸与民间交流的需要，可以说这些培训班为早期民间英语培训的雏形，进而对我国民间非正式的英语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洋泾浜英语不仅在当时起着交流的作用，还对后来的英语和汉语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它融入英语的俚语、习惯用语，丰富了英语的词汇。如当代英语中习惯用语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明显地留着洋泾浜英语的痕迹；另一方面在现代汉语中也有许多外来的词汇，如：逻辑(Logic)、咖啡(Coffee)、可可(Cocoa)、吐司(Toast)、浪漫(Romance)、打(Dozen)、摩登(Modern)等词都是采用英语中的音译法而来的。美国人列文森这样评价其作用：“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

洋泾浜英语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相遇时，双方为了进行交际而特意创造出来的语言变体，是两种不同语种的融合与杂交可以理解为中英语言的变体。语言学家周毅认为从学术年代上讲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之间的划分年代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以宁波人冯泽夫编著的以宁波话注音的

《英语注释》(1860)和上海人曹骏编著的以上海话注音的《英字入门》(1874)为界限的。在这段时间里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在上海对外贸易的大环境里应运而生，迅速成为中西方交流中的重要语言工具，从而渗透到近代上海的各个阶层。同时洋泾浜英语开始与广州英语脱轨，于是清代中西方语言交流中出现了两种“混合英语”并存的状态。由于近代上海在中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使上海洋泾浜英语逐渐走出上海，成为近代中国一切非正式语言的代名词。因此，广州英语也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广州洋泾浜英语。这种中英混合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在中国一直沿用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香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约有200余年的历史。

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已经失去了赖以滋生和发展的殖民土壤。无论是早期的广州洋英语还是后期的上海洋泾浜英语，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中国式语言思维特点，都是英语汉语结合的产物。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最具有中国的标记，最能体现中国人固有的语言思维习惯，所谓的汉语干扰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这是任何一种语言本土化的必经过程，也是英语本土化的必经过程。尽管这两种洋泾浜英语已经消失，但是作为中国特有文化的一部分，为英语全球化环境中中国英语的最终出现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结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正规英语教育的普及，上海洋泾浜英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殖民地土壤而逐渐消亡。

4.4 20世纪的中国式英语

4.4.1 中国式英语的产生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时期，进入了独立自主的新阶段。建国初期，我国经济技术均落后于其他国家，发展经济是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为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外语尤其是英语依然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受到重视。1956年，高中英语课的教学面有所扩大，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也同时颁布。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陆续增设或恢复英语专业。英语教育在中国正式进入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是英语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又一契机，我国英语学习者陡然增多。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不断加快，我国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作为全球应用最广泛的英语也出现在我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随着奥运会在中国的召开，奥运会对东道国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以及奥运会作为宣传媒介，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举办国文化、人文等方面的宣传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作为东道主在文化上要走一条国际化路线。于是，一股学习英语、英语普及化的热潮在全国展开，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这种国家正规教育体系的背景下，全国民众英语学习热情高涨，并且以纯正英国伦敦音为规范发音的要求下，英语在中国的发展仍处在本土化的进程中，继上海洋泾浜英语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本土化英语——中国式英语。

4.4.2 中国式英语的产生原因

据统计，在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但效果却让人大跌眼镜。2014年，英孚教育发布《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年花费300亿元用于英语培训，但实际效果依然不佳，中国在44个母语为非英语的国家及地区中，英语熟练度仅排在29位，在亚洲区域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泰国。

首先，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是形合语言，有时态、语态、人称、数等多种形态变化，句子结构是一层套着一层，多为一个主句，又在其主干上分出许多的枝节，即诸如主语从句、宾语从句、定语从句、表语从句、同位语从句、状语从句等，语言注重句子结构的完整性和逻辑性。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意合语言，往往是横向铺叙，层层推进，以达意为主，没有时态、人称、数等的形态变化，主要靠语序和实词来表达含义，句子结构较英语松散。因此，英语应用能力差的人不会自觉地把无形式变化的汉语词语转换成有形式变化的英语。汉语的词性没有变化，动词和名词形式一样，名词和形容词一样，而英语的词性有变化，名词和动词有些书写不一样，形容词和副词也不一样。此外，英语名词还有可数不可数之分，动词有及物不及物之别，而汉语的及物动词和与之对应的英语动词未必是及物动词，这也是中国式英语中词类混淆的主要原因。既然分属不同语系，中国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一定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英语学习者无论说还是写英语句子，总是受到母语语法规则的干扰，对母语优先进行自觉处理。当英语和母语中的句子结构一样时，母语对英语学习者的影响则起着促进作用，是“正迁移”。但是英语和汉语在句子结构上并非总是相同的，当两种结构存在差异时，英语学习者再用母语中熟悉的语法结构去影响目的语的学习，在语码的转换中就会遇到困难，导致“母语负迁移”的产生，出现语法错误。在这个正负迁移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中介语。

中介语这一概念首先由 Larry Selinker(拉里 • 塞林克)提出，中介语又称过渡语，是指由某个正在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按照自己发展起来的规则系统创造出来的

既含有母语特征，又有目的语特征的语言系统。根据中介语理论，学习者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渐渐向其目标语靠近，这种语言介于学习者的母语与目标语之间，它带有学习者目标语的特征，但与目标语还未完全吻合，因此是一种过渡性语言。中国式英语就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中介语。中国式英语具有英语的明显特征，包括发音、书写、词汇、用法等方面，但是同时又与规范英语有所差别，其中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中国式思维和习惯，产生了一种杂交英语，从而导致了不可理解性甚至失误及冲突。一般认为，言语失误可以从“失检”(Mistakes)和“错误”(Errors)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失检”是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英语中由于语言处理的原因(如记忆不清楚，运用不小心)或使用交际策略(如因为缺乏语言知识而采取转弯抹角的说法)所犯的错误。这属于语言运用方面(Performance)的错误，经他人指出或自行检查后是可以改正过来的。例如，中国学生在初学英文时，就经常产生中国式英语的发音。如“th”的发音常用[s]、[z]代替[θ]、[ð]；[w]和[v]不分。这些发音问题在英语学习者中非常常见，但是经过老师的指出或自行检查，大部分都可以改正过来，使发音准确。另一方面，“错误”指的是语言学习者不具备有关的语言知识或能力，不能自行改正的错误。这个可以将其理解为学习者语言能力(Competence)不足所导致的，但这可以通过日后的学习和锻炼得到改善。比如学习者在学习英语词汇的时候，接触了Tea，Green Tea之后，自己根据推断猜测红茶为Red tea。还有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词汇：鳄鱼——Hungry Fish；河马——River Horse；鲨鱼——Kill Fish；花心——Flower Heart；等等。这都反映了语言知识的有限，这类错误则需要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改正。

一方面，中介语用来指学习者在某个时期所建立的内部系统，即学习者某个时期的中介语；另一方面，又用来指反映了学习者不断进步的一连串互为联系的系统，即中介语的连续体。因此，中国式英语可能反映学习者在某个特定时期自己建立起来的一种英语系统，而随着英语学习的不断进展，这种系统也随之发展，逐渐形成自己所理解和接受的英语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系统相对独立，是学习者观察和总结后的理解，也是对目的语形式的尝试。Corder(科

德)认为语言学习是一个以不断建立“假设”又不断推翻或更正、完善“假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介语逐渐接近目标语。可以说，中国式英语就是英语学习者试图学习英语语言时所形成的，兼具汉语和英语的特征，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尝试性产物。但这是一种阶段性产物，学习者随着对英语规范的不断学习，这种系统不断修正甚至丢弃，从而逐渐向规范英语靠近。因此，中国式英语并不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最终目标，而只不过是一个中间过程，是过渡语。因此，中国式英语是英语学习者在真正掌握规范英语之前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并非英语学习的最终目标。中国式英语体现了英语习得者在一定学习阶段所具有的语言能力，因此在某一阶段，未正确掌握或完全掌握的语言点必然以同一类型的语言错误形式不断重复出现，形成一个暂时稳定的语言系统。根据研究者对学习者语言的错误分析及语言发展模式的研究结果，学习者语言普遍具有一个特征——可变性。研究者发现学习者使用某个特定结构有时会出错，有时不会。在他学习某个结构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他们并不只使用代表该阶段的某个语言形式，而是有可能会变换使用几种语言形式。而不断输入的新语言知识又会对习得者已具有的语言系统产生影响，习得者会根据相关语言知识对其中国式英语系统作出相应的调整。中介语虽然是可变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没有系统性，可称为系统变化。因为它们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根据语言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既然中国式英语作为一种中介语是有一定系统、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中国式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也是可以预测的。

其次，从语言迁移方面看，“正迁移”是对第二语言习得起积极促进作用，而“负迁移”则会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阻碍的负面影响。中国式英语的形成则由于“负迁移”导致，主要表现为“干扰”和“回避”。“干扰”指的是学习者的母语知识或目标语知识对其语言学习产生的干扰。来自母语的干扰被称为“语间迁移”，如“Although I like the car，but I don’t want to buy it.”；而来自目标语的干扰则被称为“语内干扰”，如“She can plays the piano”。当母语和第二语言中的语言规则存在差异，母语往往会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阻碍作用，则会产生“负迁移”，导致语言错误的产生，使语言学习变得具有难度。“回避”指的是

当学习者发现目标语的某些规则与母语有差距，且不容易学的时候，他们会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规则。中国式英语所表现出的回避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由于英语学习者对英语的规则或多或少有些粗略的认识，但感觉在使用时会出错，于是选择回避(如中国的英语学者在学习定语从句时倍感困难，导致经常回避使用定语从句)。这是由于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自然语法规则迥异。汉语属于左分支结构(Left-branching)，定语是前置的，而英语属于右分支结构(Right-branching)，即定语是后置的；第二类是由于英语学习者知道并能使用某些英语规则，但是由于情况限制，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无法灵活运用这些规则，于是选择回避(比如在日常会话和交流过程中，英语学习者对于从句有所了解并可以正确使用，但是怕说出来的长句影响交流速度或显得太过书面不够口语化，于是回避从句运用)。可见，中国式英语所表现的回避现象反映了学习者的母语知识以及对英语掌握程度所带来的影响。

4.4.3 中国式英语的定义

最初人们对中国式英语作的定义大都含有贬义倾向，认为中国式英语对中外交流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是阻碍作用。但近年来，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和人们对文化包容性的逐步认识，国人对中国式英语的态度也越来越宽松，贬低之意也在逐渐减弱。

“中国式英语”即“China English”或“Chinglish”，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英语在中国将慢慢发展成国别性变体，如American English 和Australian English，中国英语的英文应是Chinese English，而中国式英语的英文应是China English，我也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中国式英语是指中国人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把汉语的语言规则运用到英语语言之中，受汉语的思维方式和相应文化背景知识的干扰和影响而说出或写出的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英语。李文中也认为中国式英语是指“中国英语学习者与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过程中，出现不合规范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这种英语往往对英语国家

的人来说不可理解或不可接受”。中国式英语是在当时对英语语言结构，文化内涵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中国人使用的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英语。中国式英语的语言形式不符合规范，使用范围狭窄，交际功能有限，可理解性欠佳。从语音角度讲，中国式英语的发音受到汉语发音的严重影响，与规范英语出入很大；从词汇角度讲，中国式英语受汉语思维影响，产生了一部分主观臆造的难以理解的新词；从句式角度讲，中国式英语不符合规范英语语法规则，错误百出；从语用角度讲，大都不符合英语文化背景，导致交流上经常出现语用失误，甚至矛盾或冲突。

这些定义虽含有贬义色彩，但都全面概括了中国式英语的不足之处。从语言变异角度看，中国式英语是语言变异的消极方面，是不可接受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英语和中西交流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式英语会出现在英语语言中。金惠康指出：“一些有趣的中式英语会因为其自身的价值和某些特殊的机会，慢慢在世界上得到承认，从而转化为标准英语的一部分。”其实，中国式英语是英语学习过程中的过渡语言，是初学者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现象会逐步减少乃至消除。

4.4.4 中国式英语的语言特征

中国式英语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阶段，其语言特征中反映出汉语言对它的影响。

首先，在语音特征方面，中国式英语的发音现象是受母语迁移所造成的，这是由于汉语与英语是完全不同的发音系统，因此中国学习者经常出现语音失误现象。首先，如单元音混读、长短音区别小、双元音发音不够饱满；用汉语辅音音位代替英语音位，如“th” 的发音常用[s]、[z]代替[θ]、[ð]，[w]和[v]不分，[l]与[r]的混淆以及[l]在词尾发音的误读；辅音串内添加元音；单词重音以及句子内连读、弱读、吞音、音渡、语调方面出现的问题等。其次，在声调方面，汉语属于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英语则属于非声调语言，是语调语言(Intonation

Language)。汉语的每个字除了有元音辅音外，还有一个附在上面的声调。而英语没有声调，只有一个句子的语调，语调对于表达思想感情十分重要，同样是一句话，用不同的语调可以表明说话者不同的态度和口气，可以是肯定、犹豫、委婉客气、傲慢无礼等。有语言学家形象地把元音辅音比作英语的身体，把语调比作英语的灵魂。由此可见语调的重要性。而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受汉语发音影响，说英语时不注重语调的变化会明显带有汉语的味道。更有很多初学者会通过谐音法来学习英语，这一点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一致，如Teacher(踢车)、Umbrella(俺们不玩了)、Five(废物)、Battery(掰腿)等。这种不正确的学习方法会导致英语语音和英语本族语的语音相差甚远。这些音位发音问题在英语学习者中非常常见，但是经过老师的指出或自行检查，大部分都可以改正过来。其实，单词的发音相对容易纠正，但是超音段问题就会比较困难，需要长时间的反复练习。总之，中国式英语的语音表现出严重脱离规范英语，对英语本族语者来说很难理解，进而影响交流。

其次，在词汇方面，中国式英语的词汇失误和词性失误有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书面语中。常见的词汇失误有：替代、缺词、词类错用、冗余、歧义。替代失误就是用错词。比如学习者想表达某一个概念时，找到了意义上相关的英语词，但却未掌握其用法，“I minded the English words in my brain”(我用脑记住英语单词)。学习者想使用某个英语词，但却错用了另一个形式上相近的词Weather effects(=affects)us in one way or another；学习者在表达过程中找不到合适的词时，用了如 Do，Take，Get 等覆盖面很广的词来代替，结果出错(Take our best to do them well)。词汇误用和词类混用，坏蛋(Bad Egg)，好人(Good People)，蠢猪(Foolish Pig)，表妹(Watch Sister)等。缺词也是中国式英语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而往往缺掉的词只有语法意义而没有实义的虚词，如冠词(in ∧ east and ∧ west)、介词(I am looking forward ∧ your coming)、和助动词一起的 be(Don’t ∧ afraid of it)、关系代词(I know ∧ it means)、受汉语影响造成(He studied French，English，German，∧ Russian)。词类错用主要是实义词，比如 health body，to make a complain on the noise。冗余是指用词的多余，比如 after the lunch，must

be get rid of it。歧义是指学习者想表达某个意思时由于缺乏足够的言语表达能力，写出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复合词和句子，中国式英语中有很多来自汉语表达方法，令本族语人费解的句子。比如，一年马上就会过去：A year will over once。更有甚者，在中国特色菜系的食谱上出现Fuck a Fish head(干锅鱼头)，这使外国人就餐时望而却步的翻译。同时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受汉语负迁移的影响而使中国学习者产生错误的词汇理解和使用，如“黑眼睛”应为“Dark Brown Eye”，而非“Black Eye”，因为英语中的“Black Eye”意为“被打得发青的眼圈”“牛饮”应为“Drink like a Fish”，而非“Drink like an Ox”。此外，拼写失误也很多，主要是包括拼写、构词和大小写等错误。

再次，在句法方面，中西方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汉语言民族重视整体抽象而不注意空间结构的完整，以意统形；而英语表现形式受到逻辑规范的支配，句子组织结构严密，主从层次分明。因此汉语言基本上是一个形散意合的表意系统，英语则是形合句多于意合句。这其中的差异就会导致英语句子结构缺陷、标点符号错误、不断句、片段、搭配失误等情况。结构缺陷就是学习者在写作中先形成汉语想法然后去找对应的英语表达。但由于知识有限，勉强拼凑了句子。比如，没有什么梦想不能变为真实(There wasn’t any dream couldn’t be turned into truth，正确句子为There wasn’t any dream that couldn’t become ture)。标点符号的失误体现在误用标点、用冒号代替逗号等。不断句是不断地使用逗号。而片段则是指把从句当主句或把词组当句子，如 As the bus stopped。另外中国英语在句子上常表现出时态失误(But now，I knew it.)和主谓不一致(I think everyone want to know it.)等情况。搭配失误是指英语学习者由于英语基本功不扎实，词汇量不够，英语语法不过关，对英美国家的文化习俗以及中外文化差异了解不够等多种原因而引起的词汇错搭。如学习知识(Learn Knowledge)、看报(Look Newspaper)、厕所里想表达“便后请冲水”(Wash after Relief)、人山人海(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给他点颜色看看(Give him some color see see)等，不胜枚举。

第四，在语用方面。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特征，人们在习得语言的同时，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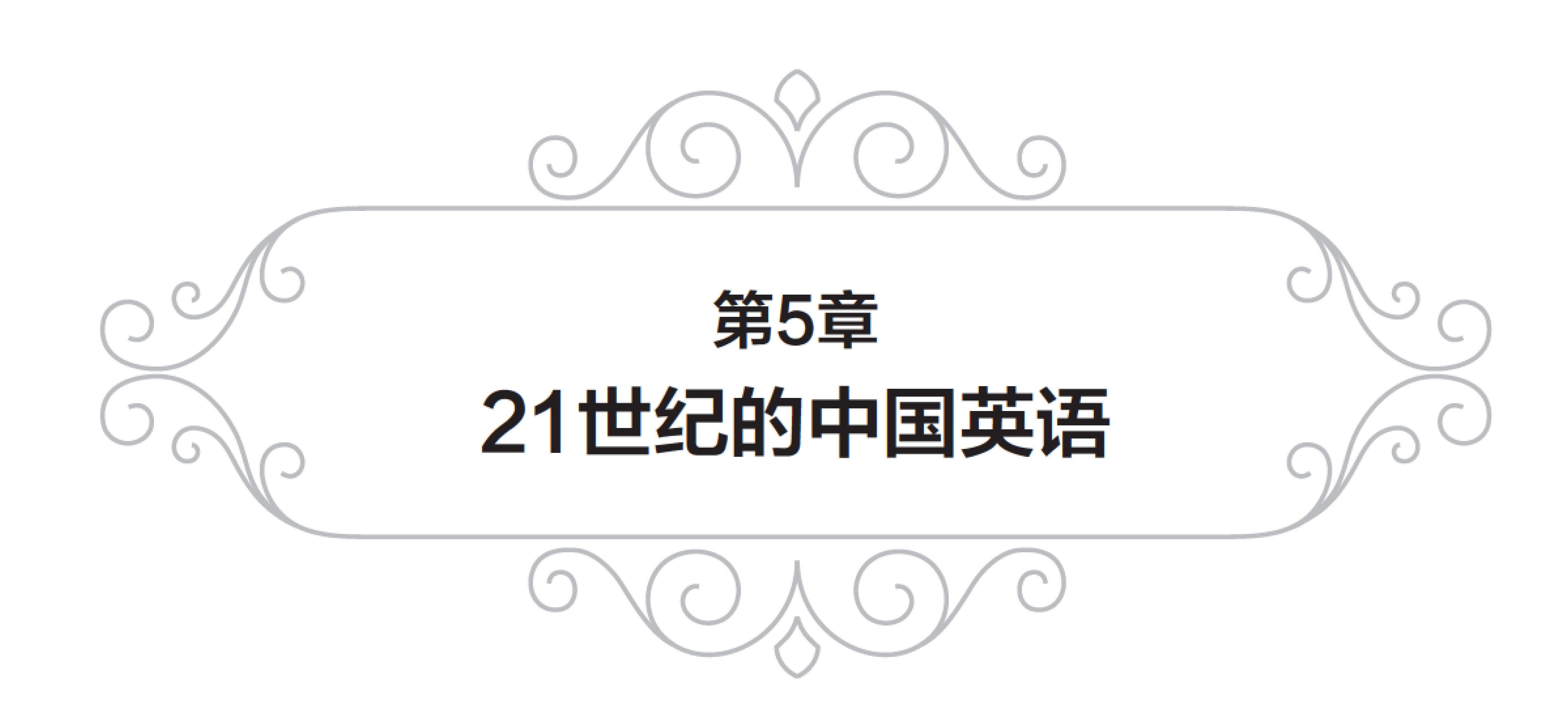
了解该民族的文化。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不仅仅是一套符号系统，人们的语言表现形式更要受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或社团的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性格等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着不同的编码分类，同时也有本民族独特的典故和传说。在实际教学中，无论是英语教师还是学生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未给予充分的重视，中国学生不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常常导致中国式英语的出现。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一中国学生形容他的外籍同学事情多，是个大忙人，“You are a busybody.”但外籍同学听后很不高兴，原因就在于Busybody在英语中不是“大忙人”的意思，而是相当于汉语中的“爱管闲事的人”；再如，听到别人赞扬时，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回答不同：西方人一般表示接受赞扬，中国人则一般表示受之有愧。请看下面这个例子：一个中国人拿他妻子的照片给他的美国朋友看，出于礼貌，美国朋友夸赞说：“She is very beautiful.”(她很漂亮。)同样出于礼貌，这个中国人就谦虚地说：“Where!Where!”(哪里！哪里！)这么一说，美国人就愣住了，一下子不知怎么回答，好一会儿才说：“Oh，everywhere!”(哪儿都好看！)而我们知道，当被人赞扬时，一个西方人会选择接受赞扬，如在上述情况下，他们会简单地回答：“Thank you!”或者再加一句：“I think she is quite pretty.”因为他们认为接受他人的夸赞体现了一个人的自信，相反，过分的谦虚是自卑的体现。

4.4.5 中国式英语的影响和作用

虽然以往大多数学者对中国式英语深恶痛绝，厌恶至极，但是中国式英语仍然有它的贡献，并且人们对中国英语的态度也在逐渐缓和。首先，中国式英语是介于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过渡语，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于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理解能力有负面的影响。但中国式英语是学习的过渡语，而不是跨文化交际的目标语。其次，中国式英语对于普通交际也存在着一定社会功能和表达功能，不论中

国式英语是损害了交际的有效性还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交流，它的存在都是客观的。因此我们应全面地看待中国式英语，不要对其进行绝对否定或嘲笑。毕竟中国式英语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会越来越接近于目的语。英语已成为世界性的语言，中国式英语的存在正是中国人努力学习英语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一种表现。过分强调中国式英语的危害反而会使学习者失去自信。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接近目标语的过渡阶段，积极寻求克服母语干扰的办法，尽量缩小过渡的时间。

我国约有4亿民众学习英语，加上日益上升的全球影响力，意味着中国人每天都在制造英文新词。根据报告，逐字翻译的中式英语“很久不见”(Long time no see)，还有从广东话吃点心的“饮茶”直译过来的Drink Tea等，现已融入英文词组。而且更多中式英语还在继续产生，包括从前就已中英混合的如“苦力”(Coolie)，“台风”(Typhoon)等。这些新命名的单词在网上流通，英文词汇库必然迅速增长。在中国式英语中那些简洁、上口、反映中国特色思维的“有趣”的句子，如 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Pay Money 等用法也被广泛接受。这样的“中国式英语”客观上就对英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英语词汇最初就是来源于汉语，欧洲的权威机构曾作过统计，自1994年以来加入国际英语行列的词汇中，中国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其他任何来源。



第5章

21世纪的中国英语

5.1 中国英语的产生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英语已不仅仅限于商业用途，而成为中西双方沟通、交流的主要媒介和工具。因此，大量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不断涌现，在词汇、语篇等方面对英语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语言的界限。这种从语言表层到文化内涵转变的趋势，引起国内外广大学者的关注，为中国英语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理据。

中国英语的概念最早是由葛传槼先生在1980年提出的。葛先生在其《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指出：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要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来使用英语。不过，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言，我们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Four Books(四书)、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May 4th Movemont(五四运动)、Xiucai(秀才)。虽然该文并没有对中国英语展开系统阐述，但归纳起来是：“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是指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词汇，并且中国人使用英语总的前提是“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随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学者都纷纷肯定了中国英语的存在，并且慢慢尝试着为中国英语下定义，以区别于中国式英语。

5.2 中国英语的定义

首先给中国英语下定义的人是汪榕培先生。1991年汪榕培先生将中国英语定义为："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它包含3个内容：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李文中认为"它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李文中扩展了汪榕培的"本土化"概念，指出不应该把"中国英语"的使用局限于中国本土，它亦可超越本土。他还认为标准英语没有统一模式，因此应把那些合乎英语语言普遍规则、为讲英语国家所接受和理解的英语作为其核心。谢之君也说，"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张培成认为中国英语是使用型变体，或是作为外语的变体，而非国别变体。贾冠杰，向明友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发表了"为中国英语一辩"的文章，认为中国英语长期遭贬，其积极因素未被人们重视，并把中国英语定义为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罗运芝简单概括为"中国英语是承载汉语语言特征的英语变体"。此外，杜瑞清、姜亚军、李少华、王万年等从语音、词汇、语篇3个层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分析，进一步研讨了中国英语同英语教学的关系；金惠康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详细探讨了中国英语在不同交际语境中要面对和接受的语言学和语用学上的适应性问题。林琼则以大量的实例论证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本质特点及其形成

原因，并且认为两者都是因母语(汉语)干扰而形成的英语变异体。

综上各家所言，笔者认为中国英语是主要由中国人使用的、符合英语语法的、具有汉语语言特征、旨在传播中国特色文化的一种国别变体。中国英语如同印度英语、韩国英语、日本英语等国别变体一样具有鲜明的本国语言特色。如经常被语言学家提到的印度英语，它的语言特点和印度语有着直接的关系，其特点是发音奇特，语速非常快，没有重音，不讲快慢，节奏一样，不讲英语的语法或者讲的是印度英语的语法，词汇中印地语和英语混用。虽然印度英语与英语差异很大，但由于其人口优势，经济的崛起、印度电影业的发展、民族情节和成功的学校英语教育使得印度英语在与其他国别变体的比较中，遥遥领先。从2004年开始百事可乐就将广告词“Ask for more”变成了印度英语味道浓重的“Yeh dil maange more”。随后，可口可乐也不示弱，把“生活理应如此”改成了“Life ho to aisi”，这足以解释印度英语的世界性影响。

5.3 中国英语存在的理论依据

5.3.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语言，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失去了它所拥有的文化，因为语言是人们了解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媒介。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是用于交际的符号系统。语言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交流手段，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内容，记载、记录信息，并使得人们建立并维持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同时，语言作为一种人们共享的符号系统，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所以，语言又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功能。20世纪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语言绝对论(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虽然显示出了不足之处，但是语言、思维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语言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思想强调指出，影响人们感知和思维的主要因素是其语言习惯和文化经历，不同文化和语言群体的人们通常具有不同的感知和思维模式。语言的使用必须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而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又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语言作为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反映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而思维决定着语言的表达形式，同时语言传承了人类文化。

当语言作为母语被习得时，语言、思维方式连同文化一起获得。而当某种语言作为第二语言被习得时则会出现种种语言与文化脱节的现象。而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所应用的语言则会随之发生变化。随着英语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

英语在中国各个领域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但是中国的英语教育往往是费时低效的，学习了多年英语的人仍然在与英语本族语者交流时“难以启齿”或者出现沟通困难，甚至出现误解与冲突。而随着人们对语言与文化关系重视程度的加深，中国英语教育开始了双语双文化的培养。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也学习了很多关于英语国家的文化，这样，果然问题缓解了许多。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英语现在作为国际通用语，不仅英国人、美国人在说，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在说，日本人、南非人等也在频繁使用着，而这些国家都产生了自己的英语变体，于是只学习英美文化恐怕也不能完全指导跨文化交际了。此外，过去我们一味地在学习别人的文化，注意他国的价值观念、传统习俗、甚至是生活习惯，而别国却很少来了解中国。过去也许是国际政治的不公平性导致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屑一顾，但是如今时代不同了，21世纪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中国作为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关注。中国的经济展翅腾飞，维护和平的大国形象深入人心，国际地位逐步提升，对外贸易，对外交流前所未有的频繁。于是，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因为英语反映的并非中国文化，而现在中国对于英语的需求更多的是有效的介绍中国文化。例如中国很多反映独特文化的谚语、俗语等都有了英语的表达。

此外，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学英语热潮，中国拥有了世界上会讲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英语在中国人的使用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不同于规范英语的不同层面的变化。需求的变化加上实践的应用，于是渐渐产生了我们现在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

首先，语言反映了生存背景，生存背景的变化必然导致语言的变化。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影响，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文化在语言中则表现出特定的表达方式。例如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因此英语中有很多关于海洋习语的表达、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很多关于雪的词汇等。还有在北美，人们不吃狗肉，有人甚至还会买来和自己长得很相像的狗，他们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此英语里有很多关于狗的用法，如：Work like a Dog、

a Lucky Dog、Love me love my dog、Every dog has his day，等等。如果语言换了一个生存背景，必然会出现反映新环境的表达方式。例如，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的思想深入骨髓，因此中国英语中常有关于农业的词汇及比喻用法，另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用“Have you eaten? Did you have dinner? ”等句子作为问候语了。

其次，语言反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语言的变化。人类运用语言表达想法，反映心理、观念、甚至宗教文化等。这在国家与国家间是不尽相同的。甚至这是国家与国家最本质的区别。英语表达了英语国家的民族心理、观念以及宗教文化。西方国家讲究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很少考虑他人，因此语言也往往比较直接，甚至尖锐。西方宗教信仰是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Oh，my god.”“For God’s sake.”“Oh，Jesus.”等用法颇多。而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是不符合国情的。因此，为了表达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观念以及非宗教国家情况，中国英语产生了一系列的补充。例如中国人重视以人为本，强调主体性，因此中国英语中主动语态居多。中国人尊重历史，相信历史是把握如今的重要参考。因此，我们有“Consider the past and you will know the present”。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集体主义，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而西方国家讲究个人主义，强调竞争，因此在中国英语中往往“我们”的说法多于“我”。中国人说话含蓄委婉，因此中国人使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也很少直接表态，喜欢迂回，娓娓道来，讲究面子。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大多数中国人感觉与政府相分离，因此对他们而言，对家庭的忠诚和关注比较多，便有了“天高皇帝远”以及“人不能忘本”“Heaven is high and the Emperor is far away.”和“To forget one’s ancestors is to be a brook without a source，a tree without a root.”的说法。中国虽然宗教自由，但是没有国教，因此中国英语在宗教方面涉及较少。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则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用法很多，例如少数名族的名称、特有事物的译法等。以上这些都是中国英语与英语的不同之处，但又无法避免。

再次，语言反映社会规约、风俗习惯，社会规约、风俗习惯的改变也导致

语言的变化。社会规约是一个民族社会的习惯做法，是价值观的反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都反映在语言的使用之中。而风俗习惯则是社会群体长时间共同生活而相互遵守的习惯，包括社交礼仪、生活习惯、民族传统以及信仰等。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文化要求年轻人对长辈要敬重，很少会直呼其名，而且喜欢在人名前加上职位或称呼以示尊重，因此，中国英语中出现了诸如 “Teacher Wang”(王老师)、“Brother Li”(李大哥)、“Doctor Zhang”(张大夫)等用法。而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上的表现也多为安静，很少主动向老师发问，以表示尊敬。中国讲究尊老，而往往决定权也在于长者，因此，中国人与长者讲英语时也会表现得格外尊重和有礼貌。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诸如 “Dragon-boat Festival ”(端午节)，于是我们还有了 “Zongzi”(粽子)等。此外，像“Yuan”(缘)、“Fengshui”(风水)等词也被广泛应用。

5.3.2 世界英语理论与中国英语

第3章提到的世界英语理论也为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Kachru 认为世界英语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使用英语的模式或变体，其理论宗旨是分析英语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与变化，试图揭示各种变体的典型特征。不容否认，英语从走出英国的那天起，在经历全球化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发生了本土化变化，自然也包括在中国的变化。Kachru 在分析世界英语变体时主要考虑3个方面：语言形式、语言功能以及语言认同。本书将从这3个角度来分析中国英语不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很有发展前景的英语变体，而非畸形语言。

首先，中国英语在语言形式上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一种语言形式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一种语言变体，首先要从形式上具有自己的特性。中国英语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内圈国家英语不相一致并且备受贬低的方方面面，都有力地证明了英语在中国产生了本土化变化，在各个层面上都出现了有规律的、相对稳定的形式。中国英语的语言特点将在下一小节中详细论述。过去我们不肯承认中国英语是一种变体，那是我们没有认清楚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区别。如今，

经过漫长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式英语作为过渡语的不可避免以及中国英语的不可或缺与合理性。可以说，中国英语基于规范英语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形式也从本质上证明了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和其他英语变体并存的客观存在。

其次，中国英语展现了英语在新的语境下发挥对外、对内的双重语言功能、稳定的发展趋势及广阔的发展前景。英语在中国的应用不仅体现在国际交往上，同时也体现在国内科技、教育、工业、贸易等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一种语言在异地语言文化领域经过长期的使用，受到当地语言结构和文化的影响，必然产生形式上和意义上的变化或补充，从而在功能上也会产生新的特征。语言模式必然要放在它的语境中考虑才有意义。从语用学的角度考虑，这是顺应的结果，是语言在新的语言环境下的变化和调整。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也正是英语在中国新背景下功能发展的产物。Kachru 在分析语言的使用功能时，主要考察它的4种功能：工具功能、规范功能、人际功能、想象/创造功能。

(一) 英语工具功能主要是指作为语言工具，学习各类科技文化知识的功能。过去中国人学英语的目的除了学习英语语言之外，还包括通过英语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而如今，中国人运用英语还有一个新的功能，那就是传播中国文化和科技。于是，英语被注入了大量的中国英语成分。规范英语与中国文化的有效结合促成了中国英语的存在。

(二) 英语在中国的规范功能是指在中国的一定语境中发挥着特有的行政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英语也逐渐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服务行业等都离不开英语，孩子从几岁起一直到升学、择业、晋职以及未来发展都无时不需要英语。可以说各行各业也都在学英语。而英语在中国的这个新的语境下已经与英美文化相分离，与中国社会背景相结合。于是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新的英语词汇及表达来说明中国特有事物。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英语成为规范现代中国社会另一个工具，也是对外描述中国社会最有力的媒介。

(三) 根据 Kachru 的理论，英语有对外、对内的双重人际交往功能。在中

国，英语除了作为国际通用语实现了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流，同时也逐渐地应用于国人内部，体现新时代下的身份特征。往往讲一口流利的英文象征着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和身份地位。全中国的英语热在侧面反映了英语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需求。随着英语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会讲英语的人逐渐增多。中国人之间的英语交流甚至让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英语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二语言。中国电视电台英文节目、英文书籍报纸杂志的绝大多数观众和读者都是中国人，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语言环境。而中国人很多情况下谈的是中国事，表达的是中国态度，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于是，英语表现出了与内圈英语的不同之处。

(四) 英语的创造功能主要是指英语的文学创作，当今叫英语新文学。英语新文学是世界英语理论研究的产物，指的是在非西方英语的环境下使用英语变体进行的文学创作。如印度、加勒比海、南亚和西非以及西欧、日本及中国等。在讨论语言变体的时候，除了稳定的语言形式，还包括一定的英语本土化创作。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使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说英语如今成了多元文化的载体，英语在英国是英国文化的载体，在美国是美国文化的载体，在印度是印度文化的载体，那么在中国则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以中国文化为载体的英语便是中国英语。中国人的英语文学创作无不反映着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和思想。不变的是中国人的政治信仰与价值观念。用英语创作的知名海外华人作家有旅美女作家严歌苓、李翊云，华裔美国作家哈金和裘小龙等。他们都在用英文讲述中国的故事，中国特色文中可见。而现在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中国人的英语创作，如散文、诗歌、小说等。这些文学创作都具有浓浓的中国味道，也为中国英语的发展奠定了传播基础。因此，英语在中国的新的语言功能也解释了中国英语的必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不仅在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是一个新的英语变体。

最后，中国英语符合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也逐渐被国际社会肯定与接受。中国人学英语学的是国际通用语英语，而非单纯的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但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我们要了解的将是各国的文化。中国人讲英语不是要展示英国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是中国人独特的身份认同，我们有一些独特的表达方式

和习惯。我们要在运用英语的同时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人。这是一种潜在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归属感的表现。

5.3.3 认同协商理论与中国英语

Stella Ting-Toomey博士的认同协商理论也为中国英语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

首先，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英语运用过程中追求认同安全性的内在需求以及避免认同危机的产物。认同协商理论阐述了集体或个人对身份认同的获得以及认同安全性的追求是存在于交流过程中普遍的动机需求。任何文化中的个体或民族团体都对认同安全、信任、包容、关系、稳定有相同的动机需求，这种需求既是集体认同层面上的也是个人认同层面上的。而集体或个人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与他人的象征性的交流实现的。个体往往在熟悉的文化语境中感受到认同的安全性，而在不熟悉的文化语境中会感到认同脆弱性。当个体与文化背景相似的人交流时往往感到认同的信任感，而与文化背景相异的人交流时往往感到不信任感。即认同相似产生信任，而认同相异产生怀疑。

我们国家的英语语音教育虽重视发音准确，但不求洋腔洋调，只求自然和清楚的表达。一方面，由于母语的干扰以及语言环境的限制，追求地道的英式或美式发音着实困难，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乡音认同”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在国外居住很长时间的中国人说起英语来往往仍然能听得出中国味道。可以说，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说英语都体现出了不同的语音风貌，这也无形地展示了说话人的民族身份。这种乡音认同使得中国人在讲英语的同时获得集体身份认同。而中国人同样希望自己的英文发音可以向世人展示自己中国人身份，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华人共鸣。在异地(小而言之在外县，大而言之在外国)认同乡音就是在寻找心理上的家园。因此，从整体来讲，中国英语则表现出了语调平缓，普遍重读的近本族人发音的英式、美式混合的语音特色。其实语音特色是区别各英语变体最明显的标志。中国英语独特的语音特色也为其成为与其他变体相区别的一种变体起到了辨识作用及民族认同作用。

语言是人们文化认同的工具，因为语言是文化身份的重要表现手段。文化身份不仅决定交际者采用哪一种语言进行交际，而且还决定交际者采用何种传播方式传递何类信息内容。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文化的不同经常导致所谓的语用失败。然而，我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交流，而且我们不能在交际的过程中一味地迎合他人的文化和行为准则。例如中国人习惯贬己尊他，谈话中常使用奉承、道歉之类的词语，北美人则更喜欢真实表达感受，则注重交际过程中信息内容的清晰，交际方式往往直截了当，避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如美国的主人得到客人的赞赏时会说“Oh，I’m so glad you liked it. I cooked it especially for you.”而中国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则会说“Instead apologize profusely for giving you nothing even slightly edible and for not showing you enough honor by providing proper dishes.”像中国这些高语境文化国家希望交流双方能够通过字里行间获得言外之意，为了保持和谐友好，往往礼貌先于事实。通过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在听到他人的赞美时会说 No 而非 Thank you，即便是精通英语、了解外国文化的中国人仍然情不自禁地这样说，其实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这使得说话人有一种身份归属感。有时为了避免对方的误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解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以求对方接受自己的身份。

跨文化传播的顺利进行并不要求交际一方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以迁就另一方，交际活动的成功取决于双方能否通过传播手段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结构，萨莫瓦和波特称之为第三文化。第三文化含有交际双方的文化身份特点，是交际双方互相适应、各自调整的产物，其实这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此外，在中国英语的语篇中，常有“Under the leadership of our party，…/ With the help of our colleagues，…/ Without your help，I couldn’t have succeeded.”中国人在运用英语的时候常常有强调集体作用的习惯。中国是集体主义国家，与西方个人主义相区别，这成为东西方最大的价值观差别。中国人讲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于是，取得成功或胜利的时候，也喜欢归功于集体的力量。此外，亚太地区的国家往往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语言的使用也反映出正式和层级关系，这与北美国家喜好随意、非正式形成鲜明对比。由于这种文化即价值观的不同使得中国人在讲英

语时有明显的语用区别。这种语用区别直接反映出了英语在中国的使用以及与规范英语的不同。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语言的应用来判断说话者的身份，这也正是我们内在的认同需求。否则，我们一味地按他人的行为准则来说话，必会产生一个认同危机感和脆弱性。

再如，英语在中国的发展还表现为出现了一系列的中国式表达和用法，从词汇中的Mantou(馒头，Steamed Bread)、Baozi(包子，Steamed Stuffed Bun)、Jiaozi(饺子，Dumplings)等，到 Land of Fish and Rice(鱼米之乡，Land of Milk and Honey)，Shoot up like bamboo shoots in spring(雨后春笋般，Spring up like mushrooms)以及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God disposes.)等取代原有的表达，都是中国人集体与个人的身份认同，是在与非本族人(即非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华民族集体或成员)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获得的认同协商的产物。由于文化的涉及面广，反映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都反映在血肉相连的语言中，因此反映英美等文化的英语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是不相协调的。中国人往往对于英语中所蕴涵的英语文化是不习惯的。因此当中国人在使用有些地道英语时无疑会感到认同脆弱性。而当英语脱离了原有文化，在中国新背景下与汉文化相结合时，中国人则会对包含自己所熟悉文化的中国英语产生了认同安全性。中国人要在跨文化交际中获取这种集体和个人的认同需求促使中国人在运用英语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和特色，以便实现交流的成功以及认同的获得。而这种强调身份认同、追求在跨文化交际中被信任和包容的需求则是各个民族的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的总和。而由于亚太地区的许多文化在语言的使用上具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人往往通过中国英语与亚太地区国家人们如韩国人、日本人交流时会比西方人交流更容易产生信任、达成共识并获得认同。这些国家都讲究使用适度、缓和的语言，而控制否定及对抗的信息表达。在这些文化当中，“保留面子”非常重要，因此经常使用“间接”的语言，这与北美国家“直接”的语言构成了语言上不同的最主要方面。

其次，中国英语是中外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认同协商的产物。认同协商理论论证了语言在沟通过程中追求身份的协商过程。当个体欲追求的集体成员认同被

肯定、赞同时(如在积极的内集团交往情境中)，往往会有种包容感，而当个体欲追求的集体成员认同被侮辱时则会感到歧视(如在敌意的外集团交往情境中)。个体倾向于期望通过有意义的密切关系获得人际关系(如密切友谊的支持情境)，而当他们经历关系切分时往往体验到自主的认同。中国人过去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会遵循西方人的习惯将姓放在名字的后面，而如今中国人都普遍认同按照中国自己的习惯姓在前，名在后。这种行为在中国人群体范围内达成共识，因此用这种英语表达时具有包容感。而当中国人用中国英语说出名字时，如果外国人认为这是不符合英语语法提出质疑甚至取笑时，中国人则会因此产生不被包容的感觉或是歧视。当中国人期望获得良好的沟通和人际关系时，也许会说“We know that you say names with first name before last name，but according to our tradition，last name goes first.”这其实就是一个认同协商的过程。中国人这样说是符合中国人的规范，获取预期的民族文化身份，而这种协商过程可能被尊重或被质疑。如果外国人仍然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误用不可取时，中国人则往往自主认同，以维护其认同心理。而这种认同协商行为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无意识的，这都是潜在意识上对身份认同的追求。东西方文化在商务洽谈中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西方人，如美国人往往开门见山，直接谈生意；而东方人，如中国人、日本人则喜欢馈赠礼物或宴请对方以建立朋友关系，后谈生意。建立关系在先，完成生意任务在后，买卖不成关系在。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当公认与自认的文化身份特点相符时，交际双方容易互相适应，建立第三文化，使传播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因此，中国人在和日本人用英语谈生意时的表达和行为为美国人所不解，因为在这方面中日的文化身份特点比较相近，容易适应。中国人的集体民族认同要求我们在运用英语的时候，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生成了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而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这种集体成员认同的获得需要交际双方协商实现。

再次，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英语运用过程中维护正确的身份认同，避免认同混乱的产物。身份认同理论指出个体在可预见的文化情境中会感知认同的稳定而在不可预见的文化情境中则会发现认同的变化或混乱。文化、个人和情境变量维

度会影响对这些认同相关主题的认识、解释和评价。

中国人在接触英语及相关文化时，由于背景知识或语言能力有限，无法预测交际行为将会产生的结果和影响，往往容易在文化层面上出现差异进而导致语用层面上出现失误或冲突。这时交流很有可能促进个体身份认同的形成，但也有可能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怀疑或否定，导致认同的变化或混乱。英美英语中无不体现着英美文化、价值观及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往往会有这种感受，在学习或接触了多年的英语文化后，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文化取向、价值观念也都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随着英美文化的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对文化的接受情况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自己认同的理解和认识的改变。根据对中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的调查研究，英语语言学习对自我认同建构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认同的确定或认同的混乱。例如一名中国女学生，经过大学期间的英语学习生活，经历了从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初步认识，到认同的混乱，再到认同的确立这一过程。她在最开始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个中国文学狂热者，并认为英语学习会让她更好地发挥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优势，但从未想过英语学习会对自己的中国文学狂热者身份产生任何威胁。而后来的专业英语学习使她发现她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西式的写作风格使她失去了原本的中式写作风格，这使她一度感到迷惑和难过，进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怀疑。逐渐地，她意识到，她的中国身份以及对中国祖先精神家园的回归在现有的学习语境下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她选择参加中国歌剧学生社团、组织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讨论中国哲学等，以此来维护和加强其自身的中国身份。她通过英语的学习开阔了视野，意识到世界文化的独特性，并学会了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分析中国文学作品。

因此，英语学习不仅仅是语言的学习，还包括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这虽然有利于我们对他国文化的理解，但是往往也会造成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威胁。我们只有将自己的文化认同融入英语之中才能既了解世界又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自卑心理、实用主义、反传统思想的强力作用下，我们从社会到个人都被淹没在英语的洪流中。再加上网络的影响日渐扩

大，语言仿佛拼图游戏，可以随意编改，汉语正处在危机之中。但是，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是“存在之居所”“人类最后的家园”。语言问题的根本是身份认同问题。既然英语霸权的趋势无法阻挡，那我们就必须在固守汉语母语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学习英语，以兼容并蓄的心态来对待英语以及西方文化，加强中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国英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从民族的广泛心理和认同的角度看，学习英语、使用英语不应该改变他们的文化认同，讲英语的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当然，其中不乏那些崇尚外国文化、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贬低者。但是，中国英语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个矛盾，它将中国文化与英语语言相结合，并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因此，那些中国人译的唐诗宋词等便有效地促进了汉文化的广泛传播。现在，汉语也在世界范围内被学者学习着，这都为中国英语的可理解性奠定了文化基础。

最后，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运用英语的过程中为实现最有效跨文化交际的产物。

认同协商理论还指出令人满意的认同协商成果，包括被理解感、被尊重感以及被支持感。“留心的”跨文化交际强调必须把必要的文化知识、动机和令人满意的、适当的、有效的沟通技巧融合在一起。跨文化交流是个双向的互动过程，我们不仅是通过语言在交流，而且在交流的过程中，文化的传输、身份认同的协商都是为了获取令双方满意的沟通结果。这里不应存在一味地迁就对方，而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平等交流。在跨文化传播中，交际双方解释自己文化身份的特点和行为规范有助于彼此建立信任，并减少偏见。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涉及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多元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一种霸权意识。交流的个体都预期获得被理解、被尊重以及被支持，这是人类潜在的需求。我们只有在跨文化交流中将必要的本国文化、交流动机适当、有效地传达出去才有可能获得平等的跨文化交流，实现各自的身份认同。因此，我们只有将中国文化与英语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有效传输，而能否获得他人的理解、尊重和支持需要双方“留心的”跨文化交际，这需要提高文化知识、端正动机，以及提高自身的交际技巧。中国英语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在与不同文化个体之间进行跨文化交际过

程中实现正确、有效和满意的共享意义、追求协商目标的同时，又展现了中国身份。

英语在中国的使用会越来越广泛，而中国的文化只有通过中国英语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世界英语理论从世界的大视角下给予中国英语合法的变体地位。而中国英语作为延伸圈的一个成员，正代表着英语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它是中国人与以英语为母语国家以及非英语国家的人们交流的工具，在英语使用过程中本土化的表现。中国英语同其他英语变体一样都是世界英语大家庭的一分子，分别具有着自己的本土特色。中国人讲究谦虚谨慎、说话含蓄婉转、讲究面子，我们没有必要一味地迎合他人的需求而改变自己，我们宁愿冒不地道的风险而不想失去中国身份。更何况，中国人说英语不仅仅是和英语本族语人交流，还有其他非本族语者，因此，我们更注重的是在讲英语、用英语的时候向世人展示的是中国身份和中国做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意孤行，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的语言使用原则。

5.4 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

5.4.1 中国英语的语音特征

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语音系统和发音规律，仅从语音的生理特征而言，汉语和英语的差别就非常大，因此母语影响导致了中国英语的发音与规范英语的差异性。此外，任何语言中的个体语音都是千差万别的，再加上各人的发音器官也不尽相同，而中国民族众多，因此呈现出一些各异的音域特色。可以说在音位方面中国英语没有表现出稳定、系统的发音规律。而且中国学习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先建立了(较完整的)母语发音系统，发音器官业已成熟或基本成熟，然后才开始学英语的，因此很难达到地道的英、美发音，往往只能达到近本族人发音(Near-native)水平。另外，中国的英语教材又不统一，有英、美、新加坡人编撰的教材，所以可以说中国英语的发音体现出了一种混合语音的特点。

第一，从发音长短看，英语中有48个元音和辅音，有些成对音标，如[i:]与[i]，[u:]与[u]，它们之间对立的发音特点都是可以区别词义的。但是汉语中没有长短音区别，因此往往表现出长短音无明显区别，而双元音也不够饱满，尤其在口语交流语速较快的情况下。再如，英语中有清浊成对的辅音，都是根据清音与浊音之别成为两个不同的音位。在汉语中，这些音都是清音，只有吐气与否之别，辅音的吐气与否起着区别词义的重要作用。英语中辅音的吐气与否因不能区别词义而常被本族语者所忽略。

第二，从英汉音位的发音图中可以看出，汉语语音的发音部位靠前，属于“口腔前部发音体系”，美式英语带有较重的鼻音并常利用胸腔发音，因此发音较为浑厚。元音发得饱满，时间较长，开口度大，是典型的“口腔后部发音体系”(翟士钊，2001)。中国英语类似英式英语，发音较清晰，主要运用口腔和喉咙发音。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发音部位选择的倾向性，使得中国英语带上了“中国腔”。此外，依据二语习得理论，Medgye(迈奇)(1992)声称：第二语言学习者无论如何努力，一般是永远无法习得和本族人一样的语言能力的。因此，以汉语为母语且在语言习得关键期后学习英语的中国人在说英语时总是无法抹去“中国味”，让人一听就感觉到中国人在讲英语。无论是“中国腔”还是“中国味”都是中国英语在语音方面的本土特征。

第三，中国英语体现出了语调平缓、普遍重读的特点。中国英语语音的典型特征主要反映在超音段音位层面，如重音、语调、音渡、弱化、同化、连读。汉语是声调语言，英语是语调语言。在汉语中每个音节中都有声调，并且声调是音节的固定组成部分，具有辨义功能。英语的句子要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而加以不同的语调，语调对于表达思想感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汉语的口语中，除一些轻声语助词念得较快较含糊外，一般每个音节(字)都念得清清楚楚。虽然音节也有轻重之分，却没有英语那样明显。英语的语句虽然是重音和轻音交错出现，但以重读音节为基础，为主体。而非重读音节则声调较低，响度较小，念得比较快而含糊，汉语中每个字都是一个音节，字与字之间稍有停顿，界限分明。而英语中一个词可以由多个音节组成，词与词之间采用连音，失去爆破等技法，过渡圆润。

第四，中国英语强读与弱读的区别不明显。英语中不少词有强读和弱读两种读音，弱读首先是响度变小、时值变短，辅音的音色也要发生改变，出现弱化或省略。如Have的强读式为[hæv]，弱读式为[həv]、[əv]或[v]。词典和课本上标注的一般为强读式读音，而语流中弱读式更为常见。汉语有轻声，是指一个音节失去原有的声调，读成较轻较短的调子。轻声音节的音长变短，音强变弱，而音色变化不大。汉语里起辨义作用的是声调，强读音节与轻读音节的差别不明显，受

汉语这一习惯的影响，中国英语的强式与弱式读音区别不十分明显。

第五，从语速看，除去语言水平、流利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读相同的内容，中国人语速也通常不如本族人快。以广播新闻为例，陈阳(2006)所作的调查中，VOA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整点六分钟的新闻播报可达到140~148个词每分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的速度是120~122个词每分钟。

总之，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发音习惯。正如诗人贺知章所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道出了乡音的顽固性。汉语作为母语，其根深蒂固的发音习惯会影响中国英语语音层面上的表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英语节目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发音较为标准，然而听者仍然能听出其中的"中国味"，即使不看也大多能辨别出是中国人在说英语。

5.4.2 中国英语的词汇特征

语言变体在词汇层面的表现最为突出，而中国英语在词汇层面的研究也是最集中的。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的特征是所有学者所公认的中国英语最为明显也最为广泛的特征，所有否认中国英语存在的学者都不否认大量的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词汇的存在，并认为这种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语言既可以充当社会交际的工具，也可以充当人们思维的工具。这样，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总是要受到社会的制约。其中，词汇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最为敏感也最为活跃。在英语漫长的演变历史中，英语词汇的变化最为剧烈，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英语词汇中涌现出大量的新词新意。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正值改革开放时期，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广度与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期间，有许多中国英语词汇进入英语，张震久和袁宪军1994年主编的《汉英中国专有名称和术语简明词典》就收有3万条词目。据英国一家咨询公司统计，2005年该公司的数据库中新增了2万个英语单词，其中20%来源于中国英语。据说平均每天将14.7个"新词"收进英语家族，折算一下，平均每98分钟就有一个英语新词问世，平均每天有一个中国英

语杀入“标准英语”家族。几乎所有的汉语借词都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而且表意相当的准确简明(谭玉梅，陈兰英，2008)。这些词汇不仅准确地表述了中国特有事物，而且有效地介绍了中国独有文化，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传统道德以及社会常规等。Garland Cannon(加兰·卡农)(1988)总共统计了1189个汉语借词；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001)收录了230个汉语借词。中国英语词汇具有涉及面广、翻译方式灵活、表意准确等特征，不仅中国人使用也往往被国外媒体所引用。可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下面这些词汇都是中国英语词汇：Fengshui(风水)，Shifu(师傅)，Yongchunquan(咏春拳)，Hutong(胡同)，Silk(蚕丝)，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一国两制)，Five-year Plan(五年计划)，Win-win(双赢)，Super Girl(超级女生)，the Three Represents(三个代表)，Bird’s Nest(鸟巢)等。

5.4.3　中国英语的句法特征

句法学研究句子的构成方式，句法反映的是句子内部词与词之间的连接，反映的是语法范畴的规则和习惯。而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汉语句式和英语句式的构成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中国英语受到汉式思维的影响则反映出了自己的句法特色。

首先，句子结构方面：汉语属于左分支结构(Left-branching)，而英语属于右分支结构(right-branching)。因此，中国英语多表现为修饰成分前置，如时间、地点、原因等状语在前。例如，相对比 I met Tom in the street yesterday morning. 中国人更喜欢 Yesterday morning，I met Tom in the street.的说法。其次，受汉式认知突出主体的思维影响，中国英语句子中主动语态居多；再次，英语重形合(Hypotaxis)，汉语重意合(Parataxis)。所谓“形合”，就是主要靠语言本身的语法手段来连接句子成分。而所谓“意合”，就是主要靠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来连接。因此，英语句子结构紧凑严谨，而汉语结构简洁明快，以“流块结构”为主要特点，句子简短，形式松弛，赋予韵律。汉语句式结构的这种特点在中国英语句式中表现颇多，形成了不少独具特色的短句式，如“One World，

One Dream.”(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北京2008年奥运会中英文主题口号)、“One Country，Two System”(一国两制)、“Safety First，Prevention First”(安全第一，预防为主)、“Life above Everything，and Service Is First and Foremost.”(生命至上，服务第一)等。此外，根据英语的习惯，在语句中避免使用含有should和must等语气强烈情态助动词的句子，以免有强加于人的感觉。然而在中国英语中，这种语句非常多，尤其在强调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时，这种语气更加强烈。比如在China Daily中有一篇题为“Apology Good，Action Better”的文章，这是一篇关于北京朝阳区居民要求政府关于垃圾堆气味造成身体伤害道歉的文章，文章中出现了“The apology signal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good services to citizens.”“People should demand that officials work more diligently and …….”“…… they must immediately. apologize to the people.”“That is what a modern people-oriented government should look like.”“The apology must be out of their hearts and remedies should be taken immediately.”等等。这些句式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但均属于规范英语，能被英语国家人士所接受。总之，中国英语在句法方面表现为多用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句式。

胡晓丽认为，根据洪堡特著名“语言世界观”论断，语言与思维在发生上的同源性决定了彼此间的密切联系。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实际上是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方式导致汉语遣词造句往往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代表理性思维的英语则相反，英语讲究形式结构严谨，以分析达其意。思维模式既然通过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呈现出来，语言的符号属性就会使思维模式的差异性通过跨语言的形式体现出来，这就是中国英语句法特征产生的必然性。比如，中国的对外英语报道更倾向于修饰成分前置，而在英语本土文本中，后置修饰语是一种常见的用法。

5.4.4 中国英语的语篇特征

语篇(discourse)是指实际使用的语言单位，是交流过程中的一系列连续的语

段或句子所构成的语言整体。汉英在叙事风格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汉语的陈述与描写讲究语言的华美，英语则崇尚平实与简洁；汉语论说文直截了当，英语则委婉含蓄。在中国人的英语对外报道中，难免会受汉语思维和写作特点的影响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语言风格。

从功能上来说，语篇相当于一种交际行为。因此，语篇的得体性只有在运用中靠一定的语境才能确定。从语境的角度分析，中国英语是在中国思维与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英语是在汉语与英语融合的背景中产生的，虽以规范英语为核心，但描述的却是中国的社会现象或以中国人的立场和角度来描述国际现象。所传达的意义是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常规为出发点的。而在交际的过程中也表明了中国人的立场和观点。因此，对于由中国英语所构成的语篇得体性的认可需要从中国社会的语境入手，而非以英语母语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标准为背景分析。毕竟，意义的产生是需要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因此要反映中国特色的内容必须选择与其相匹配的中国英语语言形式。

语篇能力强调的是连词成句、连句成篇，在一定的语境下对较大单位意义的处理。中国英语在国际规范英语的基础上，以反映中国独有事物的特有词汇连词成句，同时由于受到汉语思维与汉语句法的影响，布局谋篇时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篇特点。在书信请求中，中国英语反映了“问候—客套—理由—请求—结束”的心理图示。表述迂回委婉，而英语则是直奔主题；在论说文中，中国英语往往采用归纳法，先提出现象，论据分析，最后提出观点。而且受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国英语分析问题经常采用两分法，而英语常为非此即彼，要么支持要么反对；在描写文中，中国英语也常常按汉语思维模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顺序逐渐展开，常为先交代清楚背景后再叙述事件。另外从文体的角度看，中国英语还表现得行文华丽，常用大词，修饰成分多；表达明确观点立场时常用 You should……，You must……等表达，犹如当面说教的语气。胡壮麟在他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一书中指出，语篇的理解不仅仅靠衔接手段(如词汇连接、句式连接、语义连接等)，还要靠语篇的情境和文化意义的传达。世界各民族都

要运用移情的手段以便实现成功的交流。移情(Empathy)强调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交际中，双方都要设身处地尊重对方思想感情、语用原则和民族文化习俗，从而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如2008年9月17日的 China Daily第7页中出现这样一个句子“Wishing big brother Hu and Baobao the best of health!”。单独拿出这句，即便是具有很高英文水平的中国人也无法理解其意义。可如果告诉读者其中的 Hu 代表的是 Hu Jintao(胡锦涛)，Baobao 代表的是 Wen Jiabao(温家宝)，那么意义马上油然而生，豁然开朗。可是即便将此解释告诉英语本族语者，恐怕仍然不能清晰了解其含义，或许只知道是句祝福的话语而已，对Big Brother所传达的含义恐怕很难体会。而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说法不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可是为了保留其本来所想表达的感情色彩，体现中国人对国家领导的亲切爱戴，China Daily必须运用中国英语以求保留原味。但是如果英语本族语者通读全篇过后，根据上下语境应该是可以理解这句话所想表达的含义的。因此对于中国英语语篇的理解常需要非本族人以积极尊重和理解的心态，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及思维逻辑。

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无论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中国特色，同时又不失以内圈英语语法为主要规则。

5.5 中国英语的构成方式

对于中国英语的构成方式，学者们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李文中(1993)将中国英语(他称之为汉语借词)划分为3种形式：音译词、借词+英语、译借；万鹏杰(2005)认为中国英语的构成方式有音译、译借、语义再生；司显柱(2008)将中国英语分为音译词、译借词、直译词和语义再生4种形式；杨莉(2010)将中国英语的构成方式划分为音译借词、意译借词和混合借词；范勇(2015)将中国英语的构成方式划分为音译词、音译+类词、音译+释义、译借词、译借+释义和意译词6种。本书按照范勇先生的分类方式来介绍中国英语的构成方式。

5.5.1 音译词

所谓“音译词”(Transliteration)，即基本按照汉语原词读音构成的中国英语。“在汉英翻译实践中，对于那些具有浓郁民族语言特色而且在目的语文化中又属于意义空缺的汉语词汇，采用汉语拼音拼写方式已几成惯例”(王银泉，2006)。这类借自汉语的英语中的外来词大都已被英语所吸收和同化，成为英语固有词汇的一部分，因此它们既能为英语国家读者所熟悉和理解，又能彰显鲜明的汉语语言文化特色。早期的音译词主要通过广东话传入英语，拼写的变异形式较多，如：Ginseng(人参)、Litchi(荔枝)、Kaoliang(高粱)、Taichi(太极)、Tea(茶)、Mah-jongg(桌上游戏：麻将)、Kowtow(磕头)、Kung Fu(功夫)等。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用来翻译“功夫”的是另一个词语Martial Art，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根

据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第5版)的解释，Martial Art指所有起源于东亚的以手脚攻击对手的搏击术，包括“柔道”和“空手道”，因此，英语中的Kung Fu用来特指“中国的功夫或武术”。稍后出现的音译词主要以汉语拼音为标准，拼写也趋于统一，如Fengshui(风水)、Yin-yang(阴阳)、RMB(人民币)、Ping-Pong(乒乓球)等。Ping-Pong是汉语“乒乓球”在英语中音译词，虽然“乒乓球”这一项目最早起源于英国，英国习惯称之为Table Tennis(桌上网球)，但由于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这一项目上占据优势地位，近年来更是成为垄断该项目的绝对霸主。另外，乒乓球运动还曾在中国的外交和其他对外交往中起到特殊的作用(如20世纪70年代中美乒乓球互访对中美关系改善的推动)，因此该运动项目已深深地打上中国的烙印。一些词由于约定俗成，仍保留原来的译法。如：Inner Mongolia(内蒙古)、Tibet(西藏)、Lhasa(拉萨)、Honkong(香港)、Macao(澳门)、Kowloon(九龙)等。近年来“关系”的英译由“Guanxi”逐渐取代了“Relationship”，频繁出现于英美报刊，“气”过去的翻译有“Vital Energy”“Meditation”“Breath”“Exercise”，现在直接译成了“Qi”。

2007年10月17日，新华网报道，北京2008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英译正式由“Friendlies”更名为“Fuwa”，理由是“改为汉语拼音后更好记，便于推广”。纵观历次奥运会吉祥物的英文名，大多带有举办国的民族特色。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吉祥物德国猎犬“Waldi”，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吉祥物俄罗斯熊“Misha”，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吉祥物小老虎“Hodofi”。这些词对于其他国家的人们来说最初都比较陌生，但利用网络或其他媒体的人能很快了解这些事物。在中国英语的各构词方式中，音译保留了尽可能多的文化因素，往往能给本族人亲切感、认同感，外国人也能体会到汉语言文化的精妙，成为中外都日益接受的翻译方式。

5.5.2 音译+类词

“音译+类词”是指除了音译词外，再加上表示类别的英语固有词汇所构

成的短语。有些学者也把这一类归入音译词中。如Kung Fu Movies和Kung Fu Monks都是由一个已成为正式英语词汇的汉语借词Kung Fu和一个英语固有词汇构成，用来表示一个具体类别的概念，分别指功夫片和武僧。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Confucian Heritage(儒家传统)、Taoist Art(道家艺术)、Taoist Priest(道长)、Feng-shui Master(风水大师)、Tai Chi Shadowboxing(太极拳)、Changquan Discipline(长拳)、Mao Zedong Thought(毛泽东思想)、Mao Suits(毛氏套装)、Mao Quotations(毛主席语录)、Mao buttons(毛主席像章)、Beijing Opera(京剧)、Shanghai Opera(沪剧)、Kunqu Opera(昆曲)、Minnan People(闽南人)、Qing Dynasty(清朝)、Song Dynasty(宋朝)、Qing Court(清廷)等。

采用“音译+释义”的构词方式可以灵活方便地表达与某一汉语借词或音译词相关的各种中国文化特色概念，而不必再生成专门的单词来指称相关概念，因此是非常有效的。

5.5.3 音译+释义

“音译+释义”是指在音译后加上解释性文字，说明音译词的具体含义或文化背景，其音译部分大都是还没有进入英语词汇系统的汉语文化特色词。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因此有很多概念是英语中所没有的(即所谓的“语义空缺”现象)。而这种构成方式一方面可以再现“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满足外国读者对古老中国社会文化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又能对其进行关键性的解释，有助于外国读者理解，填补文化认知空白。如Gullet-searing Grain Spirits，Collectively Known as Baijiu(白酒)、the Region’s Brand of Tea，Known as Pu’er(普洱茶)、the Sorghum-based Liquor，Called Moutai(茅台)、Wendou，a Type of Pea Used to Make Noodles(豌豆)、a Thousand-year-old Chinese Fiddle Called the Erhu(二胡)、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uth Organ，the Xiao(箫)、Longtang，or Lane，a Narrow Street Populated by Shanghai’s Once-characteristic Shikumen，Courtyard Houses(弄堂)、Yanglou，or Foreign Buildings，That Were Built as Fortified Homes

by Returning Chinese(洋楼)、Juanqinzhai，or Studio of Exhaustion from Diligence Service(倦勤斋)等。

还有很多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层面的中国英语也是以“音译+释义”形式构造的，如Guan Er Dai and Fu Er Dai—the “Second Generation”，Children of Privileg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Supper-rich官二代和富二代。其中“Guan Er Dai”和“Fu Er Dai”是“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音译，这是近两年才出现的热词，“官二代”和“富二代”有很强烈的社会联想意义，同时有一定的贬义，特别是让人联想到某些富有阶层和官员子女的种种不良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成为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热词，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当代社会的热点问题。音译后用破折号进行了注解，并特别强调他们是“拥有特权的政府官员”(Privileged Government Officials)和“富豪们”(the Supper-rich)的后代。还有如Wuwei，or Nonaction无为、Kai Guang or “Opening the Eyes”—Literally，Opening Brightness(开光)、the 18 Levels of Diyu，a Taoist and Buddhist version of Hell(十八层地狱)、Zao Jun，as One of the Book’s Chattiest，Most Down-to-earth Characters(灶王爷)、Guanxi，or Connections(关系)、Hongbao—Envelopes of Cash That Can Make up a Third of a Doctor’s Income—in Exchange for Better Treatment(红包)、the Expo Mascot—a Blue Gumby-like Character named Haibao(海宝，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吉祥物)、Xing Guang Da Dao，“the Amercian Idol”Knockoff Show(星光大道)、Stability Maintenace，Known as “Weiwen”in Chinese(维稳)、Kenlaozu—Literally，People Who Nibble on Their Elders(啃老族)、Hanban，a Language Council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Education Ministry(汉办)等。

“音译+释义”还可以表达重要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机构名、杂志或其他媒体名称等。这些专有名词按照国际惯例以汉语拼音的形式译出，然后加以解释，其中有的还有一定的文化联想意义。如Zhongnanhai，the Leadership Compound in Beijing指中南海，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它特指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官邸，类似于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10号”或俄罗斯的“克林

姆林宫”，有特定的政治联想意义。因此，解释部分为the Leadership Compound in Beijing。这样的例子还有a Legendary Military Strategist Named Sun Tzu(军事家孙子)、Xinhua，the State News Agency新华社、the Party's Main Theoretical Journal，Qiushi(《求是》杂志)、Tianya，a Popular Message Board(天涯论坛)、Baidu Baike，a Chinese Version of Wikipedia(百度百科)等。

5.5.4 译借词

“译借词”指大体上按汉语原词的字面意思直译而生成的中国英语，因为它是通过直译手法借用汉语词汇，因此称为译借词。有时能够“巧妙地运用形象化词语，创造具体生动的意境”(谭卫国，2004)。译借词有以下几种情况：(1)按汉语字面直译能够传达原词含义且语言通顺，或者英语中有形式和意义与之基本对应的词语。如the God of Wealth(财神爷)、One-Chiled Families(独生子女家庭)等；(2)对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比喻、拟人等形象语言采用直译手法，保留生动传神的汉语文化意向。如Iron Roosters，or Birds So Stingy They Would Not Share a Feather(铁公鸡一毛不拔)、a Devastating Flood or an Invasion of Savage Beasts(洪水猛兽)、Wealth Does Not Last for More Than Three Generations(富贵不过三代)、Thousands of Soldier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Hourses across a Single Log Bridge(千军万马过独木桥)、Fishing a Needle out of the Sea(大海捞针)、Those Who Have Done no Wrong are not Afraid of Ghosts Knock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They Won't Even Know Which Way Is North(找不到北)和Harm Others But Bring no Profit to Itself，Either(损人不利己)等。(3)某些直译的中国特色概念已为外国读者所熟悉，因此直译入英语而不加任何补偿处理。如the Year of Ox牛年，由于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以及广大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使很多外国人士也知道中国的农历生肖年，因此直译即可，不需解释。再如Harmonious Society(和谐社会)、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Develop the West”Campaign(西部大开发)、the One-child Policy(独

生子女政策)、One Country，Two System(一国两制)和image projects(形象工程)等。(4)逐字逐句翻译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内容，减少文字的沉闷感，主要用于中国官方政策的翻译。如Observe calmly; Secure our position; Cope with affairs calmly; Hide our capacities and bide our time; Be good at maintaining a low profile; and Never claim leadership.(冷静思考，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这是邓小平同志在谈论中国外交战略时所说的一段话，基本采用了直译策略。再如With our flesh and blood，we will build a new great wall!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reached the critical hour，compelled to give their final call! Arise，arise，arise!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Push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改革开放)、the Important Thought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三个代表重要思想)、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科学发展观)、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5.5.5 译借+释义

“译借+释义”是在对某些中国特色词语按字面直译后，再加上解释性文字，既可以再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又能帮助外国读者理解原词含义或相关文化背景。这种释义一般是在译借部分之后加上一段注释文字，以of连接，也可以是以介词短语或定语从句形式出现的修饰语。(1)中国社会特有的专有名词，如Donkey Hide Gule，a Substance Priz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阿胶，亦称驴皮胶)，外国读者对中药不甚了解，加上一段解释：a Substance Priz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说明其性质和功用。the Yellow Crane Tower，an Ancient Pagoda黄鹤楼，不加上后面的解释an Ancient Pagoda，读者有可能误以为它是一个现代建筑。再如Seeking Truth，an Offical Journ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求是》杂志)、the State Council，China’s cabinet(国务院)、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e Stalinesque Conference Center on Tiananmen Square(人民大会堂)、the Commnunist Party's Flagship Newspaper, People's Daily(人民日报)、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 Government Advisory Body(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2)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或特定历史时期的概念，如Mr. Deng's Famous 1992 "Southern Tour"—in which he called for bolder reforms and encouraged people to get rich(1992年邓小平南巡)、the Great Leap Forwad, a Political Campaign(大跃进)等。(3)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而涌现的汉语新词语，它们往往言简意赅、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特别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的推动作用，它们在大众中传播迅速。这些汉语新词语，如果只按字面翻译，对不熟知中国当代社会的西方读者来说，往往词不达意、不得要领，而一味意译或诠释，又抹杀了原词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个性。因此，"译借+释义"的译法，既能保留原词的中国文化特点，又能传达原词的意义。如Red Tourism, in which Chinese, many of them young professionals, journey to famous revolutionary sites to rekindle their long-lost sense of class struggle and proletarian principles(红色旅游)、Special Service, or Prostitution(特殊服务，暗指"色情服务")、Nail Houses—Homes Sticking out on Tracts of Cleared Land, whose owners resist eviction(钉子户)、Post-80s Generation Born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s by Deng Xiaoping(80后，中国依法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所出生的一代人)、the Little Third, the Colloquial Term for a Mistress(小三)、Language Teaching Centers Known as Confucius Institutes(孔子学院)、Peaceful Rise—be modest, act prudently, don't frighten the neighbors and certainly don't galvanize any coalition against us(和平崛起)、Relief Stations that provided short-term room and board and tickets home to those who requested them(救助站)、the Olympic Stadium in Beijing Known as the Bird's Nest(鸟巢)、Social Unrest—what it terms Mass Incidents(群体事件)、a New term for educated young people who move in serch of work, the Ant Tribe(蚁族)、Opinion Guidance that restricts what Internet users can read or write online(舆论导向)等。(4)采用了明喻、暗喻、类比、拟人等修辞手法的汉语语

言。由于喻体和喻义之间的关联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如果直译，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外国读者很难领悟到喻体所蕴涵的喻义。但如果只翻译喻义而舍弃喻体，则汉语词语所具备的形象生动的修辞效果又荡然无存。所以采用“译借+释义”表达手法可以做到形神兼备。如Who had eaten their fill and had nothing better to do(吃饱了撑的)、Hired Gun，a test taker who will assume the student'identity for the grueling two-day college entrance exam(枪手)、the Tiniest Feet—Three-inch “Golden Lotuses”(三寸金莲)、just like a Lion Opening Its Bloody Mouth，a Chinese Proverb for Voracious Greed(狮子大开口)、“Iron Rice Bowl”System of Cradle-to-grav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State(铁饭碗)、Some Zhang，Some Li，to refer to and unidentified person—the equivalent of “Just Anybody” in English(张三李四)等。

5.5.6 意译词

“意译词”是指摆脱汉语原词的字面形式，按原词语义用英语重新表达或阐释而生成的中国英语。虽然这种中国英语没有原词形式上的痕迹，但在内涵概念上依然有中国文化特征，仍然属于中国英语。采用意译法构成的中国英语主要是西方人很少听说的一些中国社会特有的事物，它们很难按字面直译，必须改变原词表达方式，用英语进行解释，或按照英语国家读者所熟悉的词语表达。(1)反映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价值观和道德观之类文化深层次概念的词语，如Filial Piety(孝顺)，“孝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推崇的道德准则，也是主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道德观念在西方并不存在，也和西方人的道德标准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顺”，不仅仅是奉养父母，而且是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的心意，这在讲求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西方社会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所以，“孝顺”一词所表达的概念，在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文化词汇空缺。因此，将“孝顺”解释为Filial Piety，但即使是这样的阐释，和“孝顺”一词所包含的深刻文化内涵还是有很大的差

距。因为Filial在英语中的意思是：relating to the relationship of a son or a daughter to their parents(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5th Edition))，而Piety则有宗教含义，意思是：When you behave in a way that shows respect for your religion(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5th Edition))，可见，像"孝顺"这样西方人很难理解或接受的表达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文化特色词汇，即使采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进行阐述，也很难真正将原词的精神实质传达给西方读者，这是由于词语强烈的文化异质性所造成的表达障碍。笔者认为，如果假以时日，此处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成 "Xiaoshun"，将更为贴切。(2)随着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不断涌现的，西方读者还未来得及了解的新词新语，如Affordable Housing(经济适用房)、Recycled Cooking Oil(地沟油)、Buyout Packages(买断工龄)、"Out of Quota" Child(超生子女)、the Chinese Bullet Train(动车)、Middle-class School(贵族学校)、Antipornography Campaign(扫黄)、City Block Demolitions(旧城改造)、Coal Millionaires(煤老板)、Vulnerable Citizens(弱势群体)、Layoff(下岗)等。(3)其他一些中国社会特有的事物，如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户籍制度)、Residency Permits(户口)、Registered Hometown(户口所在地)、Residence papers(户口本)等。户口/户籍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一种人口管理方法，中国公民出生后被要求选择其父母的一方户籍作为自己的户籍，在就学、就业等很多方面都要受到户籍的限制。这种社会管理制度只有在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存在，因此，也是绝大多数国外读者很难理解的概念，有非常强烈的文化专属性。还有如One-child Policy(独生子女政策)、Family Planning(计划生育)、College Entrance exams(高考)、Cut-off Mark(分数线)、community center(街道办事处)、Heilongjiang Province Liaison Office in Beijing(黑龙江省驻京办)、Test Case(试点)、Camps where vagrants could be legally detained(收容站)、Petition Bureau(信访局)等。(4)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词语，因为涉及民族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文化异质性。如Family Ancestral Hall(祠堂)。"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中国封建时代大家族体系的产物，在西方历史上完全没有类似的事物，因此，对西方读者来说

完全陌生。再如Family Altars(牌位)、a Set Comprising 12 Animals from the Chinese Zodiac(十二生肖)、Sworn Sisters(结拜姐妹)、Paw-waving Porcelain cats(招财猫)等。(5)中国民俗词语，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民俗词语在英语中已有了约定俗成的表达方法，且与汉语原词在字面上有很大的差异，如Dragon Boat Festival(端午节)、Tomb Sweeping Day(清明节)、Lantern Festival(元宵节)等。(6)与中国历史(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有关的文化特色词，如Terra Cotta Warriors(兵马俑)。“兵马俑”是中外闻名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很早就被许多外国人士所了解，因此在英语中早就有约定俗成的译法，Terra Cotta的意思是“用陶土烧制的，表面呈红棕色的”，该词形象地描述了“兵马俑”的外形和材质。再如Scholar-official(士大夫)、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长征)、Imperial Seal(玉玺)、the Foreign Concessions(租界)、Thatch-covered Pits(窝棚)等。(7)与中国经济有关的词语，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日益成为经济大国，如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小康社会)、Two-tiered System(双轨制)、Rural Migrant Workers(农民工)、Porperty-tightening(房产调控)、the Chief of Construction(包工头)、Second Homes(二套房)、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创业板)等。(8)中国政治领域词汇，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特色社会主义)、Party Cells(基层党组织)、Party Aspirant(入党积极分子)、Wielders of the Pen(笔杆子)等。(9)中国宗教领域词语，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强烈异质性的文化成分，如Head Monk(方丈)、Buddhist Master(高僧)、Tibetan Abbot(活佛)、Buddhist Goddess(菩萨)、the Warrior Monks(武僧)等。(10)中国饮食、中药、服装等文化词汇，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并随着分布在全球的华人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其中，传统菜肴的名称，更是具有形象写意、注重菜肴意蕴和美感的特点，富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如Chicken Feet with Pickled Peppers(泡椒凤爪)，这是中国菜系的一个常见菜名，“泡椒凤爪”中的“凤爪”，当然不是“凤凰的爪子”，如果将“凤爪”译成Phoenix Feet，对不熟悉中国饮食文化的西方读者来说，肯定会惊诧不已，心生疑惑。再如Skewers of Vegetables and Meat Cooked

in a Spicy Soup(麻辣烫)、Stir-fry(炒)、Curst at The Bottom of a Rice Pot(锅巴)、Caterpillar Fungus，a Parasite Highly Valu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冬虫夏草)、Alcohol-based Tonics Steeped in Tiger bone(虎骨酒)、Courtyard Houses(四合院)、Cave Home(窑洞)、Imperial Potteries(官窑)等。(11)中国艺术、文学、体育等相关词汇，如China Central Television's Lunar New Year Gala—the Most Watched Event of the Chinese Television Calendar(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Cross Talk(相声)、Chinese Tongue Twister(绕口令)、Farewell My Concubine(霸王别姬)、the Skeleton Enchantress(白骨精)、Hanging Scroll(立轴)、Ink and Brush Painting(水墨画)、Monkey King(孙悟空)等。(12)其他一些意译的中国英语，如the Summer Palace(颐和园)、Scholars'Garden(苏州园林)、the Forbidden City(故宫)、the Great Wall(长城)、Traditional(Chinese)Characters(繁体字)、Mandarin(普通话)、Classical Chinese(文言文)、Netizens(网民)、Senior Leaders(首长)等。

5.6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关系

经过对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两种语言形式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确实，中国式英语与中国英语都是由于受到母语的迁移和影响所产生的，但是这种影响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国式英语是英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过渡语，是受母语负迁移影响及学习水平的限制而表现出来的不符合规范的语言形式。而中国英语则是英语在中国长期的使用和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进而形成的本土化英语变体。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核心，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创造性手段，传达中国特有的文化、事物、观念、身份等，以及反映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英语变体，具有一些独特的语音、词汇、句法、语篇及语用特征。而中国的官方媒体，包括文本及电视、广播等相关英语渠道都是中国英语规范的稳定来源。虽然中国式英语与中国英语具有不同性质，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两者都是受母语迁移的影响，前者是受负迁移影响，而后者则是母语正迁移的最大化。中国式英语是学习过程中的过渡语，是错误的或畸形英语，它不利于跨文化交流与理解，却也是不可避免的阶段。而中国英语则是规范英语与中国文化的有效结合，是反映中国人独特文化和观念的产物。它更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国式英语与中国英语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随着语言的使用变化，某些中国式英语是会转化为中国英语的。中国英语还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完善。

以往学者大多抱着除掉中国式英语，保留中国英语的观点，其实这是一种

理想化、不切实际的想法。首先，中国式英语是过渡语，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其次，中国式英语与中国英语是在连续统一体上，中国式英语在最底层，中国英语则在最上层。也就是说有些中国式英语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转变成中国英语的，而中国英语也是在不断完善之中，有些表达会保留下来而有些则会被淘汰，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中国式英语的存在价值，以便更好地研究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受到母语汉语及英语的负迁移影响，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了与规范英语的差别，导致了本族语者的不可理解性；而中国英语是受母语的正迁移作用，虽在各个层面上也表现出了与规范英语的差异性，但是足以使本族语者理解，而且是对规范英语的有利补充，填补了文化空白或表达了中国的文化身份。也许在中国英语中也有本族语者感觉不舒服的“中国味”，但这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这并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此外，在中国式英语中那些简洁、上口、反映中国特色思维的“有趣”的句子，在广大人群中使用后极有可能转变为中国英语。如 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Pay money 等用法很有可能被广泛接受。虽然不符合规范英语，但是却很上口，容易流传。这都要取决于语言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不能草率地定论。根据全球语言监督机构的最新报告，英语正在经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究其原因是受到全球化大环境下中国式英语的强烈冲击。中式英语“很久不见”(Long time no see)，还有从广东话吃点心的“饮茶”直译过来的 Drink tea 等，现已成为标准英文词组。

就目前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发展情况看，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还是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本质区别。

5.6.1 规范性不同

中国式英语是由于不了解或忽视英语习惯形成的不合规范的表达。由于受英语水平的限制，一些错误学习者自身也没有意识到，如英语有“数”的范畴，要求主谓语单复数一致。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们往往容易忽略主谓语“数”保持一致的情况，特别是当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时。例如“He like to

go to dances and parties”。

有的中国式英语的出现却是说话人为了在一定交际范围内达到幽默的效果，故意背离英语规范，将汉语生硬地译为英语。例如在大学里常被学生用来作为玩笑的说法“如果你再不三不四，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If you are no three no four，I will give you some colors see see.)不少中国人看到此会会心一笑，它具有一定的幽默效果，但英语国家的人看了也许不知所云。这对语言的规范是不利的，不值得倡提。

不论中国式英语产生的原因如何，这些不合规范的英语形式同本文所讨论的中国英语不同。中国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用于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虽然它仍然受到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但它以遵守英语的规范为前提，是能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形式。

5.6.2 汉语言与汉文化的迁移作用不同

中国式英语的出现是由于汉语和汉语思维方式不如人意的介入，并起到了负迁移的作用。中国英语反映汉文化的特点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它一方面强调遵守英语的习惯，另一方面力求保留中国文化的信息，汉语和汉文化的负迁移作用被尽可能降至最低。

中国英语能弥补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英语表达的空缺，丰富英语的词汇。例如“一国两制”(One Country，Two Systerms)、“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铁饭碗”(Iron Rice Bowl)、“风水”(Fengshui)、“阴阳”(Yin-yang)等都是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在国内外新闻媒体的报道中高频使用的词汇。

5.6.3 使用的范围不同

中国式英语是不规范的，在正式场合被尽力避免和排除。中国英语主要用于国内的官方媒体，如：CCTV International，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报纸杂志

如 China Daily，Beijing Weekly；正式出版物，如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等。它同时是文人们进行文学创作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例如林语堂的《浮生六记》《京华烟云》等。近年来，中国英语还广泛地用于旅游业对历史文化和自然景点的介绍，餐饮业对中国菜名的翻译，包括针灸、气功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的介绍等。另一方面，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国际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中，中国英语也屡见不鲜，成为西方大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5.6.4 个体与整体的不同

中国式英语的错误形式因人而异，是对个体而言的。随着个人英语水平的提高和对英美文化了解的加深可以避免和更正。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形成的变体，在语言各层面上表现出了一系列特征，是针对群体特征而言的。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一目了然，也非恒定不变的，某些原来被认为是中国式英语的词语，如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Paper Money(纸钱)等随着它们在国际交流中的频频出现，会潜移默化地被大多数国际民众所接受和认可，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甚至出现在中国官方的主流媒体上如China Daily。正如胡晓丽(2008)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确实存在中国英语变体，它是一个连续体，一头是中国人对英语的干扰变体，即中国式英语，另一头是受汉语干扰的中国英语，两者之和构成了同一事物的全貌”。

5.7 中国英语的意义和影响

中国英语作为国际使用型英语的变体，在汉英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语言和文化总是密切相关的，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英语一旦和中国文化接轨，承载上中国文化的内容，就会给人留下一种完全陌生化的文化语言现象，即中国英语在文化取向上表现出的强烈的“异化”特征，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异化”倾向有其独特的跨文化价值。一些社会学者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彼此都不相同。所以我们能很流利地用汉语表达中国的文化，而用英语来表达就很不流利。这时人们就会把这些表达看成是不标准或不地道的。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确实应采取“异化”原则。如宋更宇曾认为“亚洲四小龙”应译为“Four Little Tigers of Asia”，而不是“Four Little Dragons of Asia”。他认为后者虽然句法表达准确无误，但与英语文化取向相悖。因为“dragon”一词在西方文化中是罪恶的象征，它被用来指“一个凶猛残暴的人”或者“一种残暴的力量、邪恶的影响”，中国文化中的那种“吉祥”“权威”之意在西方文化中荡然无存。然而，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对“龙”的传统观念，凡出现“龙”的地方(龙舟、龙灯、舞龙等)，在汉译英时不一定都得改成一种令西方人接受时“感到愉快”的形象，以求“地道”。这不仅不利于在东西方交流中推广中国文化，保持中国特色，反而是接受了“语言殖民”。所以，中国英语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是对英语语言有益的补充。人们借助于“异化”的原则对外来文化所获得的理解，将会更加真实、深刻，文化冲突只能在文化交流中获得和谐与统一。

5.7.1 中国英语的跨文化价值

随着世界向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日益普遍，文化的趋同性和对文化差异性的认可与尊重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也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有着强烈“异化”特征的中国英语是符合英语语言规律、能被内圈英语所接受、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中国英语是英语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普遍的跨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不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首先，语言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自古以来，英语就是一门开放性的语言，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着其他各国的语言。而当代英语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具有强大的包容和吸收能力，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语言和文化越来越多的影响，也就有了今天的世界英语这一概念。而中国英语将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带入世界英语，丰富了英语的表达形式，促进了英语与汉语的相互渗透，增强了英语的生命力，也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很多原本不属于现代英语的词汇，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中西两种文化的长期接触与交流，已被英语国家读者接受，并在大众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虽然这一过程非常漫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生命力的中国英语最终会被大众所接受，并在英语表达体系中扎下根来，成为英语中的“舶来语”。

其次，在全球化普遍深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背景下，文化的融合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以“异化”为文化取向的中国英语成为一个让西方读者在跨文化语境下直接接触中国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平台，通过了解和比较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来缓和文化冲突，促进文化的多元化。笔者认为随着像Dragon Boat、Dragon Dance、Dragon Boat Festival和Croching Tiger、Hidden Dragon这样的中国英语的普及，西方读者就能够逐渐了解Dragon在中国文化中不同于西方的象征意义，从而消除对异文化的误解和排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将有助于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包容。

最后，以“异化”为文化取向的中国英语在国际交流中，能够丰富西方读者

的阅读经验，拓宽其文化视野和知识面，使其在中国英语所营造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异文化氛围中，获得新的启迪，通过文化传真使读者感受到文化的差异性，产生新鲜感，激发好奇心，从而主动去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成为愈加成熟的读者。

翻译工作者作为跨文化交际中的中间人，应该明确跨文化交际的结果不应该是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双方各自保持自己文化中固有的内涵和形式，在交际中重新认识和修正自己，使各自的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全球化更不是让一个国家的文化去同化其他国家的文化，而是把他们协调起来共同促进人类的美好未来。要把中国所特有的价值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饮食习惯、民族风情、地理风貌等翻译成英语，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肯定会出现很多内圈英语，乃至外圈英语中没有的词汇与表达，要翻译这样一些承载汉语文化的词汇表达，若是采用中国英语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汉译英策略。在翻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时一定不能仅仅考虑目标文化的接受性，以目标语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的“归化”翻译不利于传达原文的文化及民族特色，实际上也满足不了译文读者对异质文化的需求。因此，在翻译汉语文化特色词时应采用“异化”色彩强烈的中国英语，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尽量保留中国民族特色，有利于提升中国民族文化的地位，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5.7.2 中国英语的形成意义

首先，中国英语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交流。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局限性，都不可能全面、客观、恰如其分地反映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即便是词汇量极其丰富的英语也是如此。正如葛传椝先生最初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时所说：“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不过，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它所包含的事物与概念的名称远非英语所能容纳。有人曾经谈到这样一则趣事，一位外籍教师问一位学生早餐吃的是什么，这位学生竟然无言以对。因

为他吃的是包子和稀饭，而英语里却没有这两个词。英语在表现中国所特有事物显出不足，就需要我们将英语与中国文化、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寻求合适的表达。中国人需要用英语描述中国的文明，用英语来介绍自己的产品、文化、提供各种服务和进行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国际交流。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英语的社会功能，也是它存在与发展的客观依据。中国英语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在国际交流中承担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其次，丰富世界英语的变体种类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英语仅仅属于英国、美国或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本族语的国家。而随着英语越来越广泛地用于国际交流，各种区域性的变体不断出现。它在科学技术、旅游观光、外交、文化交流、法律、医疗卫生等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功能变体。当前英语在全球的使用情况是，“延伸圈”的人数大于“外圈”，“外圈”大于“内圈”。英语在中国虽然不像在新加坡、印度、菲律宾那样作为官方语言，然而英语在中国同样经历了本土化(Nativization)的过程。它既有国际英语的普遍共性，又有汉文化的内涵和汉语的特色。它把中国的事物和概念介绍到英语世界，增强了英语的表现力，丰富了英语的词汇量，是对世界英语的重要补充，而不是英语退化的表现。中国英语是中国联系世界的媒介，是世界英语家族不可或缺的一员。

5.7.3 中国英语的文化战略意义

如今，中国英语正逐步向汉语靠拢，吸收汉语特有的表达法，即用中国英语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中国英语也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

首先，在表达中国特有事物或现象方面，中国英语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就传播中国文化而言，中国英语是保证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有效交流的工具。中国英语能够用英语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等畅达地传播到全世界，与此同时，这种中国英语还保留着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色。因此，中国英语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能够被英语为母语的人接受，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英语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化对世界的

影响力。正如李文中(2006)所指出的那样：“其在中国的运用能够促进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对外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正意义在于把中国先进的文化成果、文化资源以及旅游资源介绍出去，让世界人民共享，在世界文化中获得中国应有的文化话语权利。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人文影响，其一就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对自我文化身份和人格的保持。

其次，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中国英语的存在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语言发展的历史证明，凡有生命力的语言都是沿着丰富化、抽象化、精密化的道路前进的，其中“借用”是语言丰富自身表现力的一种重要方式，中国英语丰富了英语的词汇，提高了英语的表现能力。它使英语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全世界获得了承载和表述中国文化的能力，中国英语所承载的特有的语言文化为英语注入了新的活力，帕亚克说：“这个趋势正在改变人们对英语语言的认知，同时也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加色彩斑斓。”中国英语产生不仅对汉语言研究，而且对英语的全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

最后，从文化层面来看，中国英语更加深入地促进了国家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以英语为媒介的国际文化交流，传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化，丰富了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促进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弘扬了民族文化。可以说中国英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媒介。

5.7.4　中国英语对英语语法的影响

中国英语对英语语法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语音、词汇和语法3者当中，语法往往是最稳定、最不容易发生变化的。但随着英语与中国文化接触的加深，英语的语法也正慢慢地发生着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不易察觉。如定语前置本是汉语的典型特点，而现代英语中亦有大为普及化的趋势。如许多单词通过连字符连接成为复合形容词，作前置定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Down-to-the-earth Manner；Just-for-once Discounted price。汉民族注重整体性，信奉“天人合

一”。因而，汉民族重视整体抽象，注重心理时空，特别强调时间顺序原则，注重空间的移动，另一方面，汉语是孤立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外形变化，也没有显性的词形分别。汉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汉语的这种属性对汉语造句联章成篇产生了显著影响。汉语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逻辑事理为顺序横向铺叙，形成一个由多到一的时间造型句法。换句话说，汉语造句不注意空间构架的完整，而是线性的、流动的韵律节奏，不滞于形，以意统形，因此汉语基本上是一个形散意合的表意系统。英语从莎士比亚时代起，处于科学逻辑学规范的影响之下，其表现形式严密地受到逻辑规范的支配，因此句子组织结构严密，主从层次明显。英语的形合句多于意合句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了。现代英语也主要是从综合性向分析性方面发展，向汉语这样典型的分析性语言靠拢。

5.7.5　中国英语对我国英语教育的影响

英语自传入中国以来，就不断地处在本土化进程之中，直至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英语。今天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英语教育。中国英语的形成对我国英语教育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 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树立“美美与共”意识

伴随着英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英语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不断渗透和传播，许多国家对本民族文化的安全深感忧虑和担心，人们也开始质疑在本国实行的英语教育。在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下，英语学习者能否建立起对母语文化的认同进而培养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事关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教育发展迅猛，同时也出现了极端功利化的趋势，我们过分强调了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母语文化的学习，我们对母语文化的认同感在不断地弱化，我们丢失了许多民族文化中的精华，这不仅阻碍了我们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会瓦解我们的民族凝聚力，甚至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而费孝通先生在阐释文化自觉时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对于正确认

识英语教育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美其美”是指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认同和由衷的热爱，我们要坚信，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们首先要了解、尊重、认同自己的文化，培养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美人之美”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多元的社会，要与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和平相处，就必须具有包容的心态和胸怀，以他者的美为美，了解其他文化的优点和精华，并由衷地欣赏其独特之处，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才能在交流和互补的基础上形成“美美与共”的局面，从而促进“天下大同”。

2. 坚持双向文化交流原则

交际是一种双向的社会活动，要顺利完成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都会影响交流的过程，主体文化的重要性更不容忽视。首先，从交际的场合来看，它可能发生在目的语国家，也可能发生在母语国家，还有可能在第三国家，因此，交际双方既要了解对方的文化，更应该深谙自己的文化，才能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其次，从谈话内容角度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谈论的话题是受交际双方社会背景限制的，比如人权、教育体制和风俗习惯等问题都是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最后，从交际双方本身来看，不同文化导致的差异会影响双方对语言的选择和理解。而我们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吸纳异质文化的精华并平衡两者的关系至关重要。英语教育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和桥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树立双向文化交流意识，努力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外国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了解自己，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培养学习者的文化反思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尊重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培养学习者的文化包容心态，理性地对待异质文化，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3. 将中国文化与英语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表达能力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迫切的。首先，英语教材的编写要遵循中外文化同构的原则。我国英语教材一度出

现完全西化的现象，因此，教材的内容需要调整和规范，中外文化的比例和选文标准亟须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要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英语教材中的比例，将介绍中国文化知识的语言素材添加进来，调整知识结构，确保学生能够接触到关于中国文化准确的英文表达。在题材选取上，可编入著名中国作家的作品，如语言大师林语堂的英文作品*The Importance of Life*(《生活的艺术》)。在文章视角的选择上，可以吸纳外国人如何看中国的题材。同时，鼓励学生课外多阅读China Daily、Beijing Review、21st Century等刊物。其次，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质量决定着教学质量。广大英语教师要积极提高自身文化修养，深入了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为我国英语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作出贡献。总之，英语教育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双语文化沟通能力，英语学习者既要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英语教育工作者要在理念和实践层面坚持文化自觉意识，努力成为本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全力推动英语教育的民族化建设。

虽然中国英语目前还处于一种不完善的发展阶段中，但是，如前所述，它对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世界英语大家庭中的一员，必定会逐渐成熟，越来越深刻地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中国向世界有效表述自己、争取平等话语权利的有力手段，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必要条件。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大，必然会有更多的中国特有的“说法”被译成英语，从而使英语受汉语的影响而不断丰富。中国英语能较准确、较流畅地表达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和文化，进而能有效地弘扬中国悠久的思想和文化。就像美国英语一样，中国英语给英语增添了新的血液，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方式。同时，中国英语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媒介，让中西思想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汉语文化的热衷程度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地位已经受到世界普遍的关注和尊重。相信若干年后，中国英语会与美国英语一样，成为世人广为认可的英语变体。



第6章 中国文化失语症

中国英语从最初的饱受非议，到现在不断有学者论证中国英语的存在、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以及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别，这种转变与一个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中国文化失语症”。其实，早在1996年外语教学会上，李岚清副总理曾说：“我们的学生学了十几年英语，但连What do you usually have for breakfast？这一简单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这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不知如何用英语表达“稀饭”“馒头”“油条”“豆浆”等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东西。这似乎是中国文化失语症初见端倪。

6.1 中国文化失语症的概念

“失语症”(Aphasia)一词最初用于医学，全称Dysphasia，指由于大脑问题而导致的发音失败，后来又被引用到文学界。著名学者曹顺庆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文学领域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概念。而“中国文化失语症”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提出来的。她于2000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的文章。她发现许多英语水平较高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际的过程中，并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母语文化。同时，她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外语界对中国文化教学的关注，许多外语教育学者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的受试者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表达我们自己的母语文化。这些调查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文化失语症”确实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中普遍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母语文化知识的“失语”，即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如很多中国英语学习者不知道中国的春节为什么又被称作“过年”，却对圣诞节的来历十分清晰和全面；二是对母语文化的英语表达“失语”，如“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不知令西方人也十分崇敬的孔夫子的英文译名是Confucius，还有人闹出把Mencius(孟子)奉为异国圣者而译为‘门修斯’的笑语”(从丛：2000)。

《光明日报》上这篇文章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英语教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以往以应试教育为重心的教学体系所具有的严重弊端，尤其是对语言实际运用能

力的忽视，亦已得到愈来愈充分的显现，促使多层次英语教学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大、中、小学均摒弃了以灌输语法知识为轴心的传统教学体系而采用侧重实际交际能力、能使学生在实际语境中学习英语的体系。笔者在承担南京大学非英语专业博士生英语教学工作中，也进行了适应博士生需要的、以国际学术交流实用英语教学为重心的教学体系改革。经过9届的教学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正是在从事这种最高学历层次上的英语教学改革实践的过程中，笔者逐步认识到我国英语教学迄今仍普遍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由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与跨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这一理念，已逐步成为我国外语界的共识。加大外语教学的文化含量，已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非常值得欢迎与肯定的。然而，纵观我国多层次英语教学，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却有着一种共通的片面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内容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

的确，对一种自然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及其多层面背景有相当的了解，是成功地习得该种语言并运用其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无论是汉语“交流”，还是英语的communication一词，其所表示的交际行为都是“双向”的。跨文化交流决不能仅局限于对交流对象的“理解”方面，而且还有与交际对象的“文化共享”和对交际对象的“文化影响”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后两者对于成功交际则更为重要。如果说，由于以往英语教学西方文化含量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的多层面交流障碍(主要是“理解障碍”)，那么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含量几近于空白的状况，对于国际交流的负面影响则更为严重。我们不难观察到，许多有相当英文程度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过程中，始终显示不出来自古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当西方同行怀着敬意探询Confucianism/Taoism(儒/道)的真谛时，我们的学者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更有甚者，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

不知令西方人也十分崇敬的孔夫子的英文译名是Confucious。在笔者从事博士生英语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如下绝非个别的现象：有些博士生有较高的基础英语水平，也有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但是一旦进入英语交流语境，立即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在日常汉语交流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文化底蕴就显得苍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基础英语教学的一大缺陷。

近年来，在南京大学博士生英语教学中，我们正在逐步把博士生英语阅读课程之重心改为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宗教及文学艺术的英文文献阅读，并将其作为国际学术交流实用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受到广大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的普遍欢迎。但是，这种“亡羊补牢”之举的作用自然是十分有限的。要真正克服我国英语教学的上述缺陷，就应当把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育贯穿到各层次英语教学之中。我国英语界和中国文化界同仁应携手研究有关教学内容的合理配置，使学生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水平与基础英语水平的提高及对西方文化背景的了解呈同步增长之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者与国人在使用英语进行交流过程中具有坚实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操守。

许多中外学者都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发挥愈益重要作用的世纪。然而，在短期内使汉语成为国际交流的主体语言，显然是不可能的。面对英语作为实际的“世界语”的现实，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无疑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必经途径。所有从事国际交流的中国人，尤其是各界学者都应担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与世界人民共享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责任。在多层次英语教学中系统引入和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既是成功地开展跨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全球化大趋势下文化互补与融合的时代需求。唯有如此，才能为世人所期盼的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在新世纪的产生提供必要的文化积淀。因此，中国文化英语表达之教学，无疑应成为我国各层次英语教学共同担负的重要任务。

从丛提出的“中国文化失语症”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其原因的。从社会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前，中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中国文化缺乏向外传播的途

径，“文革”期间民间文化交流被阻隔，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经济不够发达，国人又妄自菲薄，把博大精深的本土文化视为秦砖汉瓦；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强势不断地向外扩大与渗透，相应地，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它隐秘但又最具杀伤力地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模式和思想，对本土文化带来冲击和震撼。这场悄无声息的隐性战斗使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西方文化的认同超过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认同。从多元文化的观点看，社会是由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组成的，社会成分的多元化决定了文化的多元化，各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并无优劣贵贱之分，各种文化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以，重视本土文化教学，是平等原则的体现，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起到了对外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作用。而且，在多元文化的接触中，才能更客观地认识与理解多元文化，辩证地去取长补短。另一方面，从跨文化交际环境中的交流来看，正如Widdowson(威多森)所强调的：“交流本身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交流的进行意味着吸纳和传播，两者不可或缺。”所以交流就不只是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不是一方向另一方一边倒。然而，遗憾的是，在海外出现“汉语热”的同时，国内在文化教学实践中，过多强调目的语文化，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却被束之高阁，濒危求生，中国英语学习者频频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症”。

那么，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危害不容忽视。首先，“中国文化失语症”阻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当外国人想知道“儒”“道”精神时，我们就会因为自己不知道相关知识或不会用英语表达而使得交际受到阻碍。于是，外国人会因为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失语”而倍感惊讶，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失语”而倍感尴尬。交际双方这样的心理状态进一步阻碍了交际的进行。其次，由于中国文化“失语症”，中国文化失去了许多向外传播的机会，许多外国人也因此会对中国文化产生望而却步的心理，这不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借鉴。作为英语学习者，我们有义务向西方人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宣传自己，又如何让别人了解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情形下，如果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味地迎合西方文化，对自身文化“失语”，就会逐步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陷入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最终被西方强势

文化所同化。再次，中国文化的缺失，也会对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学习产生负面影响。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具有相通性。许多事例证明，成功的英语学习者大多精通中文，例如林语堂和钱钟书先生就以渊源的中西文化功底而著称。因此，对自身文化的“失语”，也会导致英语学不好。

6.2 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失语症

结合中国英语的特点和表达中国文化的实际需求，用带有中国语言文化特点的中国英语来描述中国社会文化中独有的事物、现象和理念，同时向中国英语学习者介绍英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说明中国英语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有利于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帮助中国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改变中国文化失语现状。中国英语对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症具有积极的影响。

首先，有助于语言学习。从语言输入的角度来看，中国英语能为中国英语学习者提供更真实的语言材料和使用语言的真实环境；从语言输出的角度来看，中国英语有助于设计出更符合中国英语学习者实际的口语、写作、和翻译活动，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实际使用语言的能力，增强教与学的效果。

其次，有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时常有表达中国事物的需要，使用并教授中国英语能帮助中国英语学习者掌握中国社会文化的可行性表达方式，从而保证口头和书面交际能顺利进行。

第三，有助于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了解并能用英语介绍并推广母语文化就成了对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当代学子的重要要求。通过学习中国英语，学子们可以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并自觉地在各种形式的内外交往中加以运用，从而体现中国文化修养和东方文化人格，而这些正是我国21世纪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有助于文化的双向健康交流。学习中国英语有助于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积极利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心，改变中西交流中中国文化“失语”的现状。

6.3 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反思

由此，用带有中国语言文化特点的中国英语来描述中国社会文化中独有的事物、现象和理念迫在眉睫，而中国英语是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症的最根本途径。通过学习中国英语，中国英语学习者可以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并自觉地在各种形式的内外交往中加以运用，从而体现中国文化修养和东方文化人格。此外，中国英语学习者可以利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更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

中国大学生对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缺陷反映出当前高校英语跨文化教学存在的不足，而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及现实需要，则要求在教学中加大渗透中国文化，加强中国英语教学。笔者认为，为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症，可以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中国英语教学。

第一，英语课上讲授的词汇中所承载的中西文化应均衡。

目前，我们的英语教学过分地强调要渗入西方文化，强调要重视对英语国家价值观念、传统习俗以至于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介绍，而对中国文化的讲授却甚少。如此之后，很多学生学了多年的英语后，虽然知道圣诞节、情人节、基督教、牛排和培根肉等的英语表达方式，但却不知道端午节、旗袍、油条、豆浆等的英语表达方式。21世纪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赖。中国作为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目前正被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另外，也恰恰是中国英语中包含了无数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中均没有的词汇及表达方式，内容涉及地理、历史、社会规范、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英语教师在课堂上就必须向学生讲授更多的能反映中国文化的词汇，如Dragon-Boat Festival(端午节)、Zongzi(粽子)、Yuanfen(缘分)、Fengshui(风水)和Socialist Ethic(精神文明)等，以使课上讲授的词汇中所承载的中西文化大体均衡。事实证明，如此不仅有利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的学习，而且更有利于其日后的工作交流，其中也包括与英语国家人士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第二，课外推荐的阅读资料应中西兼顾。

学习外语词汇的最佳方式是阅读，所以英语教师在课外都会推荐给学生一些阅读资料，以让学生能在阅读中增加词汇量。英语教师所推荐的书目中常有英语的经典之作，比如《简•爱》《鲁滨逊漂流记》《飘》《傲慢与偏见》《老人与海》及《呼啸山庄》等。这些经典之作中所体现的是西方文化，其中的词汇所承载的也是西方文化。这固然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教师也应向学生推荐一些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书目或阅读资料。有些教师可能会说这类图书或资料不好获得，其实它是随手可得的。首先，可用华裔作家的作品，如华裔美国作家哈金、裘小龙及华裔旅美女作家李翊云和严歌苓等，他们都是用英语进行创作的知名海外华裔人士，都用英语讲述了关于中国的故事，作品中都有浓浓的中国味道。其次，可用官方媒体上的英语报道，比如我国的CCTV-9(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报道，我国国家领导人政府工作报告的英文译文和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言的英文稿等。这些资料中记录的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大事小情，其中的词汇所承载的也是中国的文化与国情。再次，可用我国各个著名旅游景区的英文宣传材料。我国的名山大川甚多，旅游资源丰富，这类英文宣传材料唾手可得，是了解中国最好的阅读资料。将这类资料推荐给学生，学生通过对这类资料的阅读，不仅能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也能从中学到更多的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英语词汇；这样，不仅能激发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帮助学生克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也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积极正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性对待母语文化，增强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失语症”。最终提高学生的双语和双文化能力，培养全球化的文化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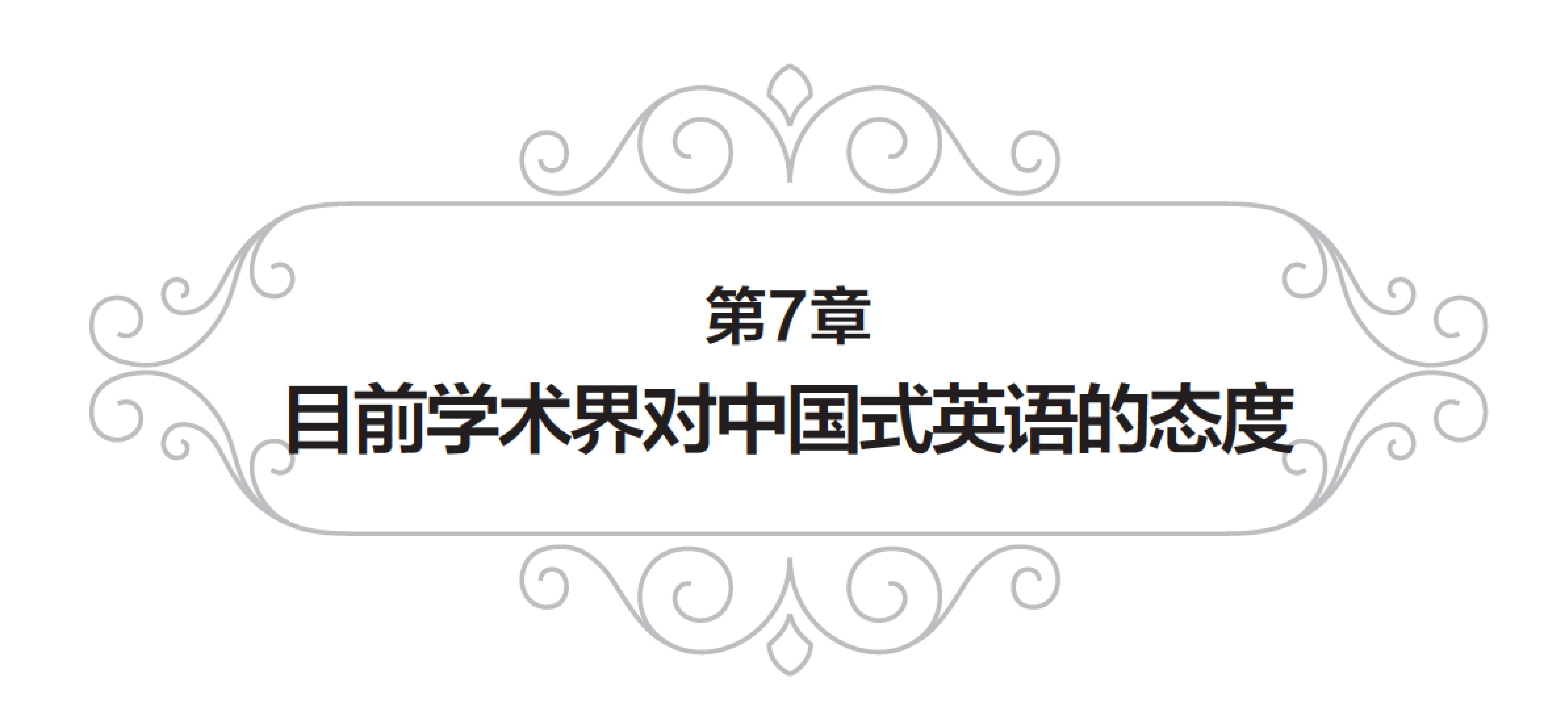
第三，课堂上，对待中国式英语也应像对待中国英语那样采取一种宽容和

开放的态度。在我国，传统的英语教育是以英国英语为标准的。近年来，美式英语又备受欢迎。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现象，极力要求地道英语，结果却收效甚微。地道英语难以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特点，因为中西方文化相差甚远。因此，我们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国式英语。如果教师犯错必纠，必定会打击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使学生心理上产生了焦虑情绪，害怕再次出错而不敢开口，造成“哑巴英语”现象。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采用宽容的态度，适当容忍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的中国式英语。此外，正如本书前面章节所讨论的那样，要看到近年来有些原来被认为是中国式英语的说法也逐渐被认同，如Long time no see、Paper Money、Bird’s Nest、Donkey Hide Glue等。而且英语中已经存在大量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以内圈英语为基础的“中国英语”，它们符合英语的规律和习惯，反映了中国的文化特色，完全可以用于对外交流，而且英语中这样的“汉语元素”正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各方面交流的日益广泛深入而不断增加。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国英语，大胆使用以内圈英语为核心的中国英语，大力传播中华文化。据此，中国的大学教师要敢于在课堂上传授中国英语。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不应该排斥中国英语，要敢于承认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要向学生剖析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说明中国英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适当的时候传授一些中国英语，并不是让学生放弃学习“标准英语”，而是为了消除学生学习英语时的畏难情绪。正如汪榕培先生(2003)提出的，“大胆地说英语，说点中国英语也无妨，主动地学习一点中国英语也是必要的。我们甚至还有个建议：老师在课堂上教一点中国英语是很实用的，课本里也该出现一些中国英语，不要老是伦敦怎么样、纽约怎么样，不妨加一点北京怎么样、上海怎么样，对于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可能会帮助更大。”

综上所述，在中国高校英语教学中应该正视中国英语的存在，在教材编写、教学过程中注重本土文化的输入，加强中国英语教学，使中国大学生具备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克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弘扬中国文化，进一步促进对外交流。正如李文中(2006)所指出的：“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势必影响中国英语教学和学习内容及方法的改革，在英语学习材料中适当加入中国本

土的内容将有助于提高学习和使用者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为英语教学中真实性难题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英语教育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能够在国际交际中使用国际语言表述母文化。”

同时，笔者也建议，为了更好地向世界推进中国英语，让更多的中国英语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采用，我国相关部门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翻译界和外语界的专家，负责对各种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反映中国社会日新月异变化的汉语新词语的英译予以固定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并通过正式渠道定期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公布。国内的英文媒体和英文出版物应按此标准，表达相应的中国文化概念，成为标准化的中国英语，以改变目前国内在中国文化特色词英译方面存在的不规范、不统一的状况，特别是要保证我国重大政治术语英译词的严肃性、权威性和规范性。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组织专门力量编撰大型《中国英语词典》等工具书，从而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大批规范化、标准化、有生命力的中国英语向世界推广。一方面便于国际英语媒体在表达中国文化特色概念时有规范的译法可供参考；另一方面，也能够在国际交流中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元素渗透入世界英语，使中国文化在世界英语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体现出中国文化身份，进而促进中华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



第7章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式英语的态度

在学术界，尽管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有严格的理论界定，但常常有学者混淆中国式英语(或中式英语)和中国英语，如美国的Joan Pinkham(平卡姆)就把中国英语视为中式英语，她2000年编写的《中式英语之鉴》虽然书名是中式英语，但书中内容谈的还是中国英语，所选取的例子都是政论文中的译文，都是合乎英语语法的，只不过在行文表达方面不如原汁原味的英语地道。英国学者金斯利•博尔顿2011年写了一部《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专著，书中谈的主要还是中国英语。此外，国内不少英语教师把不规范英语统称为中国式英语或中国英语，甚至有学者撰文区分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时，仍然把这两个概念混淆，如2010年唐慧和崔嵬在《中国式英语语言现象解析》一文中指出： 目前，中国式英语有以下6种状态并存： 第一，中国特色的事物或固定说法，大多已为标准英语所接受。如：Confucianism(儒家思想)、One China Policy(一个中国政策)、Iron Rice Bowl(铁饭碗)；第二，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英语本族语者的习惯，但符合语法。如： Let’s go and eat our meals(让我们去吃饭)；第三，不符合英语语法，但是可能符合英语本族语者的习惯，能被接受。如：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第四，目前还没有被所谓的“规范英语”所接受，但是对于英语本族语来讲意思比较清楚，理解不成问题，或者一经解释就会明白，并且对于中国人来讲学习起来不费功夫，用起来得心应手，能够发挥语言作为工具的功能。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了)；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第五，套用汉语语法结构或者是概念的简单化移植，中国人不难理解，但对英语本族语者来说就不知所云了。如：If you want money，I have no. If you want life，I have one(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You ask me，me ask who(你问我，我问谁)；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给你点颜色看看)；第六，包括拼

写错误、语法错误、用词不当等，集中体现在国内的各种指示牌和菜谱中，有些则是明显带有机器翻译的痕迹，不仅是外国人看不懂，连中国人看了也是一头雾水。对于前4种中国式英语绝大多数能被大家接受，且增加了英语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他们将其称为“积极中国式英语”，而后两种都是语言的一种负迁移现象(至于用机器翻译的错误英语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不在谈论范围之内)，仅限于个体使用或独立存在，不具有交流工具的作用，称其为“消极中国式英语”。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读这篇文章时，会发现唐慧和崔嵬指出的第一、第二种、第三种乃至第四种情况都是中国英语，而非中国式英语了。

虽然“中国式英语”是中国人从事汉译英时最受诟病的顽症之一，但正如胡晓丽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确实存在中国英语变体，它是一个连续体，一头是中国人对英语的干扰变体，即中国式英语，另一头是受汉语干扰的中国英语，两者之和构成了同一事物的全貌。”(胡晓丽，2008)。

如同日本英语、印度英语都独具特点一样，中国式英语这种现象背后的独特创造性及语言魅力，如果得到正确的发展与延伸，也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亦应肯定这样的价值。虽然，从语言变异角度看，中国式英语是语言变异的消极方面，是不可接受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英语和中西交流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式英语会出现在英语语言中，中国式英语能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和知晓，达到了“我懂你也知道”的地步，就不影响沟通交流。那么广义上的英语也完成了对自身的又一次升级，来扩大它的使用范围和普及性。虽然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段的积累，但是它能够让中国特色在英语使用中得到体现。同时，许多学者也认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界线很模糊。金惠康就曾指出：“一些有趣的中式英语会因为其自身的价值和某些特殊的机会，慢慢在世界上得到承认，从而转化为标准英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英语可能会包括一些在日常交际中有表现力的、实用的中国式英语。有些中国式英语虽然不是标准和规范的英语，但是它们已经成为固定的语言习惯，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是可以被接受的，而这些中国式英语是会慢慢地转变成中国英语，即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中国英语。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要对中国式英语说几句公道话，对中国式英语应持积极乐观的发展态度，中国式英语正逐渐由过去错误的中介语身份如破茧成蝶般蜕变成现今世界英语大家庭里不可缺少的一分子，正在发挥着积极的文化传播作用。下面以近10年一些引起热议的中国式英语的华丽转身来阐释中国式英语的重要语言价值和文化价值。

2007年中国式英语在国内仍被视为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中介语石化现象，但在国外，开始出现不同的积极观点。例如，来过中国留学的德国人纪韶融把搜集到的“中式幽默英语”贴在博客(Chinglish.de)中，他表明：Chinglish.de展现中式英语的美，是英文字典和中文文法的奇妙产物。这是热情的体现，不是嘲笑。2008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以双语菜单为代表的中国式英语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掀起了一轮语言热潮。例如，“四喜丸子”被翻译成Four Happiness Meatballs(四个欢喜的肉团)、“夫妻肺片”被译成Man and Wife Lung Slice、“红烧狮子头”被译成Red Burned Lion Head(烧红了的狮子头)等。老外们对此往往感到啼笑皆非，却也觉得中国式英语挺可爱，有自己的特色。2008年餐饮行业的中国式英语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种关注并没有因为奥运会的结束而结束，反而开始蔓延到各个行业。2009年，新闻调查发现，随着各行业中国式英语的发掘、发现，中国式英语在市民中引起了热议。人们的态度一分为二，出现了“坚决改正”和“存在即合理”两种不同的观点。“坚决改正”人士认为，“中国式英语应该坚决改正。有必要对行业英语进行规范，重视并及时纠正中国式英语，这既是对外国友人的负责，又展示了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实力，还能让普通市民得到更好的英语环境。”“存在即合理”一方认为，“很多国家都有变味英语，比如印度有‘印度英语’、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英语’，它们都是世界英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总有新的词汇被创造出来，对中国式英语不能一棒子打死。”2010年，随着“生活周刊”在微博刊出的新词“ungeilivable”的火爆，中国式英语再次成为热点。“Ungeilivable”这个词完全体现了中国式英语中西合璧的造词逻辑，前缀“un-”在英语中表示否定，可以翻译为“不”；后缀“-able”在英语中表

示单词为形容词；而中间的“Geili”却是直接音译自中文的“给力”(Geili)。这次，中国式英语不再是地铁和景区指示牌上的英文错误，而是一系列由网友创造的新词汇。网络类：Smilence(笑而不语)，Emotionormal(情绪稳定)，Circusee(围观)，Vegeteal(偷菜)；时事类：Chinsumer(在国外疯狂购物的中国人)，Suihide(躲猫猫)；社会类：Sexretary(女秘书)，Togayther(终成眷属)，Divoice(离婚宣言)，Animale(男人天性)。这些新创造出来的中国式英语不但符合中英文的双重审美标准，还能表现出中国网民特有的幽默感，在原有的词里加入了新的意思。4亿的英语学习者，让英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中国式英语的强烈冲击。这一热点社会现象也让学者们重新思考中国式英语的积极价值。2011年，中国式英语继续以新的形式引发网民的关注，其中最为火爆的事件就是一个网名为“欧子”的网友在微博和各大视频网站上展示创作的视频歌曲。例如：Big river goes to the east，all the star follows beidou(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等。2012年，华裔体育明星林书豪作出了他在文化上的最新贡献——Linsanity(林来疯)，这个由中文姓氏拼音与英语单词结合而成的绰号，被全球语言观察机构认定为英语单词。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也许它更像一个中国式英语的典型范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于海涛认为，中国式英语的出现不足为奇，“从语言本身来说，既然出现就因为它可以接受，语言随着时代发展产生新演绎十分正常”。2013年，根据全球语言监督机构的最新报告，英语正在经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究其原因，是它受到了全球化大环境下中国式英语的强烈冲击——不断吸收新词汇，使英语成为世界混合语。Tuhao(土豪)有望与Dama(大妈)一同以单词形式收录进《牛津英语词典》。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牛津英语词典》中有200余个包含中文渊源的词汇。Ganbu(干部)、Guanxi(关系)等词多年以前就正式进入《牛津英语词典》；Tofu(豆腐)、Peking Duck(北京烤鸭)、chow mein(炒面)已成为外国人的日常生活用语；Cheng-guan(城管)、Dia(嗲)等词也在英语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英语中各类汉语借词不断涌现，政治经济方面的Lianghui(两会)一词，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早带头使用，渐渐地，这个词成为各大国家媒体的通用词汇。此外我国的货币单位Jiao(角)和Yuan(元)也已被收入英语词

典，有趣的是，Yuan这个词在英语中又经历了词义扩大的过程，现在，Yuan可以用来泛指钱(Money)。2014年，不少网友发现，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走红的类似“You can you up”这种英语短句已出现在美国俚语网站上。这也说明，这种按照汉语语法规则组织的甚至夹杂着汉语拼音的中国式英语已成功输出到国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式英语被外国人接受，中国式英语已得到世界的认可，已融入国际生活的方方面面。2015年，中国国内最引人关注的事件莫过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普遍二孩政策，其英文是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这种英文表达也是典型的中国式英语，但我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英文版就是采用这种英文翻译。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式英语在新闻媒体上的表现来看，中国式英语正在逐步得到认可，我们对待中国式英语应采用宽容态度，不要过分苛刻，吹毛求疵。

7.1 “中式英语”受追捧，应学“老外”包容度

中国世界报2009年6月10日第010版刊登了钟海之一篇名为《“中式英语”受追捧，应学“老外”包容度》的文章。笔者认为这篇文章所提倡的对待中国式英语的宽容态度是符合英语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的，它肯定了中国式英语的积极价值。全文如下：

美国《侨报》报道：“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种曾经由于中国民众普遍的英语水平低下而造就出来的“中式英语”，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被视为“雷人”和丢脸的代名词，但今天，此种英语竟成了老外追捧的语言。甚至有一大批地道的中国话也变成了英语新词汇得以进入老外的视线，如广东话的“饮茶”被直译为Drink Tea，《四书》被称为 Four Books，等等。

这让人联想到近日大陆有知名国学学者痛斥眼下网络出现的不规范用语及“火星文”。在这位教授眼中，不规范的遣词造句和不知所云的“火星文”风靡网上，是糟蹋了数千年形成的中国汉语言文字体系，并将喜好网络语言的年轻人斥为“欺师灭祖”，其态度与英语国家接受“中式英语”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网络语言和现实语言越来越呈现融合的趋势。什么是“网络语言”，什么又是正宗的“汉语言文字体系”？恐怕已很难清晰界定。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已超过3亿，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随意、诙谐、搞笑，更因为其来源于现实生活，且无拘无束，网络语言的影响力正在随

网民群体的壮大而不断扩展、散发魅力。

语言文字规范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并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宋元时流行的“官话”到今天的普通话，汉语言文字不是也经过多次变迁吗？

文化的包容性时常也表现在对外来语的接纳程度上，试想，当大多数中国人学会了像老外那样欣欣然接纳“中式英语”，中国文化将会开创一个怎样的盛世？

7.2 为“中式英语”说两句公道话

无独有偶，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7月30日第016版刊登了旅美文化学者常江的一篇名为“为‘中式英语’说两句公道话”的文章，其文笔犀利，言辞尖锐，为中国式英语讨回公道。全文如下：

我有不少外国朋友，他们当中并无一人对我表达过“中式英语很丢人”。一位美国朋友还认为这是北京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表现。

北京某餐馆的中英双语菜单近日在网上疯传，引发了相当可观的“笑果”。举例来说，“泼辣鲶鱼”被翻译为Rude and Unreasonable Sheatfish，直译过来就是“粗暴无礼的鲶鱼”；“老北京肉皮冻”成了the Old Beijing Animal Skin is Frozen，也就是“古老的北京动物皮肤冻僵了”，而“辽参”则成了 Distance Senate，即“遥远的参议院”。诸如此类。国外有个网站(www.engrish.com)，专门搜集世界各地对英文的误用，而大名鼎鼎的中式英语(Chinglish)为其提供了至少70%的素材。

面对这种情况，网友在大笑之余往往深感“丢人”，官方亦祭起“国际化”的大旗对城市路标、饭馆菜单和景区告示牌上的不规范英文大肆清理。怎奈中式英语生命力如此旺盛，大有屡禁不绝之意。一个地方剿灭，另一个地方会重生。而一些面向大众的“语言艺术家”甚至开始主动创造中式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语言不愧是世界上最变幻莫测、最令人难以捉摸的事物，简单的禁令和一厢情愿的关切并不会改变其自身发展的规律。

只是，中式英语真的很丢人么？这恐怕要因时、因地而异吧。我有不少外国朋友，有的时常来中国旅游，有的干脆常驻中国。他们当中并无一人对我表达过“中式英语很丢人”。

恰恰相反，一位美国朋友认为这是北京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表现。Robert是个中国迷，时常来中国出差、游玩。有一次我在首都机场送他，看见一个紧急出口的下方标着英文翻译No Use in Peace Time(和平时期禁止使用)。我面部微微发烧，他却指着那行英文高喊：This is so hilari-ous！(实在太有趣了)他认为这句中式英语体现了一种中国式幽默——喂，这扇门是动乱时期才能开的，和平时期可不要动它。

我在美国生活，时常觉得中餐馆对很多中国菜名的翻译虽然准确，却尽失原有的味道。比如“左宗棠鸡”，就成了多少令人匪夷所思的General Tso's Chicken(左将军的鸡肉)。至于各种茶叶，无论西湖龙井、信阳毛尖、东湖银毫还是太平猴魁，在超市里一律标着Green Tea。我们为了让老外读懂自己、理解自己、接受自己，生生扼杀掉文化中的许多韵致，其实有一点点削足适履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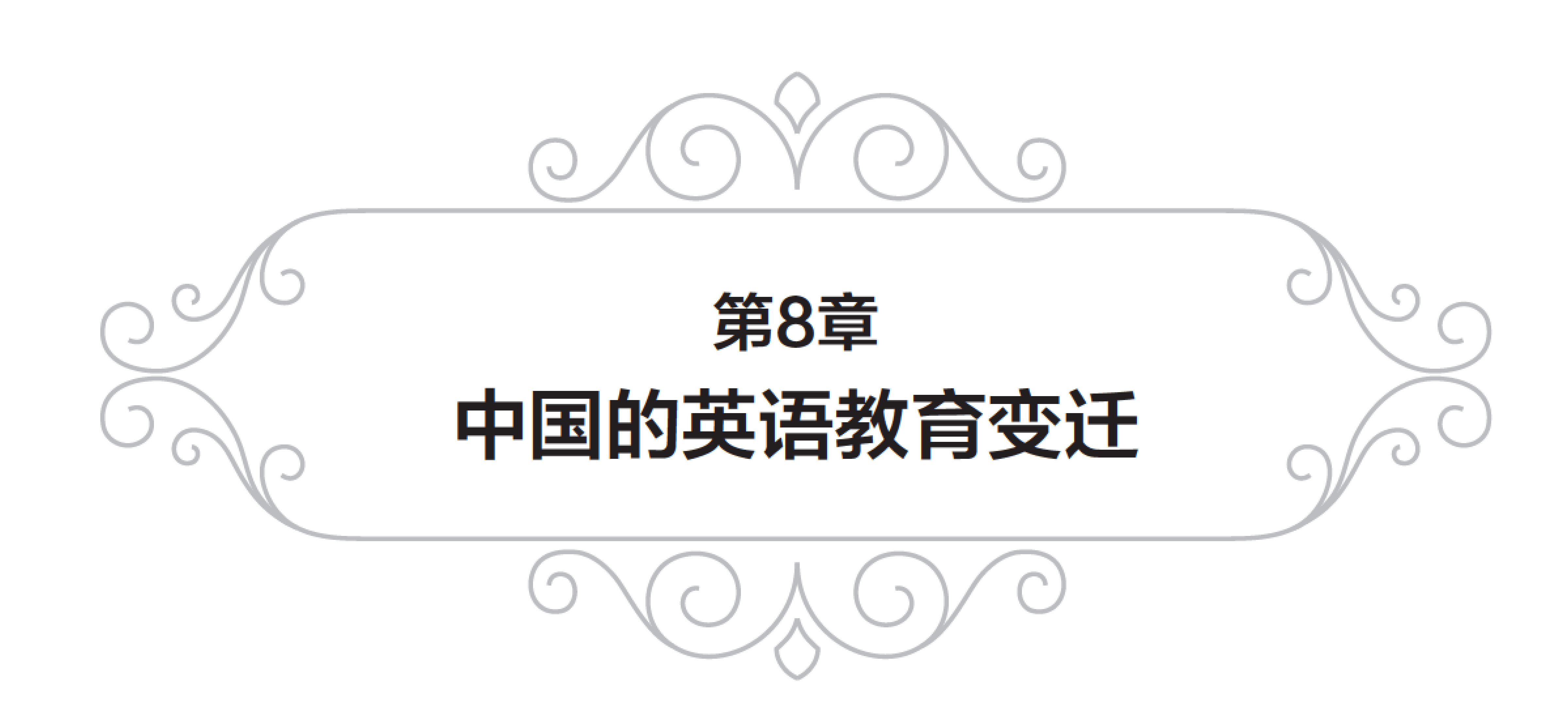
当然，我并不反对规范语言的使用，如果中式英语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犯了政治错误，那是应当坚持纠正的。例如，位于北京中轴路上的中华民族园一度竟被骇人听闻地翻译为Racist Park(种族主义公园)，这对于少数民族是非常不尊重的，必须整改。可是如果把中式英语当成敌人，当成阻拦北京、上海成为世界一流都会的绊脚石，却又矫枉过正了。说白了，还是我们潜意识里有某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情结，却不知没有老外会因为我们把英语用得很好而高看中国一眼。

语言的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它并非孤立的事物，而是深深嵌在社会发展与文化环境之中。过多的人为干涉不但收效甚微，更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文化损失。例如，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试图展开第二次汉字简化运动。但这次文字改革却因过分偏离语言发展的规律、破坏汉字的表意功能而惨遭失败。当然，语言绝不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圣物，而是供人使用的工具，是人在日常生活中发明并改进着语言。中国人，无论讲中文还是讲英文，首要满足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创造意义的需求，外国人喜欢不喜欢则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事。事实上，在令人们大笑的同时，许多中式英语中其实包含着当

代中国社会的某些文化风貌，记录着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时代观。比如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这样的中式英语，难道除了贻笑大方就再无其他作用了么？至少它令我会心一笑，并记忆起自己读书与成长的那个特殊的年代。

所以，既然是“泼辣鲶鱼”，就干脆让鲶鱼“粗暴无礼”好了，因为“辣”这个词在我们的文化里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意思。我们需要绞尽脑汁地学习英文、了解老外的文化，他们为什么就不能通过中式英语来了解原汁原文的中国文化呢？龙井干脆就叫Dragon Well，顶多加个括号注明a Type of Green Tea，就算老外一次两次看不懂，时间久了也就懂了，因为中国文化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不易懂的事物，没必要把原汁原味的中文拧巴成原汁原味的英文。至于什么“国际化”，更是个伪概念，我敢说，就算全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标注英文，“老外”该来还是会来。说白了，不伦不类的不是中式英语，而是既想装洋气又怕装不好的那份妄自菲薄的心态。

随着当代外语教育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趋势，多元文化意识成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核心课题。笔者认为，这些宽容的态度是和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渗透日益密切，对异文化的尊重成为人们的共识以及我族中心主义日渐式微有很大关系；我们也可以从相反角度去设想：如果来自英语国家的游客在中国看到的英文和他们在自己国家日常使用和接触的英文毫无二致，他们是否反而感到不适？对于中国英语，目前已有研究表明，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友人、非英语国家的外国人表示较为接受，尤其是长期在中国居住的被调查者，对中国英语词汇和表达的认知程度较高；对于中国式英语，他们多数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虽然中国式英语的确对他们在中国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是一些外国友人也开始受到中国式英语的影响，偶尔也会使用中国式英语。正如王宏先生所言(2008)：“汉译英的译文也可以是Lingua Franca，是汉语和英语经过碰撞杂交后产生的混合语言。不必以英语本族语固有的语言表达为唯一标准。任何符合英语表达规则且能为英美人士理解的外来概念和表达法均可引入英语。”



第8章

中国的英语教育变迁

自英语来到中国，中国人就在不断地学习英语，其中民间英语教育、教会英语教育和政府英语教育在不同的时期各具特色，独领风骚，共同促进着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

8.1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英语教育

在澳门葡语时期，葡语教育都是在民间进行，那些时常能接触到葡萄牙人的中国人通过声音模仿、肢体和表情自学葡语，外语教育尚未成型。澳门葡语脱胎换骨成为广州英语，英语教育主要以教会学校的形式进行。1818年，英语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的英华书院被看作中国教会英语教育的开端。教会学校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传教的最重要工具——英语教育上。这一时期教会英语教育的特点是教学内容简单，采取语法翻译法，以英语原版教材为主。但是，这奏响了中国学校英语教育的先声，将正规英语教育的概念引入中国，在客观上促进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1839年建立的马礼逊学堂最具代表性。它的英语教育经验为后来同文馆的英语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鸦片战争之后，英语逐渐从广州英语向上海洋泾浜英语过渡，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推动着中国的英语教育。中国的英语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京师同文馆。在那之前，正规的英语教育在中国还没有出现。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在1862年创立的第一所专门的外语学校。尽管它只是一所初级的外语学校，但它却打开了中国本土学校英语教育的先河。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办起一批以培养翻译、科技、军事人才为目的的学校，如广州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山东烟台海军学堂等。当时绝大多数学校都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来传授。尔后，留学生也开始出现。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分别派了3批少年去美国留学。各地的新式学校也纷纷派遣自己的学生去国外深造。19世纪末，英语教育在中国的中等学堂和高等学堂陆续出现了。1902年，清政府规定英语课为中学12门课程之一。同年，京师

大学堂兼并京师同文馆，后把其并入该校新增设的以学习外语、培养精通外语人才为目的的译学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英语成为外交、中西文化交流、商业往来等方面的载体。英语在中国进入中国式英语时期。1922年学制确立了以外语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主的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模式，规定中学阶段每周英语课时数超过国文，英语的重要性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由于政府的重视，本土中学和教会中学的英语教育差别在逐渐缩小。社会上，在一些大中城市也出现了英美原版电影、英文报刊、商业英文招贴等，这些都为学生的英语学习营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在中学英语教育不断地得到完善的同时，大学的英语教育也日趋成熟。清华大学的博雅教育模式、南开大学的实用英语教育与文学教育并重模式、燕京大学的中英文并举模式、沪江大学的全英语教育模式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中西贯通的外语人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英语教育历史中，以民国时期的英语教育水平最为突出，它体现了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大大地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8.2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英语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语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1949年到1976年，由于受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影响，英语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从1949年到1952年，英语教育模式和采用的教科书仍然沿用新中国成立前的模式。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各行各业迅速兴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俄语代替英语成为第一外语，英语开始缩减。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国内掀起了一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群众运动，英语被视为有敌意的语言。到1954年，英语教育几乎被取消，中学和大学都把俄语作为唯一的外语进行教授。之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俄语教育也开始出现了萎缩，英语教育有了转机。中学、大学的英语教学方法得到革新，国家组织英语专家编写了一批教材。这一时期的教材重视基础知识，选材广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即以政治色彩、道德教育为主题的文章居多。从1966年到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的英语教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一些英语课本、英语小说、英语电影甚至英文歌曲一度被禁止。英语被认为是“封、资、修”的语言。直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英语成为升学的考试科目之一，英语教育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

1978年以后，英语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无论是教材、教法、教学设备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改进。无论是大学的专业英语、公共英语，还是中学英语，其质量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针对公共英语，我国在1987年底开设了四级

考试，1989年又实行了六级考试。四、六级考试的规模日益扩大，到2003年，已有近900万的考生(人次)参加。目前，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已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外语考试，并且被广为认可。大学专业英语也设立了四级、八级考试，还有其他的像商务英语、英语翻译的等级考试也陆续出现。1999年，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增设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PETS)，自实行以来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到了90年代，许多地区的小学也开始增设英语课。2003年教育部规定所有有能力的中小城市在小学三年级以上开设英语课。目前，全国已有70%的城镇小学开设英语课，农村小学的普及率也达到了30%。在学校正规英语教育的范围、质量、层次不断提高的同时，民间英语培训机构也蓬勃地发展起来。1981年，我国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之后留学生的人数迅速增加。“中国英语”也在这一时期由葛传槼先生提出。1987年，自费留学生的人数便超过了10万。相应地，托福考试、GRE考试和雅思考试在中国也开始出现，参加的人数逐年增多。托福考试首次在中国开办，当时的考生只有285人。1983年考生人数增长了近10倍，达到2500人。而到1986年激增到18 000人。雅思考试也翻版了托福的奇迹，目前每年考生都超过10万人。

出国留学的盛行，促进了民间英语培训机构的蓬勃发展。以托福、GRE考试培训的龙头老大新东方为例：1994年在新东方学习的学生是3558人，2003年有45万人，而2007年的人数总和已经达到75万人。在2005年之后，我国的成人英语教育又以每年超过5%速度增长着，英语的热门趋势不能不令人震惊。与此同时，中学英语、小学英语，甚至是幼儿英语的培训机构也不断地涌现，2005年之后更是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递增。目前中国仅知名的英语培训机构已超过5万家，不知名的更是数不胜数，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英语产业，为中国的英语教育铺设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更为英语的发展和国际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的成功申请和胜利召开，无疑把英语教育又推上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在北京，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

说上几句英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英语学习的行列中来。未来，随着“中国英语”的逐步普及，中国的英语教育还将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和转机，我们拭目以待。

8.3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教育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触越来越频繁，全球化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作为全球通用的语言——英语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而且还与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关。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上对英语的需求增多，对英语教育的需求也提高了。在新形势下，原有的学校教育逐渐地暴露其不足之处。因此，中国兴起了不同层次英语教育改革的潮流。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英语学习者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使英语成为21世纪受过教育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在学校进行英语教育求变求新的过程中，社会上各种各样、管理模式不一的英语培训班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英语教育进入了一个革新和多元化的时代。

跨国贸易的发展、信息技术的革新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有其狭义和广义的定义。通常而言，经济学家往往狭义地把全球化定义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主要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等的跨国流动。而一般人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模式。全球化加强了不同国家的联系和合作，同时也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不管全球化造成了其他什么结果，语言集团之间的更多接触是这一现象的重要结果。毫无疑问，全球化使国际间的交流不断增强，语言接触更加频繁。而语言的全球化(即产生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成为全球化趋势中的一个主要结果。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英语已经成为各种国际场合广泛使

用的语言，英语充当了全球通用语的角色，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学习和使用。

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英语教育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英语延伸圈国家如亚洲的韩国、日本等，欧洲的欧盟等国不仅采取学习英语年龄提前、学校课时增加等方式提高本国国民的英语水平，而且把英语看作提高国际竞争力、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促进民族之间相互理解融合、提高国际意识的重要素养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人较以往更加重视英语学习，一方面是出于迫切地希望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信息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希望把本国的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推广到世界从而影响整个世界。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英语学习热潮持续不断。从2000年开始，作为世界英语学习大国的中国把英语教育提升到21世纪公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语不仅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必修课程，即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一直到博士生阶段，而且为非国民体系教育机构所重视。中国虽然处于英语延伸圈，但其英语学习人口之多，范围之广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的英语教育必定会对英语全球化产生影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在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于是我国在21世纪之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国家新标准课程改革、英语专业培养目标的变革以及大学英语的改革等，以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

8.3.1 中学英语教育问题及改革

由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英语教育有了全新的解释，它不再被简单地解释为一种工具，而是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中学的英语教育应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有利于学生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有利于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利于良好性格、品格、意志和交往合作精神的发展。

我国中学英语教育自1985年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英语课程逐步地得到

了普及。中学的英语教学大纲经过1993年的修订后，提高了对学生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要求，以适应学生发展需要和国家经济及科技建设对人才质量的要求。目前各大城市的中学里基本上都设立英语语音室，学生的听说能力较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在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中学的英语教育还是逐渐地暴露了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注重语言知识技能，淡化语言应用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重视记忆和机械的模仿，忽视对学生的情感需求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教师常常采用以讲解词汇和语法知识为主的上课方式，学生往往被动听课、做笔记。这种课堂模式确实使学生能掌握有限的语言技能，应付各类的升学考试，但是缺乏课堂的互动，难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

(2) 1993年的中国英语教学大纲设计了一个目标和要求。1996年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设计了一级和二级两个不同的目标要求，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沿海及内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以及不同类型中学学生的英语程度、师资力量的差异，使得统一的大纲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很好的实施。

(3)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外语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以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为目标的外语交际教学理念和实践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而我国原来的英语教育观念、教学大纲与教材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于2000年启动了中学英语教学(分义务教育阶段及高级中学阶段)大纲改革。

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目的在于“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发展自主学习的能力，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语言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建立初步的语感，获得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为真实交际打下基础；开发智力，培养观察、记忆、思维、想象和创造能力；了解文化差异，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增加世界意识；使学生初步形成健全的人格，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从上述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以往的英语教学大纲强调把“掌握语言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放在课程任务或教学目标的首位。而新制定的英语课程标准把“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发展自主学习的能力，形成有效的

学习策略”放在首位。侧重点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化，21世纪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学校的教育不再是终结性的教育，公民需要不断地学习以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因此，学生在学校里学会如何学习并能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在英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应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乐趣、信心以及正确的态度，使之能成为自主的终身学习者。这一转变也标志着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外语时代的开始。

高中阶段的英语课程性质规定：“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和交流工具，也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条件。语言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今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外语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因此，学习和掌握外语，特别是英语，具有重要意义。高中英语课程是普通高中的一门主要课程。高中学生学习外语一方面可以促进心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和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另一方面，掌握一门国际通用语种可以为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和进行国际交往创造条件。开设英语课程有利于提高民族素质，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上述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课程标准对英语课程的定位改变了以往强调英语工具性的特征，而是从当前全球化背景出发，分析了掌握英语已经成为世界公民必备的素养之一。第一次在国家课程标准中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出发，明确地指出了外语课程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相统一的双重特征，高中阶段的英语教育不仅促进公民人文素养的提高，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由此可见，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英语教育的目标较以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往的英语教学目标往往规定英语由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和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两个要素组成，反映了以学科为本的教学理念。而新课程的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包括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5大要素。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情感态度是影响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学习策略是提高学习效率、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前提条件。这五个要素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文化意识能力的培养与中国英语的发展息息相关。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意味着它是多文化间交流的媒介，它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使用，成为多元文化的载体，而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中国英语，必定在这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人首先要熟悉自己的文化，并能用英语加以表达。每当我们开口讲话的时候，中国英语不仅表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和民族认同感，而且传递出我国的文化信息。难以想象，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所使用的英语一旦失去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变成了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的原声播放，还有谁愿意同我们进行交流。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义务阶段和高中阶段英语教育已经开始认识到英语本土化带来的影响并开始迎接这一挑战。

8.3.2 高校英语专业教育问题及改革

由于受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和实施科教兴国的需要，中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扩招，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600万人，大学生入学超过适龄人群的15%，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在此背景下，高校的英语专业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全国只有321所高等院校设有英语专业。到2004年，我国已有600所高校设置了英语专业。其中设有硕士点的院校149所，设有英语专业博士点的院校21所，全国英语专业的学生共有23万。而到2007年，在我国1200多所高校中，设立英语专业的院校更是达到了900多所，其中设有硕士点的院校200多所，设有博士点的院校37所，全国英语专业的学生共有80万。高校的英语专业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经呈多元化的趋势，不仅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英语语言教师、研究者，还需要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的外语人才。

第二，2002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各个专业都扩招。就高校而言，创办英语专业，办学成本相对比较低。培养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生需要的经费

比一般理工科专业毕业生要少。据我国高等教育成本统计，培养一个理工科专业学生每年要花1.4～1.6万元，而人文学科的学生每年要花1.2～1.4万元。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许多理工高校的英语专业，通常由公共英语教学部门演变而来，无须花很大的代价聘请新学科建设所需的专业教师队伍和行政人员。对于英语专业而言，实验室设备主要是指语音室和多媒体教室的建设。语音室和多媒体教室不仅可以供英语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以供非英语专业学生使用。实验设备利用率高、淘汰率低也是创办英语专业的一大优势。

第三，英语专业的本科教育为个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宽广的道路。一方面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量大，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较好。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使个人对自己教育的期望值提高，一些学生不再满足于本科生教育，他们希望自己能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或出国留学。而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和申请出国的过程中，英语成绩是相当关键的，这是部分学生选择英语专业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英语专业在朝气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对英语专业定位的误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否带来经济效益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英语专业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值得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和全体外语教育工作者思考的一大问题。英语专业教育要避免高等教育哲学中的两个极端，即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前者指的是高等教育“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即它强调大学以探索高深学问和忠实客观地追求知识为目的，英语专业教育主要关注的是文学教育，培养纯语言、纯文学的人，很少考虑到政治和商业的目的。后者指的是“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它强调英语专业教育不应成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而是要适应环境的需要，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

目前高校的英语专业教育中以高等教育政治论为主导，英语专业的学生深受整个社会大潮流的影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明显，对专业定位认识不明确。一些英语专业的学生将本科英语教育看作便于从事某项实用性专业工作的辅助手段，甚至作为出国留学或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敲门砖。因此，他们重视

立竿见影的应用型课程的学习、重视语言技能的学习和各类资格证书的考试，将大学视为公司的职业培训中心和语言考试培训中心，忽视对文学文化课的学习。实际上，他们思想上的误区，恰恰阻碍了他们的未来发展。在英语教学普及的今天，许多非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也能掌握“听、说、读、写”4大技能，他们也精通各类应用型的英语。而社会将把一些高难度的英语相关工作留给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去做，如同声传译、英语文件起草、文学翻译、出版业等，同时英语专业的普及也要求英语专业培养出更高水平的英语师资。而从事这些工作，强调从业者能熟练运用中英文，谙悉中西文化思想。

其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不合理，师资力量不均衡。从国内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看，课程大致分成3类：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公共基础课的学时约占总学时的30%～35%；专业基础课的学时约占总学时的45%～50%；专业方向课的学时仅占总学时的20%。从以上的数据不难看出英语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不够合理。外语专业课与公共课程的比例不协调，公共课程所占的课时偏多，削弱了英语专业教学；在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重视语言技能训练，淡化英语语言文学课程的开设；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不适应，忽略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内容，教学内容和教材知识结构单一，内容陈旧。由于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局限造成了英语专业学生缺少思辨能力，不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强调模仿记忆，却忽略了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以致在工作中心理承受能力、协同工作的能力都比较差。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各个高校英语专业师资差别很大，新办英语专业高校的师资力量往往比较薄弱。专业教师数量不足，每位教师承担的课时量大、科目多。在师资力量奇缺的高校，甚至出现了部分教师每学期承担2～4门专业课、人均每周的课时数达到14节的情况。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专长，不可能胜任不同性质课程的教学；再则超负荷的工作量，使教师疲于教学而无暇顾及科研工作，从而影响了教师学术发展。师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教师的学历和职称普遍比较低，缺少专业学科建设的带头人和教师团队。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经验不足，难以有效地引导学生的学习和指导他们的毕业论文。

再次，质量评价体系的不完善。英语专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发展最快的专业之一。美国高等教育学家Altbach P. G.(阿尔特巴赫)提醒人们要注意“扩大招生与保证质量间的内在矛盾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现象的一个特征”。在大众化阶段，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其衡量尺度。目前，英语专业教育质量的主要评估指标是英语专业四级考试通过率和学生的就业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目的是全面检查已学完英语专业四级课程的学生是否达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各项要求，考核学生运用各项基本技能的能力以及学生对语法结构和词语用法的掌握程度，既测试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测试学生的单项技能。同时，也是评估教学质量，推动校际交流的一种手段。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性质决定了其重要性。很多学校采用题海战术的方法来提高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通过率(如开办考试培训班，甚至取消第四学期的正常教学活动以应试代之)。一种合理的质量评价体系不仅能衡量测试者的知识水平，更应该将评价的结果作为促进专业学习的动力。但是，过于注重考试的通过率，师生疲于应试而冲击了正常的英语教学是不可取的。英语专业的教育目的不是在于培养应试人才，而是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精通中英语言文化的双语人才，这也是英语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本土化对英语人才的需求。目前，学生的就业率高低是评价一所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准。由于社会对应用型英语人才需求旺盛，为了迎合劳动市场的需要，提高就业率，各个高校纷纷开设了金融、法律、新闻、经贸等方面课程。这些应用型英语课程的特点是学程短、见效快、变化快。这些课程满足了社会对短期人才的需要。但是，过分地强调这些课程的开设，助长了学生急功近利的思想，在学习上缺乏耐心，避重就轻，不愿花时间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这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使得大学教育职业化，忽视了人文素质的内涵，背离了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

基于目前英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应从如下3个方面入手。

第一，定位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全球化信息时代对我国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新的目标，一方面要求学生能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使学生能促进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的理解、交流以

及融合。现在的英语专业本科生，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市场化、商品化社会里，难免会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容易对英语专业的定位产生误解。其实，大学本科4年生活是人一生中的关键阶段，它不仅对一个人的职业产生影响，甚至会对一个人的未来生活产生影响。大学的教育目的不是职业培训，英语系也不是一个学生学习英语的培训中心。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掌握毕业后从事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学生只有明白专业定位，才能有的放矢地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去努力。其次，要让学生明白未来英语专业面临的挑战。随着英语的普及化，整个社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要求更高了。如果一味追求眼前的利益，满足于语言技能和应用型英语的学习，势必不能发挥英语专业应有的优势。因此，要想求得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事业发展，英语专业的学生应注重培养自己的语言能力、中西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

第二，清晰学科内涵，合理设置课程，加强师资建设。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是人文学科专业之一，其内容是英语语言技能的训练和对英语语言文化的专门研究，它在大文科中与历史、文学、语言、哲学等相关专业部分交叉互补。英语专业的特征是：技能加专业、复合而开放；其培养目标为纯熟的语言能力、自如的语言转换、深度的专题研究；专业研究范围主要包括:英语语言研究、英语文学研究、英语文化研究等。从学科内涵和培养的模式出发，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方法:适当地削减公共必修课所占总学时的比例，以保证专业课程学时数；适当开设汉语言文化课程，使学生掌握中西交际中必要的汉语言知识及其英语表达，谨防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症；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基础课程训练学生英语能力，并提供文学、语言学入门常识、分析方法等；专业方向课程侧重专题探讨，引导学生对文学、语言学专题深人研究，作有系统之阐释、分析和解说；开设与复合学科有关的专业课、专业倾向课或专业知识课，加强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在开设新课和改造现有课程的过程中，重点

摸索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确保外语专业技能训练课的前提下，增加所学语言国家国情研究的课程，开设一定数量的中文课，以弥补学生在汉语写作方面的不足，适当选择部分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课，加强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师资队伍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培养合格的英语专业人才，必须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改善师资队伍结构。高校要有规划、有目标地引进人才(学科带头人)、稳定人才(中青年教师队伍，防止人才流失)和培养人才(鼓励教师的在职教育，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合理地配置教师队伍职称、学历和年龄结构。尤其要重视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使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建立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科团队，从而带动整个教师队伍的发展。

第三，明确不同类别高校英语专业的定位、培养模式和质量评价体系。外语是一种技能，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专业。过去常见的是外语与文学、外语与语言学的结合。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校仍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的教师、翻译、编辑等研究人员的任务，他们属于英语专业教育中的精英人才。一般是由有着文科传统的重点院校来承担的。而大部分的院校则需要的是外语与其他有关学科——如外交、经贸、法律、新闻等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这种复合型英语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语专业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新时代的需求。可见，英语专业内部是存在分层问题的，所以不同院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特色以及评价体系应该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有5类高校设有英语专业：外语院校、综合性大学、理工类高校、师范院校、专科院校。由于各院校的发展不平衡，因此，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功能、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如理工类高校创办的英语专业往往不重视语言理论和文学的教学，是以培养应用型的英语专业人才为目的。对于这些学生是否应该授予英语语言文学的学位，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不妨参照香港高校对英语专业内部实行分类的方法，英语专业分为教育、传播和文学3类，3类专业分别属于不同的学院：教育学院、传媒学院及人文学院。不同类别英语专业的设置课程、培养人才、评价体系和授予的学位都有所不同。同时

制定出多样化的质量评价体系，以避免用统一的高等教育质量体系对不同类别高校的英语专业进行评价。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校的规格是多样的，社会的需求是多样的，学生的个性是多样的，可以在英语专业内部实行分层，并实行多元的质量标准，以满足社会对不同英语人才的需求，并为特色学校的发展提供空间。

8.3.3 高校大学英语教育问题及改革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英语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英语交际能力，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学家能读懂英文，全世界约80%的电子邮件用英文储存，全世界约78%的网站为英文网站。”(姜亚军，2002)。

因此，英语在世界各国间开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它不仅是语言与文化交流的媒介，也是衡量个人综合素质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如印度是软件大国，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人的英语水平高，有利于他们打入世界市场。为了适应全球化形势的需要，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全球化体系中，我国必须加强公共英语教育。

我国的公共英语教育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大学英语教育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其发展规模迅速、涉及面广，成为高校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在大学英语的起步阶段，培养阅读能力为第一位，是与当时开放度不高、跟国际直接交流较少、毕业生主要依靠文献资料来了解国外科技经济发展等情况相适应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英语的地位逐渐地得到提高，而作为衡量大学生英语水平的四级、六级考试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许多高校明确地规定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证书直接与学生学位以及毕业文凭挂钩。大学英语在受到高校重视的同时，也不时地受到社会的关注。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对大学英语教育的批评，如原有的大学英语教育强调读写为主，忽视了学生的听说能力，导致了部分学生学习了十多年的英语，虽然能顺利地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但是缺乏实际的英语应用能力。如何改革大学英语使之适应学生全面发展需要以及社会发展需求，成为

教育界以及英语教育者共同探索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英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86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大学英语教学目的是培养具有较强阅读能力，一定的听力能力，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较好的基础。"1999年，教育部高教司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修订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规定其教学目的为："培养学生具有较强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交流信息。大学英语教学应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这个大纲修改前后的相同之处是把阅读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很显然1999年的大纲比1986年的大纲更注重学生的交流能力，并把大学英语的目标定位提高到文化素养的高度。与此同时，1999年的大纲还调整了基础阶段和提高阶段的有关要求，同时也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项目作了调整。

但是，5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发展、语言学习环境的改变以及技术教育手段的变革，原有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进一步暴露了统一性方面的缺陷。2003年3月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项目，经过一年的讨论，基本上完成了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主要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其焦点是大学英语教学该如何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的要点包括：让大学英语教学适应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适应社会以及学习者对外语的实际需要；改革大学英语教学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模式，强调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语言产出技能的实践；从制定大学生英语教学课程要求和立体教材建设入手，以调整教学评估体系为切入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具体的改革方案。

2004年2月6日，教育部审批了180所高等院校为第一批"大学英语教学各试点院校"。之后，教育部又于同年2月15日召开了全国网络视频会议，对整个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工作作了全面部署。6月，国家教育部正式颁布并委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一书，简称为《课程

纲要》。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将大学英语课程定位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是一门必修的语言基础知识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从课程的定位，我们可以看出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性，首先，它是所有高校必须开设的一门必修的语言基础知识课程。它强调学生打好英语4大基本功能，即培养听、说、读、写的能力，由于受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以往以读写为主大学英语教学传统的影响，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要突出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其次，大学英语课程也是一门文化素养的课程。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人们将面临着如何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讲英语人相互沟通、交流与合作问题。因此，要培养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宽容、理解，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跨文化人才，并且要使学生利用英语这一全球通用语言，接触世界各国优秀文化遗产，提高文化品位与审美情趣，从而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提倡个性化的教学要求、方法和模式。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各高校情况差异较大，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3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这3个不同层次的要求是我国所有高等院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经过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与实践应当选择达到的英语水平标准，其中一般要求是每个大学毕业生必须达到的目标。达到或未达到《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七级的大学新生可将一般要求作为大学阶段英语学习的目标。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是对那些学有余力，英语基础较好，达到《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八、九级的大学新生而设置的。这3个要求包括了英语语言知识、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内容，并以定性和定量的描述体现了大学英语教学的指导思想，即强调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以及读写译等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贯彻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原则，以适应立体化、网络化、个性化英语教学和学习的实际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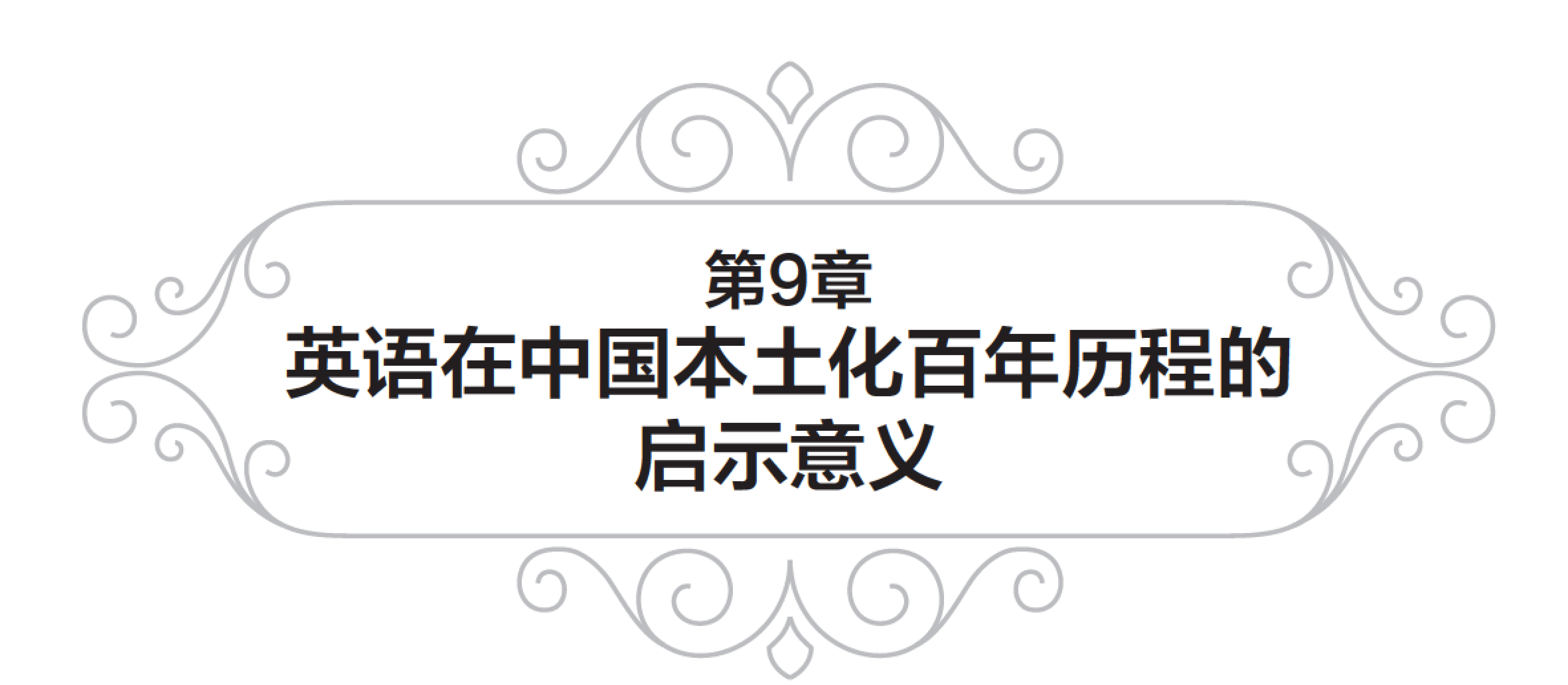
提倡大学英语个性化的教学要求、方法和模式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中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扩招，到2002年，

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600万人，大学生入学人数超过适龄人群的15%，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在此背景下，不同类型大学学生英语入学水平、教育资源和教师业务水平不同，不同办学定位的大学对英语的重视和对学生英语能力的要求也不同。原来统一的教学要求、教学安排和统一考试已难以应付新出现的问题。因此，大学英语教育不仅要实现内部的分层即对不同类型高校提出不同的要求，而且要鼓励各所高校发展自己特色的大学英语教育。各高等学校应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确定教学目标，并创造条件，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向较高要求或更高要求调整自己的学习目标。

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媒体和网络教育技术为大学英语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各个高校招生的大学生日益增多，全国英语教师与学生的比率高达1∶130。在班级规模日益扩大，外语教师紧缺的情况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多媒体网络教育使得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学习、主动式学习方向发展。网络教学模式体现了英语教学的实用性、文化性和趣味性融合的原则，能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环境，形成课内与课外、网上与网下、大班与小班、自主学习与课堂面授等教学环节的互动互补，满足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英语学习的要求，使学生能成为自主的英语学习者。《大纲》还进一步规定："为促进教学模式的有效改革，各校应加大学生通过计算机学习英语课程学时和学分数比例。建议学生在计算机上学习所获学分的比例应占英语学习总学分的30%～50%。"

在《大纲》的指导下，各所高校大学英语教学部门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学生情况，设计出具有本校特色的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或采用基于单机或局域网以及校园网的多媒体听说教学模式，或采用直接在互联网上进行听说教学和训练的模式。目前，不少高校的大学英语部门已建立起基于"多媒体大班课堂教学+小班听说教学+网络自主学习"的多元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将网络教学平台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从而能全面对学生进行英语视、听、说、读、写、译教学。多媒体大班课堂(两个行政班合并为一个班，一般为60多位学生)突出读、写、译教学，

教师通过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读写的能力；小班听说课堂(按行政班上课，一般为30多位学生)突出视听说教学，小班语言教学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练习口语；网络自主学习一般安排在课余时间，教师事先安排网络学习的内容，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每周安排2～3次，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自主进行个性化选择性学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者，教师扮演课堂监督者与辅导者的角色。教学模式的改变不仅仅是教学活动或教学手段的转变，还是教学理念的转变，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既传授一般的语言知识与技能，又更加注重培养语言运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的转变。



第9章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百年历程的启示意义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中下的西日耳曼语支，由古代从欧洲大陆移民大不列颠岛的盎格鲁(Anglo)、撒克逊(Saxons)和朱特(Jutes)部落的日耳曼人所说的语言演变而来，并通过英国的殖民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其中也包括了距英国本土上万公里，横跨英吉利海峡和欧亚大陆的中国。从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我国澳门到今天，英语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传播了近5个世纪。在这近5个世纪的点滴岁月里，英语在中国经历了本土化的不同阶段，由最初的雏形“澳门葡语”，18世纪初的“广州英语”，19世纪中叶风行于上海十里洋场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到20世纪蹩脚的“中国式英语”，直至今日众望所归的“中国英语”。英语见证了中国近500年的发展历程，这其中包含着中国的荣辱兴衰，包含着人民的五味生活。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也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和深深的启示。

9.1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历程对中国经济的有益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又一基本矛盾，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但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纵观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澳门葡语”“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3个阶段，中国正分别处于明清两朝国力衰败之际，西方列强觊觎我国丰富资源，乘虚而入，既带来了新奇的商品掠夺我国黄金白银，也带来了异域语言——英语。面对中国如此广阔的市场和资源，西方列强又想故技重施，把中国也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以便长期占有和掠夺。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大陆，英语并未被人们置于显赫的位置，即使在英格兰本土上，英语都尚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在中世纪晚期，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化的孕育，民族国家形成并发展起来，英语作为一门民族语言才开始具有鲜明的身份认同特征，其作为一门民族国家语言才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十三四世纪开始，西欧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发展，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诞生带来了一大批新兴的阶级群体，推动欧洲各国走向统一，而英国人在对外竞争中开始意识到民族共同利益的重要性，英格兰民族的概念至此开始形成，尤其是1338年至1453年的英法百年大战推动英格兰民族的形成，结束了在英国少数统治者使用法语，而广大人民使用英语的奇怪现象。此后，都铎王朝的100年统治创建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在1588年，在伊莉莎白女王的统治下，英国一举打败

西班牙无敌舰队，建立了海上霸权。其后，印刷术的发明伴随着英国势不可挡的发展势头将英语输送到英国势力所及之地域，传播着英国的文化和语言。十八九世纪，伴随着大英帝国遍布世界的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英语进入了急速扩张阶段。而此时的中国由于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国内经济发展缓慢，自然也成了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觊觎之物。

殖民主义指的是强国对落后国家实行奴役和剥削，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属物和掠夺对象的政策和行动。实际上，除了这种政治上的侵略之外，文化上的同化更有助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更能满足其扩张的要求。暴力的侵略和赤裸裸的掠夺是其主要手段，但同时文化侵略也是殖民主义的一种策略，并且这种策略更加隐蔽。文化殖民主义是指强势文化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和传媒等优势，向弱势文化推销自己的经济理念、政治价值、文化观念等一种不平等的国际文化交流现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那些自认为拥有最先进文化的人总是热衷于把他们的文化发扬光大，希望在有人类足迹的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这就是文化殖民主义的根源。无疑，文化殖民主义通常带有些政治或经济目的。由于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当文化被提及时，我们无法忽视语言的存在。简单地说，语言殖民主义是文化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强势语言更大范围的传播。其实就本质而言，语言或语言变体不应有地位高下之分。但因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而造成了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也造成了语言地位的不平等。

英语从16世纪伴随着葡萄牙语来到中国那一天就带有语言殖民主义的色彩，并且随着英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和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其在中国的语言殖民色彩日益浓厚。在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英语必然尽量向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靠拢，而中国本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则未得到展现，找不到立足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英语本土化先后出现“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两种语言变体。建国初期，我国虽然经济落后，远不及其他各国，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带来了语言上的独立自

主。虽然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仍然重视英语教育，但交流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国人开始意识到用英语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需求和思维习惯，并运用英语为语言工具向全世界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自我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中国式英语”也开始向“中国英语”转变。

纵观世界历史，不论是古代四大文明的出现，还是近现代欧美文化和英语的流行，之所以广泛传播且倍受关注，无不与国力的强弱有关。国家强盛了，其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才能引起其他民族的关注和欣赏。目前中国已经迎来了历史性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进入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力量的组合与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加举世瞩目，中国的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开足马力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提升自身在新形势下世界竞争中的综合实力。只有这样，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才能朝着健康互利的方向发展。

9.2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历程对中国文化的有益启示

语言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从广义上说，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依赖文化而存在，文化也离不开语言。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是统一的，二者相互依存。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掌握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识，人们在学习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就是在学习这一民族的文化。在语言学习中，文化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语言的使用要受该语言所属民族文化的制约。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并且反映该民族的信仰和情感；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不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要学好外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地使用这一语言。

纵观英语在中国的百年历程，西方文化占据优势，中华文化受到冷落和轻视，这使得除"中国英语"之外的其他中国英语变体都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吸引力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一个民族的文化优势、文化底蕴，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的最重要文化条件。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深厚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祖先、自己的传统。一个国家的

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中华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存留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不仅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而且海纳百川、包容创新，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中国人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古代文化，这也是在世界古典文化系列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传统文化。我们绝不能让这璀璨的悠久文化迷失在英语语言之中！为了使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进而更充分地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示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成果，介绍和传播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树立当代中国新形象。

9.3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历程对中国汉语的有益启示

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也是英语和汉语互相融合的过程，二者在融合过程中此消彼长。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实力尚未得到大幅提高，汉语对英语的影响力不大，造成汉语中许多特色词汇无法用英语表达，而英语中代表西方国家的特色词汇却俯首皆是。语言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如果我们在英语全球化进程中忽视汉语的影响力，甚至丢失汉语，那还何来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因此我们要提高汉语的软实力。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浓厚文化底蕴的古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崛起的国家，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口数量占据世界总人口数量1/4的语言大国，在文化与语言在世界竞争中日趋重要的今天，应加强汉语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教育，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侵蚀。让人们意识到，汉语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瑰宝之一，应该热爱它并将其发扬光大。

目前遍及全球的“汉语热”源自中国文化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又折射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热力。越来越多海外人士通过学习汉语、使用汉语了解中国，也更加主动地和中国加强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前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在进行过对外汉语教学的实地调研后说，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目的已从单纯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转为要凭借懂汉语的语言优势，到中国就职，与中国人做生意。西门子家电中国区总裁盖尔克演讲时说：“如果你还停留在‘英文走天下’的心态，那就大错特错了，要跟中国做生意，一定要聘请会中文的人才。”面对中国提供

的巨大商机，如同曾经学英语一样，许多海外人士开始学中文。拥有较高的汉语水平，正成为跨国公司职场竞争的一大优势。前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组长章新胜在全国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会议上说：“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增加，中文的应用价值在不断提升。”官方统计显示：海外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人，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在教授中文。”《纽约时报》曾刊登一篇题为《2040年的中国》的文章，文中写道，“到2040年时，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各类科学会议上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国内音乐排行榜上的中文歌曲也比比皆是。”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扩大汉语在世界的影响，自2004年起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的“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教育的文化交流机构。截至2014年12月7日，全球126个国家(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

目前，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应该是英语，但是，国际上已经有专家在说：英语已经过时，未来社会将轮流使用两三种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而汉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有可能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语言作为国际交流工具的地位不是天生的，是由人数、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未来对世界的贡献等决定的。如汉语在汉、唐、明、清时，在周边国家就很盛行。虽然汉语离真正成为世界强势语言还很远，但是我们对汉语的重视程度丝毫不能减弱，因为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根。

9.4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历程对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的有益启示

在英语本土化的“澳门葡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和“中国式英语”阶段，我们因未意识到中国文化在英语本土化进程中应起到的作用，一味强调英语的发音和英语国家特色词汇的学习，同时在句法篇章上强调与英语国家习惯保持一致。虽然这些英语变体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致使英语在中国发展缓慢，国内英语学习者也因英语学习与中国国内实际情况脱节，而丧失学习兴趣，导致国内英语学习人数虽多，但整体英语水平不高的现象。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英语本土化的大潮中将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英语，而会积极主动地影响它的变化和发展。这对中国的英语教学也带来了新的启示。

首先，中国英语是重要的文化教学语言形式和内容。外语教学中的语言教学总是第一位的，因此文化教学必须围绕英语语言教学展开一切教学内容和形式。中国英语作为反映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形式自然就成为文化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语言。从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的角度来看，英语作为当今最主要的国际语言(English as an Internatioanl Language)或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融合并折射着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产生了各种国别变体，代表了当今世界在政治观念上的改变和对社会多样性的认可，摒弃了以占统治地位的英美英语所导致的社会单一性。因此，中国英语教学应该审慎看待世界英语的文化观念，将中国英语纳入中国的英语教学中来。

其次，中国英语是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语言形式。中国英语是世界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国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对于中国的广大英语学习者来说，他们用所学来的英语语言技能表达得最多、最经常的还是反映中国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的事物和现象。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英语在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生作为现代化建设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应该具备“走出去”的战略眼光，掌握中国英语成为大学生份内的任务。

最后，中国英语是大学英语教材编写文化原则的重要体现。文化原则是教材编写的重要原则之一。以往的文化原则往往倾向于目标语文化，不利于文化教学的开展和学生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因此，文化原则应该拓展，体现为包括母语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教学材料。大学英语教材是文化教学内容最直接最重要的来源，是师生进行文化教学的主要媒介，也是学生获得文化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文化原则不仅要反映英美社会文化，还应当导入中国文化，而中国英语就成为这一文化原则的直接体现。事实上，国内3.5亿中国人学英语用英语的庞大数目已经说明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及其在英语教学中潜在的文化语用功能。因此，中国高校不应该排斥中国英语，反而应该在英语教学中补充中国文化的内容，包括学习中国人写的英语文学原作，优秀的汉译英文本和英美作家写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作品。

如此一来，定会大大增强中国人学习、使用中国英语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英语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意识以及促进中外交流等方面都将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自豪地用中国英语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我们坚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必将取得和英国英语、美国英语一样的平等地位，中国英语最终能够像世界化理论研究者所提出的共同口号那样，将成为“所有使用它的人的语言”(English is the language for those who use it)。

参考文献

[1] Bassnett，S.& Andre L.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A]. London：Pinter，1990.

[2] Bassnett，S.& Andre L.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A].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 Brown，H.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

[4] Brown，H.D. Teaching by principles：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5] Cannon G. Chinese borrowing in English[J]. American Speech，1988.

[6] Cannon G. Chinese Borrowing in English[J]. American Speech. No.1，1983.

[7] Cheng，Chin-Chuan.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A]. In Kachru，Kachru，B.B.(eds.). The other tongue：English across cultures[C].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2.

[8] Crystal，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9] Edwards，Dwight.W. Yenching University[M]. 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1959.

[10] Fenn，William.P.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M]. U.S.Grand Rapids，Michigan：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76.

[11] Howatt，A.R.P.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2] Hunter，William C.The“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1844)[M]. London：Kegan Paul，Trench，& Co.，1882.

[13] Jenkins，J. World Englishes[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14] Jenkins，J.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Attitude and Identit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5] Jenkins，J. Modiano，K.& Seidlhofer，B. 2001. Euro-English[J]. English Today，1984.

[16] Jenkins，J. The Phonology of English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7] Jiang Jirong.A DISSOLVED-POINT STUDY ON LOCALIZATION & GLOBALIZ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J]. 中国英语教学(双月刊)，2007(3).

[18] Kachru，B.B. Institutionalized second language varieties. In S. Greenbaum (ed.).[J]. The English Language Today. Oxford：Pergamon Press Ltd，1985.

[19] Kachru，B.B. The Alchemy of English：the Spread，Function and Models of Non-Native Englishes[M]. Oxford：Pergamon，1986.

[20] Kachru，B.B. The Indianization of English：The English Language in India [M].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1983.

[21] Kachru，B.B. & Smith，L.E. Editorial. World Englishes，1985.

[22] Kachru，B.B. The Other Tongue：English across Cultures[C]. Champaig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5.

[23] Kaplan，R.B.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J]. Language Teaching，1992.

[24] Kirkpatrick，A，XU Z C. Chinese pragmatic norms and China English[J]. World Englishes，2002.

[25] Kirkpatrick，A. World Englishes：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6] Kirkpatrick，A. & Zhichang，X. Chinese pragmatic norms and “China English” [J]. World Englishes. 2002.

[27] McAuthur，T. World English and world Englishes：trends，tensions，varieties，and standards[J]. Language Teaching，2001.

[28] McAuthur，T. The Oxford Guide to World English[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9] Medgyes. Native or non-native：Who’s worth more?[J]. ELT Journal，1992.

[30] Phillipson，R. Linguistic Imperialism[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1] Phillipson，R. Linguistic Imperialism Continued[M]. New York：Routledge，2009.

[32] Pinkham，J. 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A].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33] Quirk，R. Language varieties and standard language[J]. English Today. 1990.

[34] Quirk，R.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a global context[A]. In Quirk，R. & H.G. Widdowson(eds.). English in the world：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35] Smith，R. Global English：gift or curse? [J]. English Today，2005.

[36] Spring，J.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A]. J. H. Ballantine，J. Z. Spade. Schools and Society：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Education[C]. California：Sage. 2012.

[37] Todd，L. & Hancock. I. International English Usage.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6.

[38] Toolan，M. Recentering English：New English and Global[J]. English

Today，1997.

[39] Trudgill，P. & Hannah，J. International English[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40] Tsang，Chiu Sam. Nationalism in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M]. Hong Kong：Progressive Education Publishers，1967.

[41] 柏会力. 英语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分析及教材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08(5).

[42] 卞浩宇. 从“别琴英语”到“中国英语”——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2).

[43] 陈先锋. 负载汉语文化的中国英语试探[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4).

[44] 陈雪芬.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5] 程媛. 中国英语的特点及与中式英语的区别[J].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

[46] 储常胜. 中国英语的语言文化身份标志及其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D]. 福建：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9.

[47] 从丛. 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 光明日报，2000-10-19.

[48] 崔启亮. 全球化视域下的本地化特征研究[J]. 中国翻译，2015(4).

[49] 崔启亮. 全球化视域下的本地化特征研究[J]. 中国翻译，2015(4).

[50] 戴文杰. 对中国英语文化教学的反思及建议[D]. 山东：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4.

[51]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52] 杜瑞清，姜亚军. 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3(1).

[53] 杜争鸣. 中国英语问题及其他[J]. 外语教学，1998(3).

[54] 段林远. 中式思维与中国英语[D].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中西方慕林. 课堂文化差异及其对中国英语教学的启迪[D]. 吉林：吉林大学硕士

论文，2006.

[55] 范伟. 全球英语与语音教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42).

[56] 范勇. 美国主流媒体上的“中国英语”实证研究[M].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57] 范勇. 管窥英语国家人士如何看待“中式英语”及相关思考[J]. 海外英语，2011(5).

[58] 方梦之. 实用文体汉译英[M].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59] 方英姿. “中国英语”：拒绝还是接受[J]. 黄山学院学报，2006(6).

[60] 冯薇. 大学英语教材中“中国英语”特色的建设[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8).

[61] 高超. 世界英语理论与中国英语研究综述[J]. 国外外语教学，2006(4).

[62] 高超. 中国语境中的英语报章变革动词研究[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63] 高丽娟. 论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

[64] 高一虹，吴红亮，李莉春. 关于外语教学研究方法的调查[J]. 外国语，2000(1).

[65] 高一虹. 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6] 高云薇. 中国英语与中国特色词语的归化和异化翻译[D]. 吉林：长春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8.

[67] 葛传槼. 漫谈由汉译英[J]. 翻译通讯，1980(2).

[68] 顾静. 透视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J]. 上海翻译，2005(1).

[69]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0] 顾卫民. 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研究[D]. 江苏：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1.

[71] 顾卫星，朱全明. “别琴英语”剖析[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72] 顾卫星. “中国各体英语”的历史演变[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7).

[73] 顾卫星. “中国各体英语”的历史演变[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7).

[74] 郭钧华. 变化中的美国英语对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D].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75] 郝良婷，张红. 论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趋势及意义[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76] 贺春艳，刘景霞. 中国英语的文化身份[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77] 胡丹. 关于中国英语词汇前景的研究——模因学和中国文化的视角[D]. 江苏：江苏大学硕士论文，2008.

[78] 胡风明. 中国英语教学的跨文化透视[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79] 胡晓丽. 中国英语变体研究现状及前景[J]. 中国外语，2008(2).

[80] 胡晓丽. 中国英语之功能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11).

[81] 胡晓琼. 从一份问卷调查看“China English”的现状及其未来[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82] 胡晓琼. 全球化环境下“Global English”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J]. 国外外语教学，2007(2).

[83] 胡勇. 晚清民初英语在中国的传播[J]. 广西社会科学，2008(11).

[84]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85] 黄金祺. 应当肯定“西译文化”现象的积极面[J]. 中国翻译，1988(1).

[86] 黄金祺. 再论《应当肯定“西译文化”现象的积极面》——兼答周式中同志[J]. 外国语，1991(5).

[87] 黄友义.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 中国翻译，2004(6).

[88] 加心苗. 也谈中式英语和中国英语的差异[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5(1).

[89] 贾德霖. 思维模式与线性序列—汉式英语语序特色[J]. 外国语，1990(5).

[90] 贾冠杰，向明友. 为中国英语一辩[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5).

[91] 江晓红. 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英语[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6).

[92] 姜磊. 英语是个“帝国”[N]. 环球时报，2002-01-31.

[93] 姜亚军，杜瑞清. 有关“中国英语”的问题——对“‘中国英语’质疑”一文的回应[J]. 外语教学，2003(1).

[94] 姜亚军. 疯狂的英语[J]. 书屋，2002(8).

[95] 姜亚军. 近20年World English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3).

[96] 金惠康.“中国英语的语用环境和语用功能”[J]. 福建外语，2001(2)

[97] 金惠康. 汉英跨文化交际中的CHINA ENGLISH[J].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2).

[98] 金惠康. 用中国英语翻译中国古典诗歌[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99] 金惠康. 中国英语[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100] 柯棪. 从语言学和文化视角探析中式英语的特征与成因[D]. 山东：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2.

[101] 孔莎，唐健禾. 从英语功能角度审视中国英语地位[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102] 孔莎. 英语教学中保留中国身份：为中国英语一辩[D]. 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7. 赵晓音. 英语全球化视野中“中国英语”的特征——一项基于哈金小说的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103] 兰兰. 中国英语的本土化研究[J]. 理论界，2007(6).

[104] 李昌银. 论英语中国化之荒谬性——世界英语的谱系构成与中国英语的定位问题[J].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

[105] 李少华，王万平. 中国英语与中国英语教学[J]. 广东外语与外贸大学学报，2002(2).

[106] 李少华. 英语全球化与本土化视野中的中国英语[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107] 李少华. 英语全球化、本土化视野中的中国英语[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108] 李文中.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109] 李文中. 英语全球化及其在中国本土化的人文影响[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110] 李文中. 英语全球化及其在中国本土化的人文影响[J]. 河南师范人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111] 李文中.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112] 李小飞. 从英汉互译词看中外文化渗透[J]. 山东外语教学，2004(1).

[113] 李燕. 基于社会语言学论中国式英语的特征[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7).

[114] 林曼筠. 中国英语——汉英译桥[D]. 福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115] 刘冬. 中国英语——世界英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116] 刘君栓，李占辉.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英语教育探究[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117] 刘文慧，阳志清. 洋泾浜语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18] 刘文慧. 中国历史上的洋泾浜英语[J]. 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

[119] 刘艳. 洋泾浜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现代英语教育的启示[J]. 学术 • 理论——现代企业教育，2014(11).

[120] 刘月莲. 澳门历史语言文化论稿[M]. 澳门：澳门文化研究会丛刊出版，2003.

[121] 刘真彪. 皮钦英语的历史演变及其本土化成因刍议[J]. 兰台世界，2014(04).

[122] 楼捷. 全球本土化视阈下对汉英语用迁移再思考[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23] 陆雪晶. 论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及其意义[D].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9.

[124] 吕鹭. 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研究内容及方法对比研究[D]. 湖北：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7.

[125] 罗运芝. 中国英语前景观[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5).

[126] 麻红. 文化软实力与“中国英语”的关系[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27] 马廉颇. 晚晴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8] 马伟林. 中国皮钦英语的历史地位[J]. 学术界(双月刊)，2005(2).

[129] 马伟林. 中国皮钦英语的历史演变[J]. 修辞学习，2004(3).

[130] 莫再树，肖云南. 我国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及语言属性——兼论洋泾浜英语与商务英语的关系[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131] 潘章仙. 语言的主体性空间：世界英语探索[J]. 外语学刊，2004(1).

[132] 潘章仙. 中国英语变体的研究——回顾与展望[J]. 外语研究，2002(6).

[133] 千龙网. “中文成英语新词最大来源”[J]. http：//www.language monitor.com/，2009(4).

[134] 邱立中. 语言学界在“中国英语”研究中的误区与回归[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3).

[135] 申志华. 管窥清朝时期洋泾浜英语的特点及其影响[J]. 兰台世界，2015(4).

[136] 沈艳蕾. “图形-背景”理论与高校汉英翻译教学[J]. 教育探索，2010(7).

[137] 沈艳蕾. 世界英语环境中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及其对高校英语教学的启示[J]. 教育探索，2012(11).

[138] 沈艳蕾. 中国英语—中国文化的国际载体——对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反思

[D]. 黑龙江：东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1.
[139] 司显柱，李莉. 英译质量与中国英语[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7).
[140] 孙骊. 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和英语在中国[J]. 外国语，1989(2).
[141] 孙太群. “中国英语”的研究及其在我国英语教学中的意义[D]. 福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142] 孙太群. 中国英语的特征及发展前景[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143] 谭卫国. 英语新闻的用词特点初探[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
[144] 谭卫国. 英语新闻的用词特点初探[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
[145] 谭玉梅，陈兰英. “中国英语”及其存在理据探微[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4).
[146] 谭玉梅. 中国式英语的特征及成因[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4).
[147] 佟靖. 全球语境下中国英语本土化教学研究[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5.
[148] 涂秀青. 中国英语研究综观[D]. 福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149] 万昌盛. 关于英语的正确性[J]. 现代外语，1994(1).
[150] 万鹏杰. 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之比较[J]. 上海翻译，2005(2).
[151] 汪宏. 英语语言异体的认知分析[J]. 外语学刊，2004(1).
[152] 汪榕培，常骏跃. 英语词汇中汉语借词的来源[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4).
[153] 汪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1).
[154] 汪榕培. 说点“中国英语”也无妨[J]. College English，2003(4).
[155] 汪榕培. 英语词汇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56] 汪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1(1).
[157] 汪卫红，李慷，唐晓云. 全球化视阈下英语及英语教育再认识[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158] 汪卫红，李慷，唐晓云. 全球化视阈下英语及英语教育再认识[J]. 中国

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159] 王东波. 英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J]. 山东社会科学，2004(8).

[160] 王宏. 这些句子是Chinglish还是英美人士广泛使用的英语？——兼议英语学习以及衡量汉英翻译质量的标准[J]. 上海翻译，2008(1).

[161] 王烈琴. 语言霸权与语言濒危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J]. 求索，2012(21). 崔春花. 语言接触与广州英语产生问题研究[J]. 渤海大学学报，2015(1).

[162] 王琳. 中国英语教学中的中国英语研究[D]. 山东：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刘圣明. 中国英语教育发展障碍的文化分析[D]. 湖南：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163] 王淑芳. “广州英语”在中西交往中的历史地位解析以[J]. 兰台世界，2013-08.

[164] 王银泉. “福娃”音译之争与文化负载词的汉英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2006(3).

[165] 王银泉. 英语的全球化、本土化与标准化[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

[166] 王莹. 中国特有词汇的有效翻译——中国英语合理性之辩[D]. 北京：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08.

[167] 王玉萍. 中国英语学习者词汇知识广度和深度发展研究[D]. 山东：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8.

[168] 王聿良.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D]. 江苏：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169] 文秋，芳俞希. 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 国外外语教学，2003(3).

[170] 文秋芳，俞希. 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 国外外语教学，2003(3).

[171] 吴秦宁. 试探“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J]. 才智——创新教育，2016.

[172] 吴义雄. “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J]. 近代史研究，2001(3).

[173] 吴玉光.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探讨“中国英语”的合理性[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10).

[174] 夏霖. 清末上海“洋泾浜英语”的成因及其学习特征[J]. 兰台世界，2013-09.

[175] 肖华. 中国英语及其研究前景新探[D].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76] 谢芳. 试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J].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11).

[177] 谢之君. 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J]. 现代外语，1995(4).

[178] 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9] 熊月之. 上海通史，第六卷，晚晴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80] 杨静. 浅析中国式英语产生的内外因素[J]. 时代教育，2010.10.

[181] 杨莉. 从汉语借词分析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特征[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182] 尹扬帆. 浅谈英语在亚洲的变体—印度英语[J]. 疯狂英语(教师版)，2007(4).

[183] 袁宏萍. 文化交际中的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11).

[184] 曾方本，卢东波. 对中国英语变体研究中若干方向性问题的思考[J].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85] 曾剑平. 论中国式英语[J]. 新余学院学报，2015(1).

[186] 曾涛. 中国英语的发展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影响[J]. 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

[187] 张凤娟. 别琴英语和中国英语对我们语言教学的启迪[J]. 山东外语教学，2002(6).

[188] 张莉. 中国文化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地位[D].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7.

[189] 张凌. 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及其对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D]. 上海：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9.

[190] 张培成. 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也谈中国英语[J]. 现代外语，1995(3).

[191] 张毅. 谈标准英语、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J]. 集美大学学报，2004(1).

[192] 张振江. 早期中英接触沟通语言的变迁——从葡萄牙语基础语言到英语基础语言[J]. 语言研究，2007(1).

[193] 张震久，袁宪军. 汉英中国专有名称和术语简明词典[Z].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94] 赵红霞. 中国英语教育特点及趋势研究[D]. 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6.

[195] 赵明，吕淑文，王慧娟. 论中国英语的语言特点与翻译[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96] 赵中站，李沙莉. 关于中国英语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2).

[197] 周晓凤. 英语全球化与中国英语教学[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6(3).

[198] 周毅. 论近代中国最早的洋泾浜语——广东葡语的历史渊源和影响[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199] 周毅. 晚清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D]. 四川：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5.

[200] 周毅. 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历史渊源之探讨[J]. 中国文化研究，2005(15).

[201] 周玉蓉，杨秋. 十八十九世纪“广州英语”的使用者[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202] 周振鹤. 近代中英语言接触[N]. 中华读书报，2002-08-07.

[203] 周振鹤. 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语词集[J]. 广东社会科学，2003(1).

[204] 朱海玲. 清末的洋泾浜英语[J].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5).

[205] 朱万忠，刘婷. 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对比研究[J]. 高等建筑教育，2008(1).

[206] 朱跃. 对近20年“中国英语”争论的反思[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207] 邹长虹. 主体性空间视野中的马来西亚英语[J]. 外语学刊，2004(1).

[208] 邹琼. 中国式英语及其成因透析[J]. 湖南社会科学，2006(5).

后　记

世界英语环境中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及其对高校英语教学的启示

在全世界约4000种语言中，英语的使用最为广泛，影响力也最为巨大，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语言。英语的全球化也引起了英语广泛的本土化，世界各地的英语变体和“世界英语”的概念也随之出现。从世界范围看，目前不仅有美国英语、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并且出现了新加坡英语、新西兰英语、印度英语、日本英语等多种英语的变体，中国英语也是这世界英语大家族中的一员。

一、 世界英语是一种客观存在

世界英语概念的提出及理论框架的构建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对其具体形式和功能的研究却晚至1978年。该年的4月和7月，分别在美国檀香山的东西方研究中心的文化交流学院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召开了讨论英语国际国内功能的两个国际会议。1987年和1992年，又相继出现了两个世界英语机构，即世界英语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World Englishes)和国际世界英语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orld Englishes)。随后，《英语世界》(*World English*)、《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和《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杂志也接

连出版。至此，世界英语一词正式诞生。

二、 世界英语环境中的中国英语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中国英语”的概念最早是由葛传槼先生在1980年提出的。葛先生在其《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指出：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要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来使用英语。不过，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言，我们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我们把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翻译成英文就可以称之为“中国英语”。汪榕培先生1991年在其《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一文中给“中国英语”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此外，谢之君、李文中、贾冠杰、向明友等也对“中国英语”有过自己的解释。应该予以明确的是：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是有区别的。从语音方面看，中国式英语的发音因受汉语发音的影响，所以与规范的英语的发音相比，其出入就很大；从词汇方面看，中国式英语因受汉语思维的影响，所以就产生了一部分让人难以理解的新词，如“马马虎虎”的标准译法为 Just So-so，而中国式英语则将其译为Horse Horse Tiger Tiger；从句式方面看，中国式英语的句式不符合规范英语语法的规则，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准译法应为Study Hard to Be Good，而中国式英语则将其译为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这种表达已经被英语世界认可；从语用方面看，中国式英语大都不适合英语的文化背景，所以就会导致交流上的障碍、矛盾或冲突。根据众学者对中国英语的解释，我们可以将中国英语理解为：它是以规范的英语为依据的，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的再生等创造性的手段来传达中国特有的文化、事物或观念的英语，它是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

卡其鲁认为，世界英语是指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使用的某种英语的模式或变体。卡其鲁对世界英语的变体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语言形式、语言功能及语言认同。下面，本文也从这3个方面来讨论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

首先，中国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有自己显著的特点。一种语言形式之所以能

被称为一种语言变体，首先要在形式上有自己的特点。过去之所以没有“中国英语”这种说法，就是因为没有明确地对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加以区分。如今，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发现并认识到了二者之间的不同，所以可以说中国英语是基于规范英语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英语语言形式。“中国英语”这一概念的出现也证明了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英语的变体，它是一种客观存在。

其次，中国英语展现了英语在中国这一新的语境下发挥着的对外和对内的双重语言功能。英语在中国的使用不仅体现在国际交往上，同时也体现在国内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过去，中国人学英语除了学习英语语言之外，还包括要通过英语来学习国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文化。而如今，中国人使用英语还有一种新的功能，那就是用英语来传播中国的文化。Yongchunquan(咏春拳)、Hutong(胡同)、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一国两制)、Five-year Plan(五年计划)、the Three Represents(三个代表)、Bird’s Nest(鸟巢)及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科学发展观)等，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都是英语在走进中国后，与中国的社会背景相结合而产生的新词汇。如今，这些词汇不仅在国内广泛使用，并且也常常被国外媒体所引用。

再次，中国英语符合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中国人讲英语，不是要展示英国人的英语或美国人的英语，而是要展示中国人独特的身份认同。我们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与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在运用英语时也在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人。这是我们的一种潜在的心理上的需求，是一种归属感的表现。正是这种强烈的认同需要，才使中国英语在词汇方面有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如Mantou(馒头)、Baozi(包子)和Jiaozi(饺子)等。“鱼米之乡”的翻译则更能体现中国英语的特色。“鱼米之乡”的原有翻译为Land of Milk and Honey(Milk为牛奶，Honey为蜂蜜)，现在已改为Land of Fish and Rice(Fish为鱼，Rice为稻米)。

三、 在世界英语环境中的中国英语的教学

英语在中国的使用目前已越来越广泛，世界英语理论从世界的大视角给予了

中国英语以合法的变体地位。同其他英语的变体一样，中国英语也是世界英语大家族中的一分子。中国英语是中国人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以及以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这也就是说，英语在英国是英国文化的载体，在美国是美国文化的载体，在印度是印度文化的载体，在中国则是中国文化的载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高校的英语教学应该如何进行呢？笔者认为，主要应把握如下两点(具体分析前文已作详细阐述)：

第一，课上讲授的词汇中所承载的中西文化应均衡。

第二，课外推荐的阅读资料应中西兼顾。